



2011年第1期（总第24期）

卷首语

苏轼之前，贬谪海南的文人对海南的春意熟视无睹，而困厄中的苏轼却感受到了，写下了歌唱海南春天的第一首赞歌《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充分表现了他豪放的性格、旷达的心态和乐观的精神。这首词描绘了怎样的情景呢？

在春风海归之后、在儋州邑门之外、在打春活动之时，春旗招展，村民簇拥，春牛伫立，春杖挥舞。土牛替春天承受“勾芒”的神鞭、为百姓带来一年的希望、让立春成为快乐的节庆。打春了！“一打泥牛”，迎接春天；“二打泥牛”，祭祀先农；“三打泥牛”，劝勉耕种。

从大海上踏浪而来的司春之神，以无限的慈祥、无边的爱意和无穷的絮语，唤醒了闭目沉思的大地、唤醒了闺门紧闭的桃花、唤醒了情思恍惚的杨花、唤醒了醉眼朦胧的诗人。她飘飞的襟带、衣袂、气息和点铁成金的手指化作春风，带着大海一样的馨香、大海一样的温柔、大海一样的胸怀，呵护“遥看近却无”的小草、点染“竹外三两枝”的桃花、卷起“花还是非花”的杨花，春风习习，春光明媚，春意浓浓。

离席而去，踉跄乡野，诗人低声慢吟杜甫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些三三两两漫步野外，佩戴垂肩耳饰、立春剪胜的村姑所呈现的场面，不就是杜甫的诗境吗？打量村姑春胜一样的美、欣赏桃花人面一样的艳、捕捉杨花雪花一样的飞，好不惬意！这哪里是在天涯海角啊！

新年第一期杂志和大家见面啦！让我们以春天般的心情去迎接春天的到来吧！

蘇軾

2011年第1期（总第24期）

研究 SUSHI YANJIU



目 录

□编辑出版：《苏轼研究》编辑部
□主办单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协办单位：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 编：张志烈
□执行主编：周成仕
□副 主 编：宋明刚 蔡心华
□编辑部主任：刘清泉
□编 辑：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308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03—006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年3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苏学论坛

苏东坡的现代意义	刘小川/ 4
苏轼的文学理念创新	
与文化基因生成机制（上）	杨胜宽/ 8
苏轼谢表的情感世界及其文体意义	阮忠/14
苏轼和陶诗琐谈	郑秉谦/20
苏轼和陶浅谈	段梦云/23
苏轼与赣州的文化认同	李云彪/29
苏轼与尚意书风的兴起	杨江帆/34
苏词甄辨	邹同庆 王宗堂/36
三苏为官的职能及相关情况	胡先酉/40
东坡雪堂故址	王琳祥/47
三苏在京城开封的寓所、宅院、府邸和别业初探	刘继增/51
苏轼曾任常州团练副使考	谢忱/56
再说苏东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吗	赖正和/57
苏辙冻合帖考	吴健/59

□顾问：蒋仁富 李 静 苏 灿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孔凡礼 王水照
刘乃昌 朱清华 刘尚荣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影聪 王希龙 王晋川
方永江 刘川眉 孙开中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何家治 周成仕 周裕锴
涂普生 熊 英 蔡心华

□诗文鉴赏

海南万里真吾乡

熊朝东/61

□景苏札记

□新书序评

一个杰出而伟大的灵魂

——读苏有恒著长篇历史小说《苏轼》

苏兴良/63

张志烈 许 岚 张世明 李景新/74

民间儋州

方永江/75

访苏轼遗址遗迹系列之一

——苏轼系舟宿牛口

欧忠剑/77

□苏学专家

熊朝东的三苏情怀

宋明刚/65

□苏学动态

眉山苏学研究的经验得到推广

付艳霞 张 茂 唐雅兰/79

儋州东坡国际论坛举行

流 水/79

□研究史话

永远的苏轼

——千年苏轼接受的历史描述

王友胜/67

2011年全国首届“东坡学校”交流活动征文启事/80

苏东坡的现代意义

刘小川

编者按：在 2010 年 12 月 15 日“文化惠州”高峰论坛上，刘小川应邀作主题演讲《苏东坡的美政理想》，内容包括苏东坡美政理想的核心是富民强国、长治久安，苏东坡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一生的命运和他坚持的美政理想有无必然联系，惠州如何用好苏东坡的名片效应等，下面的《苏东坡品牌价值将越来越大》是《南方日报》记者罗锐林摘录、整理的刘小川在论坛上的演讲词。而《苏东坡的现代性》则是刘小川在 2010 年 12 月 19 日海南儋州东坡书院举办的“苏东坡在儋州‘东坡国际论坛’”上的演讲稿。

苏东坡品牌价值将越来越大

一、苏东坡是真理的坚持者

苏东坡其实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从常识出发，读破万卷书，又回到常识。他敢于挑战一切不正当的权力，他是一个真理的坚持者。

苏东坡 21 岁进京，之后做官，再之后是几次被贬官，他一生命运的起伏为什么会这么大？我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一直想要纠正一个观点，以前的教科书说苏东坡是守旧派、保守派，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对的。在宋仁宗时代，苏东坡是改革的最大呼吁者，王安石是变法派，苏东坡是改革派，但两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简单地说，苏东坡主张慢慢来，一点一点地改，但是王安石要搞休克疗法，

很短的时间内所有的新法都要到位。我认为，苏东坡的治国理念应该比王安石更高明。

王安石治国理念和苏东坡大相径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个人的童年生长环境区别太大。苏东坡小的时候有母亲帮助，他母亲被誉为历史上三大慈母（孟母、岳母以及苏东坡的母亲）之一。弗洛伊德讲过，人从 0—5 岁左右的经历对他的一生影响非常大，我品了这么多中国文人之后发现，凡是伟大的人物、真正光彩夺目的人物，童年都是很健全的，而且大多有母性的呵护，所以史料记载苏东坡看待人的眼光就是温柔的，不是目光雄壮的。

二、苏东坡的文化传播空间大

为什么 900 多年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苏东坡？这说明苏东坡几乎是一个圣人，他的著作有和孔子的对话，有对《易经》的研究，有大量的艺术品，而且他又是工程师，又是皇帝的老师，又是民间各种各样的好朋友。

法国《世界报》曾作过一个评选，在全球范围内评选 12 个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的人物为“千年英雄”，中国唯一入选的人物就是苏东坡。我的感觉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苏东坡的品牌价值会越来越大。近年来，从《苏轼：叙述一种》到《眉山苏轼》，再到《品中国文人》系列中的苏东坡，我三次写苏东坡，十年前写了一次，三年前写了一次，这次写苏东坡我把所有的力量都倾注进去了。苏东坡和李白、杜甫、陶渊明不一样，他走过的地方太多，也留下了太多故事。苏东坡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资源，但大多数人，包括苏东坡故乡的老百姓对苏东坡的了解还是很少的。相比较之下，西方普通的老百姓对他们的文化精

英、文化大师，了解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法国、德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老百姓对他们历史上的文化精英如数家珍。像苏东坡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伟人，我认为他的文化的传播空间还非常大，不管是采用文化产业化的方式，还是采用写传记或写小说形式对苏东坡事迹进行传播，都有利于提升老百姓对历史名人事迹的认识，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有利于促进文化惠州的建设。

此外，我很赞同蒋子龙先生的观点，通过王朝云的故事来打造惠州的苏东坡品牌。苏东坡在惠州待过，但他不只是惠州的，惠州还要跟杭州、黄州、儋州以及眉山等地分享这一品牌。但是，王朝云却是属于惠州的，她是一个中国女性的典范，她对苏东坡的忠诚和不离不弃即使到现代也是非常值得宣扬的。

三、王朝云的文化资源可挖掘

苏东坡贬到惠州，王朝云什么话都没说，就跟着来了。历史记载，王朝云是一个善良、内敛的女性，默默无闻，命运却悲凉。她的歌唱得非常好，进入苏家的时候大概是12岁。而她最感人的事迹就是苏东坡最后一次“倒霉”，苏东坡被贬到惠州的时候，当时苏家的下人都跑掉了，而王朝云默默地一直陪着苏东坡。苏东坡在与王朝云相处的岁月里，为她写了很多诗词，尤其是在惠州写得非常多。虽然当中有一部分作品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在杭州写的，也有人认为是在惠州写的。但我的感觉是，苏东坡在惠州期间的诗词写得这么好，与王朝云的默默奉献不无关系。

此外，苏东坡一生写的墓志铭非常有限，总数不超过十篇，但是他为王朝云写了墓志铭，这是很了不得的事，读过墓志铭的人都能感受到苏东坡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真挚情感。我几年前过来惠州，当时在给朝云墓献花时，我在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把一束鲜花献给了鲜花般的王朝云”，在论坛过后我还想再去献一次花。我认为，王朝云对苏东坡生命中创造力的激发应该要大于前两位夫人。

四、文化要产业化也要防泡沫化

听了单世联先生讲文化产业，我深受启发，今天中国的文化一方面要产业化，同时也要注意防止文化泡沫。据我所知，现在中国每年的图书量是24万种，重版率不到2万种，德国的生产量是中国的一半，德国的重版率达到了90%，这就给我们提了巨大的醒，我们每年生产800部电影，你今天看了，明天就忘了，它和你的生命没有关系。但是大家再看看苏东坡为王朝云写的那些词，多感人啊！我在上海时就说过，你让好莱坞拿一大笔钱拍一部悼亡题材的电影，然后和苏东坡怀念王弗的《江城子》的70个字比一比，谁的文化含金量高？

在传统文化方面我们有大量的精品，但近现代中国传统几经折腾，尤其近代以来我们老是自己否定自己，否定一些值得传承的精品。我认为，要把传统文化带到当下，前提就是要辨认当下。我们的经济走过了三十年，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样，我们要防止文化泡沫化，文化重建工作也要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几十年，才能让我们的软实力真正得到提升。

我知道惠州拥有诸多文化品牌，苏东坡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希望惠州能在传承苏东坡文化过程中多出精品，我相信惠州有这样的实力。



(2010年12月15日，刘小川在“文化惠州”高峰论坛上作主题演讲《苏东坡的美政理想》)

苏东坡的现代性

各位嘉宾，上午好！

苏东坡去世已经九百多年了，但是我们今天还

在阅读他，研究他，纪念他。热爱他的人成千上万，而且还会继续增加。现在很多事情都难以预测，但是有一点能预测：我们的文化先贤们，比如屈原，比如杜甫，比如苏东坡，比如鲁迅，这些人的精神存在会让时光的流逝变得毫无意义。我在上海讲过，和苏东坡这样的人相比，我们才像古人：当我们作古千百年以后，苏东坡三个字还会闪闪发光。这个现象的背后，肯定潜藏着一些值得去研究的东西。苏东坡为什么能够穿越当下直指未来？他身上究竟有哪些现代人难以企及的东西？他比现代人更为现代吗？他同时属于古代、现代和未来吗？他毕生所追求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吗？

这么短的时间里，要逐一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想说两点。第一，苏东坡敢于挑战一切不正当的权力。众所周知，他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尤其反对青苗法、市易法，因为前者让全国的农民吃亏，后者使全国的商人倒霉。苏轼也是变革派，宋仁宗的时代，他把“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看得非常透彻。到了神宗朝，他的总体变革思路和王安石大相径庭。苏轼重民生，坚决以民为本，而王安石对朝廷的进账数字更感兴趣。另外，苏东坡是渐变派，好比白天不知不觉地变成黑夜，而王安石是骤变派，好比要让人们从酷暑一下子进入严冬。这样一来，两个人的矛盾尖锐了。当时苏东坡官小，但是勇气大，喉咙大，交游广阔，因而影响大。他两次上书神宗皇帝，加起来恐怕有一万多字，如果翻译成白话文，有几万字之多，言词很不客气。他甚至写诗形容宋神宗：“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老实讲，这种敢于直接对皇帝和铁腕宰相讲真话的勇气，令人不能不由衷的钦佩。为什么钦佩？因为官场中很多人做不到。应该说，苏轼和王安石私交是不错的，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华，如果苏轼搞一点折衷主义，那么他升官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性不忍事，对百姓的苦难不能视若无睹。他在杭州写诗，讥讽王安石搞的盐法、青苗法，终于被投进乌台大牢，差一点丢了性命。北宋立国一百二十年，第一次大搞文字狱，让苏东坡给碰上了，这是偶然的吗？他出狱后贬黄州，一去就是五年。这一回他应该有所收敛了吧？可是他不，他要坚持他自己所认定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真是理性充沛而又野性十足。这个大勇士终其一生只向真理低头。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

当政，尽废熙宁新法，苏东坡又不高兴了，因为长期的基层经验告诉他，王安石搞的那一套也有好东西，不能全盘否定。于是，他和司马光又针锋相对了。比如关于是否要废除已经执行了十六年的免役法问题，苏轼去找司马光谈了一整天，费尽口舌，毫无结果，回家后大呼：司马牛，司马牛！

王安石和司马光，前后两个大宰相，都是牛性子（宋人笔记：“安石，牛形人也，故敢为天下先。”）而苏东坡像一名勇敢的斗牛士，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他和司马光的个人关系也很好，当时他五十多岁了，官做得很大，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对他的恩宠非同寻常。如果他配合司马光，就有可能接司马丞相的班。然而他不拿原则问题做交易。高太后去世后，他也不去讨好宋哲宗，依附章惇、蔡京、吕惠卿那些得志小人，结果吃了大亏，六十岁贬惠州，“陆走炎荒四千里”。六十三岁又贬到儋州，却和儋州的百姓打成一片，传播中原文明，做了很多很多流传千古的好事情。

苏东坡一辈子以民为本，反对一切不正当的权力，并且勇于承担灾难性的后果，敢于赴汤蹈火。这是现代精神吗？我想是的。只是需要补充一点：现代人真该好好学一学苏东坡。苏东坡是堂堂正正的人，光明磊落的人，不怕掉官帽的人。“奋厉有当世志”，他几十年担当世界，先天下之忧而忧。他身上所体现的正义、公平、博爱等普世价值，我们应当弘扬和传播。他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任何时代的普世价值。

第二，苏东坡对生活的永不衰减的热情，是值得现代人视为榜样的。

古人讲修身，讲养气，苏东坡修身修得最认真，养气养得最出色。依我看，他一点都不比他所尊崇的孔子孟子差。小时候他在眉山也比较顽皮，爷爷苏序、母亲程氏给了他很好的影响。踏上仕途四十年，辗转南北东西，苏轼始终是一身正气。“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历史几千年，能进入这种境界的人有多少？他能够穿越社会各阶层，和各种各样的人做朋友，包括与坏人打交道，因为坏人身上也有优点。比如章惇，苏轼早在凤翔就发现了章惇有敢于杀人的苗头，但他一直和章惇保持着联系，对章惇身上的胆气表示钦佩。苏轼具有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但是他能从坏人身上看到优点，能从好人乃至巨人的身上看到缺点和毛病，这是极为难能可贵

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胸广大。为什么心胸广大？因为他有很好的遗传基因、文化基因。他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生存的万顷波涛，每一次受伤都使他变得更为强大。“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他待人几乎完全没有机心，更别说像时下的一些人动不动就机关算尽，结果，算来算去算自己。苏东坡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帮助穷苦人，他甚至帮助自己的仇人。比如他帮助搞得他九死一生的章惇。沈括害过他，在杭州整他的黑材料，他也不计较。“吾眼见得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中国的传统精英文化能够催生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我们真是感到很欣慰啊！

上下几千年，一个苏东坡。他巨大的生命张力构成了一个顶级谜团，等待着我们去破解。

我曾经在《品中国文人》这部书中写过一句话：“一个苏东坡，胜过十万影视明星。”有些影视圈中的人看了不高兴，托人传话。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这句话还有所保留。是苏东坡而不是什么娱乐界明星，才让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人的精神，可以抵达什么样的丰富性，喷发到什么样的高度。

苏东坡是大文豪，是法国《世界报》评选的全球十二位千年英雄之一，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庞然大物，是热血智者，是宋代第一勇士，是比现代人更为现代的生活大师。

是的，生活大师！

我想说，这个人真是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干什么都出色，到任何地方都受人尊敬和爱戴。他到杭州就说自己是杭州人，说了好多次。他到密州、徐州、黄州、常州、惠州、儋州，也都这么说，而且说得很认真，又写诗又写信，让我们这些东坡老家眉山的人都感到有些嫉妒了。他到惠州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到儋州说：“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又向中原豪迈宣布：“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伟大的苏东坡真正做到了四海为家，走到哪儿就把生命的创造力带到哪儿，把真善美像种子一样到处撒。具体的例子我也不多说了，因为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苏东坡就像一个胀鼓鼓的皮球，越把皮球往水中按，皮球就蹦得越高。昨天是锦衣玉食的高官，今天是开荒种地的农民，并且是一名“管制分子”，全家人跟着他颠沛流离，受穷挨饿。苏东坡号称坡仙，却并不是神仙，他也会郁闷，关起门来独坐沉思，但是不久，他又弹起来了。黄州惠州儋州，三

次精神力量的大反弹，弹得那么高，那么光彩夺目，那么令人高山仰止。命运的低谷反而催生艺术的巅峰、人生的伟业。苏东坡又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孙参，一旦身子接触大地，就会变得力大无穷。他在儋州的三年做了多少好事情啊，他和这片神奇的土地血肉相连！李太白天马行空像天仙，苏东坡广接地气像地仙。地仙总是乐呵呵的，与人亲近的，能吃能玩儿能开玩笑，能照顾朋友，能呵护女人，能傲视权贵，能用诗画巨笔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总之，我们的地仙般的苏东坡，今天依然神采奕奕地生活在我们中间，指点我们的文明进程。

有一点毋庸置疑：未来几年、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苏东坡的品牌价值将会越来越大。伟大的苏东坡永在当下。

谢谢大家！



(2010年12月19日，刘小川在海南儋州东坡书院举办的“苏东坡在儋州‘东坡国际论坛’”上作主题演讲《苏东坡的现代性》)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著名作家)

苏轼的文学理念创新 与文化基因的生成机制（上）

杨胜宽

内容提要：文化巨人苏轼，不仅是宋代全能型文人的代表，就是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他取得的广泛成就也是少有人能够与之比并的。本文侧重探讨苏轼取得文学艺术众多成就的先进观念与成功的四大文化机制，即正反合力机制、古今通变机制、融通转换机制、推陈出新机制。正是这些机制的综合作用，有利于苏轼文学创新理念的形成，并在诸多领域取得富有创造性的成果。

关键词：苏轼 文学理念创新 文化基因 综合 生成机制

苏轼一生，致力于文学的创新，他自己固已明白言之，如“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①，“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②，虽是评价古人和时辈的言辞，但无疑是诗人所看重和努力追求的。所以，对他甚为了解和尊重的“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比较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人的文学风格特征，要作这样的概括性表述：“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③就连对苏轼的批评者，也多对此加以诟病，代表性的可举金人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其中第二十二首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第二十六首云：“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不放坡诗百态新。”^④奇外出奇也罢，沧海横流也罢，百态新也罢，尽管表达的都是元好问评价苏诗的贬意，但让我们看出来在元氏的心目中，苏诗的最大特点就是新颖出奇，就是全面突破唐人的诗歌范式，不是一点点，而是新得千姿百态，有如流淌四溢的沧海一般！可以想象，他给宋代诗坛带来了何等的冲击与巨变。

苏轼文学艺术的全面创新是靠什么得以实现的？这就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笔者以为，他的文学创新理念，通过多种文化基因的生成机制共同作用，而后完成，即正反合力机制、古今通变机制、推陈出新机制、融通转换机制。

基因是生物遗传学上的一个专用术语，它是生命的密码，记录和传递着遗传信息。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这里所谓苏轼的文化基因，是指构成苏轼作为文化巨人的那些信息因素和体现苏轼文学生命力那些富于个性的生命密码。

一、正反合力机制

在苏轼的一生中，从幼年成长开始，包括他的知识积累、仕途经历、人生体验和人格价值观的形成，多种文化因素复杂地作用于他，有些因素是从正反两面在他身上发挥作用，形成一种合力机制。

家庭文化背景与不同的教育方法 苏轼的家庭文化背景，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导，而综合了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文化的复合型文化家庭，观其父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中叙述儒家“文统”的一段话，可以明白苏洵的人生志向：“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扬雄称于世；扬雄之死，不得其继千有余年，而后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⑤俨然以唐代以后儒家的正统传人自命自期。然而，最早赏识苏洵的两个重要人物张方平和欧阳修，却认为他的文化基因并不单一纯粹，而是带有杂取诸家而成的特征。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云：“听其言，知其博物洽闻矣。既而得其所著《权书》、《衡论》阅之……因谓苏君：左丘明、《国语》、司马迁之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因以书先之于欧阳永叔。君然仆言。至京师，永叔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荀卿子。”^⑥张方平和欧阳修读了苏洵的论著，不约而同地得出了其文出于荀子的结论。人们都知道，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成者，具有“援法入儒”的典型特征。其实，他的《几策》、《权书》、《衡论》及“史论”、“经论”等主要著作，明显带有道家、兵家、纵横家、刑名家的思想色彩。

在苏轼的家庭成员中，祖父苏序体现了比较明显的道、儒思想结合的行为风范，他对苏洵的教育方法，他的生活态度与行事方式，乃至他对亲戚邻里的和善态度，都足以证明。苏轼在淡薄名利、与人为善和不拘细节方面颇受其影响。父亲苏洵则与祖父的性格差异甚大，其个性中不乏固执己见、言行偏激和不太合群的一面，他与姻家的紧张关系、他科举失败的强烈反应，他作《辨奸论》骂王安石，作《苏氏族谱亭记》骂姻亲之家，都是很好的例证。母亲程氏则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的优秀女性，对幼年苏轼影响最大。苏辙《坟院记》云：“(母)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⑦她不仅亲自对苏轼进行启蒙教育，教他读书留意古今治乱盛衰之迹，学做范滂那样具有胸怀澄清天下、依仁傍义人格理想的人，还教育他明辨是非，为人和善；程氏信佛，爱惜生命，不喜杀生，这些都是苏轼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记忆，对其后来的人格形成和生活态度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弟弟苏辙则是他幼时的玩伴和读书的学友，他们一起长大，许多美好的儿时记忆，留存于彼此的心中；直到科举出仕各奔东西，彼此从未分开过，兄弟有如手足，感情至深。

苏轼受到的来自父母的教育，呈现出较大差异。在没有开始写作之前，承担启蒙教育的主要还是苏轼的母亲。母亲教给苏轼读史的正确方法，不能满足于成为书橱，记忆很多死的知识，而要把留意的重点放在古今治乱上，要学习古代先贤做人的道理，把仁义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显然，苏轼的母亲是把读书作为教育的手段，而把做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和最终目的。开始写作以后，苏轼则更多地受到父亲的影响。据赵令畤《侯鲭录》载：“东坡年十余岁，在乡里，侍老苏侧，诵欧公《宣诏赴学士

院仍谢对衣并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⑧表明苏洵对苏轼的教育，侧重点在于文章的写作方法上，其目的是日后的考试成功和功名利禄。苏辙《藏书室记》追忆苏洵多年教导他们读书的两句话：“内以治身，外以治人”，^⑨看来“治人”的目的更明确更重要些。

杂取诸家之长的家庭文化背景，培养了苏轼广博的见识和开放的心态，这是文学创新不可缺少的文化滋养；父母各有侧重的教育方式，则对苏轼人格和思想的形成具有互补作用，即使父亲的固执与偏激，加以适当综合与扬弃，在他身上可能长育而成独立不阿、敢于发表新奇见解的禀性与能力，而得宜于母亲的仁义亲善情怀之培育，则是文学创造真善美最重要的艺术根基。

人生理想与现实矛盾 富于诗人气质的早年苏轼，对未来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怀抱着远大志向。苏轼的人生理想抱负，一方面源于其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信，另一方面则是时代呼唤变革之声日益强烈，仁宗统治后期的诸多时弊，需要有识之士参与革新。其早年所作《策论·策略》即明言：“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⑩他在文中以西汉的衰落为例，警示仁宗后期正患有类似的病状，必须痛下决心，对时弊加以彻底的“涤荡振刷”，然后另立新制，建立能够保国安民的新体制。如果皇帝有这样的决心，包括苏轼在内的天下智者效其谋、勇者致其死，除旧布新的改革必然成功。苏轼的“策论”，一般以为只是他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作的练笔之文，实际上里边提出和涉及的问题，莫不关乎时政兴衰和国计民生的大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早年苏轼的政治理想和改革观念。

尽管在苏轼童年时代就听闻过范仲淹等有志之士力推“庆历新政”的变法故事，并且隐然以这些“人杰”作为自己效仿的时贤，但新政不过一年多光景就因保守势力的反对和仁宗的游移不定而宣告夭折。此后终仁宗之世，再没有哪怕有限的任何改革尝试。这种局面直到神宗即位，才出现了苏轼盼望已久的新变化。此时苏轼已经33岁，距离考中制科，也已7年。回想他在考取制科高等时，发表了这样的理想豪言：“历观前辈，由此为致君

之资；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⑩大有国家兴旺舍我其谁之概！六七年间，他只做了凤翔和直史馆的小官，沉沦下僚，应付事务，与他的理想预期差之甚远。

神宗年富力强，不甘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决心推动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的“熙宁变法”。其初神宗对苏轼的见识与才能颇有听闻，正当变法用人之际，所以希望他加入到支持改革的行列中来。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神宗即日召见，鼓励他说：“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⑪随后示谕王安石，准备让苏轼参与《中书条例》的修纂，表明欲起用苏轼的意图。但苏轼通过对朝廷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推出的变法政策和措施的观察研究，立即感受到“熙宁变法”富国强兵的宗旨，与他所期望的以“裕民”、“利民”、“富民”为首要目的的设想，差别巨大，所以他不顾得罪执政和失去皇帝欢心的风险，奏《上皇帝书》近万言，全面阐述他的政治改革主张，而归结为“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三大要点。《上皇帝书》正式宣告他站在了“熙宁变法”的反对者立场，症结点在于他不赞成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与民争利，把民间的财富通过巧立名目的种种手段，聚敛到国库中来。神宗对苏轼的立场深感失望，加之执政的排挤，他主动请求外任，随即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离开了京城，离开了政治的权力中心，拉开了其悲剧人生的序幕。

苏轼早年的远大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与反差，激发了苏轼对政治改革和社会问题的积极而深刻的思考，并且表现了相当的参与和担当胆识。他与“熙宁变法”推行者的改革分歧，完全无关乎个人之间的得失进退，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或大言欺世，而是基于历史发展演变规律与教训提出的深刻命题，用今天的眼光与标准看，依然具有进步性与合理性。如果一个政权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与民争利的图谋，并以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这样的改革注定是不得人心和终归要失败的。

仕途进退与人生多元价值 从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月到杭州通判任，至元丰二年（1079）八月因诗涉讪谤被迫摄入狱，中间近8年时间里，苏轼一直在地方任职，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徐、湖三州知州，职位的升迁和改任，基本是正常的。但这样的任职履历，似乎并不是苏轼所满足的。一方面，作为地方官员，他必须执行朝廷的新法，而

新法措施是他所不认同的；加之新法在地方执行过程中遇到百姓的抵制和抱怨，通常需要采取某些强制措施才能将新法落实下去，完成朝廷的任务，这让他内心倍感痛苦。《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有云：“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箠环呻呼。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据其后来遭遇“乌台诗案”时供述，“（前两句）以讥讽朝廷新法行后，公事鞭箠之多也；（后两句）以讥讽朝廷盐法收坐同保，妻子移乡，法太急也。”⑫他在如此内心矛盾与痛苦之中，处境十分尴尬。苏辙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利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⑬他虽然在诗中批评讽刺了新法，但目的是为了便民，有补于国，企图把爱民与忠君兼顾起来。另一方面，做地方官他最多只能“因法以便民”，但毕竟是按照王安石的思路推行变法，这种变法不是他的政治主张与人生理想，达不到“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的改革目的，他对新法的反对，植根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改革立场，是不可调和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必须使用文学的表现形式，在批评新法的同时，坚守他当初的政治立场与改革信念。

当时，苏轼俨然成了新法反对派的代言人，自然招致神宗的不满和执政者的嫉恨，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教训惩治他。苏轼的《湖州到任谢上表》成为了整治他的导火索。舒亶、何正臣、李定们精心罗织出苏轼在杭州、密州等地所作的诗歌和湖州谢表存在讪谤朝廷、指斥乘舆的讥讽之意，即宋代著名文字狱“乌台诗案”。台谏臣僚们采用牵强附会、捏造罪名的惯用手法，将苏轼从知州任上逮捕，关进御史台监狱，整整关押讯问了一百多天。苏轼最后被贬黄州，剥夺了签书公事的权力，虽然挂职团练副使，实际上被限制居住，形同罪人。

黄州之贬在苏轼的人生经历中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不仅改变了苏轼的仕途命运，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和人生价值观。从仕途发展和政治功名看，他遭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人生挫折；但这样的命运与处境迫使他严肃思考出仕以来的功名理想与奋斗方向，反思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真正价值。黄州谪居四年多，他经历了从惊悸、苦闷到释然泰然的转变过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研习儒、释、道经典和文学创作中，使他的文学生涯出现了真正的黄金时

期，郁积的感情和自由的心灵，催生其文学艺术的全面丰收和大量杰作出现，仕途上的不幸成了苏轼在文学与学术事业上长足进步；通过回顾与反思，使他探索并最终确立了精神充实的艺术人生的重要价值和随缘适意的生活方式。黄州“炼狱”般的人生经历，不仅使苏轼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完成了人生的多元价值选择过程，而且文学艺术风格全面成熟，诗、词、文、书、画的创作，经、史和百家经典研究，饮食、酿酒、医药、种植等科学技术的推广，展现出全面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的文化巨人风姿，奠定了他在宋代文化史乃至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古今通变机制

“博观”与“杂学” 南宋朱熹把苏轼的思想与学术斥为“杂学”（《杂学辨》），意以贬之。实际上，不仅苏轼的思想与学术“杂”，他的文学艺术乃至全部文化结构“杂”，没有“杂”就难以成就苏学的广博与深邃，就没有苏轼的全能与丰产，苏轼文学创新的重要源泉，恰恰基于他多取兼容的“杂”，这成为东坡文化的最大亮点和鲜明特色。

朱熹看到了苏轼思想与学术杂取释、道，三教并举的事实，实际上苏轼对于传统文化的吸纳借鉴，远不止于此。诸子百家、稗官野史、戏剧俳谐、渔樵杂弄、里巷谣讴、百姓家常、方言俗语，无不成为他学习、吸收、熔铸的对象。清人叶燮《原诗》论苏诗云：“苏诗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所不用。譬之铜铁铅锡，一经其陶铸，皆成精金。”^⑯不独诗歌如此。他平生不仅向书本学习，为自己规定了读书的“日课”任务，哪怕迟至三更，也必须完成当天的任务；他还性喜自然，走出书斋，观察万物，体验社会，向民间学习，把新鲜的感受和鲜活的语言用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了“八面受敌法”和近乎笨拙的“抄书法”，重点书反复研读，直至能够倒背如流，使用时信手拈来，驾轻就熟。一般书则广泛浏览，没有韩愈那样的道统和阅读禁忌，涉猎范围之宽，令为苏轼诗文作注的学者，感叹不已。王十朋云：“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

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恣肆，变化万状。”^⑰赵夔亦云：“东坡先生读书数千万卷，学术文章之妙，若泰山北斗，百世景仰，未易可窥其樊篱，况堂奥乎！”^⑱难怪乎连陆游、范成大那样的高产饱学之士，都不敢轻言为苏诗作注（见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⑲）。

神宗皇帝在与大臣讨论古今人才的时候，谓李白有苏轼之才，而无苏轼之学。^⑳苏轼的聪明才智本不亚于李白，加之他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一生过人地勤奋好学，具有广泛吸取传统优秀文化的虚心态度和去粗取精的超常判断力，造就了苏轼成为兼有众长、包容百家的文化巨人。苏轼自言其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所讲不只是一个文思问题或表达风格问题，同时揭示了学力宏富，功底深厚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极端重要性。就苏轼的书法而言，他于古代书家学过二王、杨凝式、徐浩、李北海、颜真卿、张旭、怀素等，但他并不满足于肖似某家某派；他也对当代名家虚心学习，如王安石、欧阳修、蔡襄、文同，甚至弟子辈的黄庭坚。他自言：“尝评（颜）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若予书者，乃似鲁公而不废前人者也。”^㉑综合前人的长处，形成兼容众人的特点，最重要的是消化吸收，体现自己的面目。他借张融“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的话，来表达他在书法个性上的不懈追求。^㉒有时达到了这样的艺术境界，就是艺术创造中最快乐的事情，曾言：“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㉓

苏轼在对古今文化营养的吸纳上，有“博观”、“厚积”之说，这种态度使他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自己文学艺术创造有用的东西，只有吸收的“博”与“厚”，才能有陶铸百家自主创造的“广”与“深”，这一原理，对于古今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适用的。

“通变”与实用 苏轼自幼读史，就留意通古今盛衰之理，希望通过把握和总结历史规律，来观察时政得失，思考所以安邦济民之方。成年以后，阅历渐深，对社会和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有了更多认识，逐步懂得了万物相生相荡、变化无穷的道理，他把“通变”提升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思考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在解说《易·恒》“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时指出：“物未有穷而不变。故恒非执一而不变，能及其未穷而变尔。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及其

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此其所以为恒也。故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穷也。夫能及其未穷而往，则终始相受，如环之无端。”^⑯自然万物之所以能够恒久不已，一至无穷，就是因为变化不已，生生不息；人世社会的道理亦然：懂得通变的道理，当社会出现弊端时，就应积极主动地加以改变；等到积重难返时，再想改变就来不及了。这实际上也是历史发展的经验反复验证了的。

君子为人，道理亦然。其解“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时云：“雷风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有雷风也。故君子法之。以能变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运矣。”^⑰用今天的哲学术语讲，不变是暂时的，变化是永恒的，所以君子处世，需要在不断求通求变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目的，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研究历史，观察万物，体验社会，反省自己，目的就是为了通万物之理，为自己的立身处事提供启示和经验。他在《上曾丞相书》中说：“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⑱通物理，观世变，能够增长人生智慧，提高人的见识和是非判断能力。

当苏轼设想着改变现实、实现人生理想的时候，他通过策论、史论、奏章和书信等文学形式，表达着执著的改革愿望和改革蓝图，充满“奋厉当世”的热情与雄心，他在《策总叙》中说作策论的目的：“庶几有益于当世”^⑲；他在《晁绎居士诗集叙》中称赞颜太初的文章“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⑳；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推崇欧阳修“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㉑。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无权无位的时候，他并不气馁绝望、怨天尤人，而是努力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观，期于尽快适应贬谪的环境和变化的人生处境，随遇而安，泰然处之；韬光养晦，伺机而动。他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关系，为当地民众做实事，以自己的方式施惠于民；同时利用减少公事俗务的条件，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实现新的多元的人生价值，黄州、惠州、儋州各次贬谪，莫不如此。在处于人生困境之中时，苏轼能够不放弃、不绝望，反而更加旷达乐观，是因为他懂得事物变化的道

理，祸福相依，臧否相循，没有一成不变的命运，只要保持信心，积极有为，未来永远是充满希望的。因此，“通变”之理，不仅有益于治世，同样有益于治生。

“约取”“薄发”与文学创新 苏轼早年在凤翔时作《稼说》，有著名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之说。晚年在与张嘉父的通信中，重申了类似观点：“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之后而成之，然后为得也。”^㉒如果“博观”、“厚积”指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兼容并包，广泛摄取，那么“约取”与“薄发”主要就对文化知识的运用而言，两相对举，体现了苏轼在继承中实现创新的文艺思想。

宋人生唐后，开拓甚难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对于宋代作家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坏处就在于突破唐人甚为艰难。宋代文学发展经历近百年的模仿过程，最终才摆脱唐人的影子，可见其难度不小。自然，唐人创造的文学成就与范例，也为宋代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发展的新起点。苏轼多次讲过，诗、文、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领域，在唐代都达到了“集大成”的水平，怎样超越，对于宋代文人来说的确是巨大挑战。然而，人们不难注意到，苏轼对于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们集各门艺术之大成的作用，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保留了委婉的批评和深刻的反思。《书黄子思诗集后》这种意识表现得最为清楚。苏轼在论述书法发展演变情况时，认为钟（繇）、王（羲之）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虽然集古今笔法之大成而尽其变，但是钟、王作品中的“萧散简远”之妙，却越来越少了。李、杜之诗，奄有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但前人各自的显著特色经过他们的集成之后被“废”掉了，“高风绝尘”的言外之致逐渐式微。^㉓苏轼在前述《记潘延之评予书》中，把自己的书法拿来与颜书、杜诗作比较，认为自己不同于颜、杜之处，在于似前人而不废前人。在这里，体现了苏轼独特的继承创新思想。

李泽厚认为，杜诗、颜字、韩文所代表的“盛唐”，与李白、张旭所代表的“盛唐”，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很大不同，后者代表的是不可仿效的“天才抒发”，而前者的意义，“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

美学标准的确定与建立”。⑩苏轼说他的书法“似”颜而不废颜，既表明了宋代文学艺术学习继承杜诗、颜字、韩文所代表的“盛唐”文化的发展事实，同时又反映出苏轼在书法等各种艺术领域努力创新，实现时代特色和作家个性的坚定追求。这种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他在《书吴道子画后》中所提炼的两句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这两句人们熟知的话前，还有“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一段同样重要的话。⑪杜诗、颜字、韩文的出现，古今变化的能事都已经做了，甚至他们完成了为后代确定艺术规范和建立美学标准的任务。生于其后的宋代苏轼们，正好不废他们的成果，学习他们的方法，在合理继承的基础上自出新意，形成时代风格和作家艺术个性。

宋代文学为什么总是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唐人创制的轨范之中，许多人不自觉地陷入继承与创新的困惑中找不到出路？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宋人背负的文化遗产的包袱太沉重，不知道如何卸掉包袱，轻装前进，走自己的独立创作道路。苏轼提出“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就是为了解决如何正确继承传统遗产的问题；而“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创作理想，就是为了解决如何在继承前人创作法度的基础上，自出新意妙理，凸显不同于前人的独立风格。前人的东西看多了，日积月累，创作时急需处理的是怎样不被前人的规矩程式捆住手脚，在合理酌取前人东西以后，很好地消化吸收，使之变成自己重新创造时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约取”与“薄发”的要义，在于少而精，约而要，关键在于成功的消化吸收，转化成自己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文注释：

- ①、⑩、⑪、⑫、⑬、⑭、⑮、⑯、⑰、
⑯、⑰、⑱、⑲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10页卷七十《书吴道子画后》、第227页卷八《策论·策略一》、第1324页卷四十六《谢制科启二首》其二、第741页卷二十五《上皇帝书》、第2189页卷六十九《记潘延之评予书》、第2202页卷六十九《跋山谷草书》、第2183页卷六十九《评草书》、第1378页卷四十八《上曾丞相书》、第224

页卷八《策论·策总叙》、第313页卷十《晁公遡居士集叙》、第316页卷十《六一居士集叙》、第1564页卷五十三《与张嘉父尺牍七首》其七、第2124页卷六十七《书黄子思诗集后》、第2210~2211页卷七十《书吴道子画后》。

②、⑩苏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22页卷二十九《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第319~320页卷七《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

③《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6页陈师道《后山诗话》。

④吴世常《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87页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

⑤、⑥苏洵《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页卷十二《上欧阳内翰第二书》、第522页附录一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⑦、⑨、⑭苏辙《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8页卷十苏辙《坟院记》、第1565页苏辙《藏书室记》、第1414页《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⑧《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赵令畤《侯鲭录》卷一第360页。

⑯《清诗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597页叶燮《原诗》卷三。

⑯、⑰、⑲《苏轼研究资料汇编（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73~474页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序》、第474页赵彊《注东坡诗集序》、第526页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⑯颜中其《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84页王巩《行营杂录》。

⑳、㉑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一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246页苏轼《易传》卷四、第246页苏轼《易传》卷四。

㉒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乐山师范学院纪委书记、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苏轼谢表的情感世界及其文体意义

阮 忠

内容提要：苏轼到地方任职或流贬地方的谢表以陈情为基本特征，往往体现了他哀惋凄恻和深感皇恩的内心世界。他在其中诉说自己的人生，学而笃志与论不适时的冲突，也形成了这些文字自我贬损与自我彰显的两面。同时，他的谢表用四六变体，具有深情委曲的风格。

关键词：苏轼 谢上表 情感世界 文体意义

古代散文里的“表”作为独立的文体是早已有之的事。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里说：“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据他说因礼仪产生的四品，就文体言则是四类，并涉及到四类文体的功用。客观上，其文体特征和功用都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像表，汉代为散体，在南朝骈文兴起以后多为骈体，或说四六文，其功用初为陈情，但以后却不限于陈情。

关于表，明代吴讷说：“窃尝考之，汉晋皆尚散文，盖用陈达情事，若孔明《前后出师》、李令伯《陈情》之类是也。唐宋以后，多尚四六。其用则有庆贺、有辞免、有陈谢、有进书、有贡物，所用既殊，则其辞亦各异焉。”^①他的话说得很明白，但对于“表”的研究，较多纳入人们视野的有孔明即诸葛亮的《出师表》、李令伯即李密的《陈情表》，更多的表文由于它们的文牍性质而不为好散文的研究者们关注，苏轼的表文也在其中。他的表文有谢表、贺表、乞表、进表、慰表等，这里想讨论的是谢表，且不是一般的谢授官表，而是他到地方任职之后的“谢上表”。

一、哀伤凄恻的凸现与感恩涕零

苏洵携二子出川赴京应试以求官时，给益州太

守张方平写信说苏轼和苏辙：“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②这里尽管说到苏轼兄弟文才的形成与实际所能，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苏氏兄弟的年少狂勇及俯拾青紫之心。苏轼实在没有想到，他勇于仕进以求兼济却遭遇了更加新锐的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成为他人生最具影响的事件。

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请求外放，以太常博士的身份通判杭州。赴任途中经过颍州，和弟弟苏辙一起拜会了在此地养老的欧阳修。随后兄弟相别，苏轼写了《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在其一中说“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此前，苏轼在嘉祐六年（1061）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辙在治平二年（1065）出任大名府推官，故兄弟二人有生活常态下的两次离别。这次的颍州之别，他与将任河南推官的苏辙同有遭贬之意，这即是“此别尤酸冷”的指向。他还在其二中写道：“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我生如飞蓬”可谓是一语成谶，苏轼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③就是明证。而此后，与他相伴的不仅有流贬地，而且有连续不断的“谢上表”。

在苏轼的文章中，他的“谢上表”保持着感恩的基调，最早于熙宁七年（1074）在密州写的《密州谢上表》是如此，最晚在元符三年（1100）得知量移永州时写的《谢量移永州表》也是如此。其间经历了26年的光阴。他在前者中称颂神宗皇帝的圣明，无论贤愚皆有所用，故自己未被捐弃，“臣敢不仰勤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而在后者，哲宗驾崩，徽宗即位，苏轼在北归的途中，65

岁的他这时说“天日弥高，徒极驰心于魏阙；乡关入望，尚期归骨于眉山。残生无与于杀身，余识终同于结草”。当然，由于二者产生的年代和苏轼的人生状态不同，均为报恩，情感的流露明显存在差异。前者所虑报恩在于安民，依然有政治情怀。后者所虑在于全身，以“结草”表白对皇帝之恩没齿不忘或来生再报，难免于衰颓之气了。

表文体上的“陈情”特征，在苏轼的谢上表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使其谢上表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最为突出的是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当时为琼州昌化军，他在绍圣四年（1097）抵达昌化军之后写的《到昌化军谢表》，文字不长，全引如下：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责授臣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臣寻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讫者。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轼中谢。

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文炳焕，汤德宽仁。赫日月之照临，廓天地之覆盖。譬之蠕动，稍赐矜怜；俾就穷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

苏轼在绍圣元年（1094）被贬惠州之后，随缘委命，安于惠州的生活且在惠州白鹤峰建了新居，作终老计，似无再贬之忧。不意刚迁入白鹤山新居，就得到远贬海南儋州的诏命，他遵命而赴海南，却在这封谢表里尽显当时的情怀。

此时他在昌化，与惠州一海之隔，子孙恸哭的死别之感，在他亦然。他视海南为鬼门关，自觉生还无望，仍不免在这封谢表里叙皇恩和自己的罪责。其尧、汤、月日之喻，仍依旧例在说皇恩浩荡，而“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及“死有余责”之说，当是再次遭贬之后对朝廷不肯宽宥的自然反映。苏轼的凄恻与哀伤，很容易让人想到他这位62岁的垂暮老人的不幸而哀怜，很可理解苏轼这时的痛苦，但他在谢表里并不忘“报德之何时”，还是一片赤诚忠心。

苏轼在写这封谢表之前的两天，即在从琼州赴儋州的路上，还写过几首诗，其中在《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里说“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他以想象中的群仙入诗，颇有与山谷间风雨相戏的情韵；又在《儋耳山》里写道：“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这首诗不及上首欢快，他用神话中女娲补天的故事，借“道旁石”调侃自己才无所用的遭遇，不免于苦涩的诙谐。但到了《到昌化军谢表》，情绪怎么就变得特别的低沉而难以自己呢？

司马迁曾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④他以此为理论支点，评说屈原《离骚》创作的动因。而苏轼在《英州谢上表》里说：“今日之臣肆其言，期于必戮。赖父母之深悯，免子弟之偕诛。罪虽骇于听闻，怒终归于宽宥。不独再生于东市，犹令尸禄于南州。”在这样充满感恩之情的言辞中，他的“父母”之说有更为直接的象征意义，他的《到昌化军谢表》就给了人“劳苦倦极”、“疾痛惨怛”之呼的感觉。在身陷人生困境而不再有前途、不再能尽享天伦之际，他向哲宗皇帝如是的诉说，有来日北归故土的希冀，却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并不作乞求的可怜状而让人产生几分敬意。

同时，苏轼《到昌化军谢表》的情感内敛，尤其是而对皇帝的感恩而自责性陈辞，让人想到他的“吾文如万斛泉源”^⑤论，他所说的文思泉涌且自然自由的写作状态，其“随物赋形”式的表现对于他的谢上表来说，则是情随景生，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

以苏轼的《到昌化军谢表》为例率先作论述，固然是前面说的该表在情感表现上最为突出。同时，也因为它是苏轼谢上表的情感世界进入极致的所在。在这样的时候，苏轼深知不仅是政敌章惇等刻意要置自己于人生末路，从年龄来说他也进入人生末路，几乎不再有政治上的憧憬。这样，苏轼的《到昌化军谢表》也构成他谢上表的分界线，一边是被贬儋州之前的谢上表没有真正与社会政治割裂开来，心气也不平和；另一边是从儋州北归途中的谢表，此时多是感恩之情的表白。不妨顺着上述，先说篇什甚少的后者。

苏轼北归途中的谢上表，主要是《移廉州谢上表》和移舒州团练使着永州居住写的《谢量移永州表》。按理，他在到常州之后，会有谢上表，但他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到常州后，“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余日矣”^⑥。自知性命不保而上《乞致仕状》，算是告老归田了。在这两封谢表中，苏轼虽然少不了也叙往事，但更多的是发乎内心的感恩。他被贬儋州三年，有“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⑦的旷达，但他真的是想回归故土。

只是现实的生存环境不如人意，所以他在《移廉州谢上表》中诉说自己在海南“食有并日，衣无御冬。凄凉百端，颠踬万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这时候的他更多地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诉说内心的情感所之。如这封表的开篇说“使命运临，初闻丧胆；诏词温厚，亟返惊魂”，相当真切地表现了他以为北归无望之时诏书突降之际的怖惧和诧异，这才“拜望阙庭，喜溢颜面”。但他的忠心耿介仍然是在的，说徽宗皇帝“悯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众忌获愆”，在感激陛下的再生之德、鞠育之恩时，说自己将不再求荣，以缄默处世而已。在《谢量移永州表》里则说：“海上囚拘，分安死所，天边涣汗，诏许生还。驻世之魂，自招合浦。感恩之泪，欲涨溟波。”苏轼自以为处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本处必死之境而帝许以生，死生骨肉之情实在是耿耿于怀的。

二、学而笃志与论不适时的自贬自显

苏轼好在谢上表里说自己的人生，主要是被贬儋州以前的谢上表中。他在《密州谢上表》中说：“臣家世至寒，性资甚下，学虽笃志，本先朝进士篆刻之文，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如是的自我贬损，也是他谢上表的基本格调。这时候的苏轼，因为遭遇贬谪，在谢上表里不能也不宜张狂，所说的“篆刻之文”语出西汉扬雄的“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篆刻”^⑧，即虫书刻符之类的玩意，与“陈腐之说”一样无用于世。这显然与他的实际资质和才能不符，让人从中感受到他的愤激不平。他在次年写的《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说：“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这倒是他真性情的表

达，与他在《密州谢上表》里的自我矫情式的贬损有天壤之别。但这里的学而笃志、论不适时，是苏轼自贬亦自显的重要人格特征。

苏轼初到密州时，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⑨。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他居然可以乐其风俗之淳，在山水之间放意肆志，游于物外，并与柳永婉约词相较，有“自是一家”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自言“老夫聊发少年狂”。此时，他似乎忘却了《密州谢上表》的自贬亦自显，但在熙宁十年（1077）移知徐州时，类似的自贬亦自显又出现了。

苏轼在《徐州谢上表》里说：“臣奋身农亩，托迹书林。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所谓“信道直前”是他的学而笃志，“立朝寡助”则是他的“论不适时”。同时以“坎井”即《庄子·秋水》里的坎井之蛙说喻自己不避狭陋之见，欲说则尽。结果则是：“顾慚迂阔之言，虽多而无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而犹坚。远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无罪，实深恃于至仁。”他称自己所说不过是“迂阔之言”，即孟子式的“迂远而阔于事情”^⑩。对于当时王安石变法来说，倒真是如此。但苏轼对神宗皇帝说，我可是一片忠心哪！他的“远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有屈原《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之意，说是赖陛下至仁而言之无罪，其遭遇流贬，何尝是无罪呢？但他忠心不改，“久而犹坚”，类似于屈原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在如是的陈情中，苏轼的幽怨与不屈溢于言表，这并不影响他在徐州率百姓竭力抵御黄河决口后的洪水泛滥，并得到两府和执政的奖谕；倒是影响他在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写的《湖州谢上表》把幽怨与不屈推向高潮。

苏轼在《湖州谢上表》里照例是自贬自损。他说：“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疏阔，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苏轼在湖州的时间甚短，元丰二年三月得到诏命，四月到湖州任上，七月因以诗文“谤讪”新政，被押解京城。

在这封谢上表里，他说自己的“独无寸长”、“有过无功”。这在有功于徐州之后，言过其实的意味是牢骚太甚，更甚者是随后说的陛下“知其愚不适

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对此作了诠释，说是不能追陪新进而能在钱塘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也安于他的教令。但此说极大地刺激了新进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和何正臣，三人轮番上书历数苏轼罪状，要求严惩，于是有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元祐三年（1088），他回忆往事，还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臣遂得罪。”⑩

“乌台诗案”，苏轼自以为性命不保，在御史台监狱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⑪的诗寄予由。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他谢上表风格的转折点，自知平生为文字所累的他，在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而写的《到黄州谢表》里，自贬之势盛而自显之势敛。

《到黄州谢上表》写道：“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圣矜怜，特从轻典。赦其必死，许以自新。祇服训辞，惟知感涕。中谢。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亲逢睿哲之兴，遂有功名之意。亦尝召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苏轼在“乌台诗案”中得以保全性命，感皇恩是自然的事。他不仅是感谢皇帝的不杀之恩，而且感谢皇帝自其科考以来的任用之恩。他很善于颂圣，“仁圣”、“睿哲”之语，“召对”、“试守”之辞，满是对神宗皇帝的谢意。他寻求自己的“自新”之路，首先是自我的反省，他说：“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违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虽至仁屡赦，而众议不容。案罪责情，固宜伏斧锧于两观；推恩屈法，犹当御魑魅于三危。岂谓尚玷散员，更叨善地。投畀磨鼯之野，保全樗栎之生。”在这里，他的“用意过当”和上面提到的“论不适时”不太一样，“论不适时”不意味着所论不合理，而“用意过当”则是“叛违义理”，不能说己之是，而断言己说之非。据法当有死罪，至仁的陛下却给了他黄州团练副使的职位，让他这个无能的人得以处于散员之列。

苏轼在密州、徐州、湖州等谢上表中显扬的忠心与才学在这里淡化了，其自责让人想到他出狱时写的“却对酒怀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⑫的自得，面对皇帝的自白与面对自我的自白原来有这样的不同。苏轼被贬黄州时45岁，是他人生最宝贵

的年华。在生与死无可抉择的时候，意外地却死而得生，他也表现出恶死而恋生。他说自己“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是皇帝陛下出之于死中，所以他当做的只有“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他真的是要痛改前非了。

然而，黄州时期的苏轼生活固然简单，但思想情感相当的复杂，创作也特别丰富。譬如他在词中所写，或是《江城子》里的“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或是《定风波》里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或是《卜算子》里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淡泊、傲然、孤独等等情怀都是有的。同时，在他《前赤壁赋》里表现出的与自然相融为一，在《黄州安国寺记》里所说的皈依佛门，无一不表现出他思想情感的复杂性。他的《黄州安国寺记》写于元丰七年四月，是来黄州的第五年。他在文中说，自新当求其根本，如果“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那么根本在哪儿呢？“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换言之，是在佛僧的领域获得六根清静，超越现实的人生。所以他会每隔一、二天就在安国寺里去“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苏轼把这种修身状态说得很美，他可能在一时间真心向佛，但没有使自己成为彻底的佛教徒。只是这种自省而畏罪之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延续，读他离开黄州以后的数封谢上表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此后，苏轼还有《谢量移汝州表》、《到常州谢表二首》、《登州谢上表二首》、《杭州谢上表二首》、《颍州谢到任表二首》、《扬州谢到任表二首》、《定州谢到任表》、《到惠州谢表》等。在这些谢上表中，他大体保持着《到黄州谢上表》的格调，仍然多是自贬自责。不过，他在《颍州谢到任表二首》之后，内心又变得不太平和，说了“意其忠义许国，故暂召还；察其老病畏人，复许补外”⑬，“洗心自新，没齿无怨。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⑭之类的话，时过境迁，他的幽怨重现，只是不像被贬黄州之前有些愤激。

三、情感浸渍且“委曲精尽”的四六变体

从上述可见苏轼谢上表的情感世界，他在仕途

上的起伏有太多的人生失落，不免于借“谢上”作自我的倾诉，一再感恩，反复自责以及内蕴的忠诚和无奈。同时可以注意到的是，苏轼的这些谢表都用的是四六体，与南宋谢伋说的“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⑩相应。其陈情固然有叙事，但由于情感的浓郁而具有鲜明的抒情色彩。当然，苏轼的四六文并不限于这些谢表，他的另一些谢表、谢启、谢状及其他馆阁文字，也多用四六体。如他的《谢翰林学士表》、《谢赐对衣金带马表》、《贺欧阳少师致仕启》、《答丁连州朝奉启》等。

欧阳修曾说：“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⑪他这番话不仅是对苏氏父子四六文的称道，而且涉及到四六文体的变异，他说是“变格”、“变体”。就文体论，这有很大的意义。欧阳修批评以前的四六文作家好炫博，所为之文则因广为征引而述事不畅，这意味着他所说的四六文变体当是平易且辞达理畅。不过，这不起于苏氏父子，而是他自己开创的。孙梅曾说：“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度。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古雅争胜古人。”^⑫当时欧阳修为文坛领袖，倡古文且以古文笔法写作骈文，实为苏氏父子的先驱。

其他不论，苏轼的谢上表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他得以摆脱传统四六文征引过繁的毛病，与他“辞达”的写作理念是相关联的。他曾在《答虔倅俞括书》、《与王庠书》、《与谢民师推官书》等篇什中都说过“辞达”，最见神采的是下面这番话：“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⑬辞达在于达意，苏轼在以辞达意之际，在意中浸渍浓情，或说是理与情兼，理情并茂。这也不是他的首创，先于他的四六文名篇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徐陵的《与杨仆射书》、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等都是如此。不过，苏轼不特征引或用事言情，其行文的平易又大不同于前人，从而使这些四六体的谢上表自具一

格。苏轼的四六体谢上表并非绝对的不用事，上面提到的“篆刻”、“坎井”均有所出。又如《到黄州谢表》里说的“保全樗栎之生”，其“樗”出自《庄子·逍遥游》的“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其“栎”出自《庄子·人间世》的“散木”即不材之木栎社树，尽管“其大蔽数千牛”。苏轼将二者组合在一起以喻自我，无疑是说陛下保全了我这个无用之人的性命。这在苏轼的谢上表中，的确很少见，他往往就事而发，表现自己的情感所之，理之所在。如他在《谢量移汝州表》里说：“虽蒙恩贷，有愧平生。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在这样的叙述中，他表白自己遭“乌台诗案”之后恐惧之心未退，而在妻儿、亲友的不理解中人生孤独感倍增，加之体弱、饥寒，真个是“只影自怜”、“厌其余生”。其后又在《到常州谢表二首》其一里写道：“积衅难磨，未经洗涤；至仁易感，许即便安。只荷宠灵，惟知感涕。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诛夷。向非先帝之至明，岂有余生于今日。衔恩未报，有志不从。已分没身，寄残骸于魑魅；敢期择地，收暮景于桑榆。”这时是元丰八年（1085），是量移汝州的第二年，他说自己能活着就当感谢，让我到汝州安置就到汝州，到常州安置就到常州，“敢期择地”？

苏轼的四六文就是这样在叙事言情，他曾说：“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⑭他把文章风格及功用的认识提升到国家安危的高度，就其中的文章言，显然是不主张重华采的。而他在《与侄书》里，把自己文章风格分为两个阶段：少小的“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的文笔趋熟，“乃造平淡”。他把前者定位在科考之文，那他遭贬之后的谢上表当是平淡之文，尽管他用“绚烂之极”来解释这些平淡之文。按照他的意思，这里的“平淡”似乎可以用苏轼评价陶渊明诗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⑮来诠释，是语言平易而意味隽永。他的谢上表就是如此。这意味着苏轼谢上表行文风格的“委曲精尽”。欧阳修如是评

价苏氏父子的四六文时并没有确指，且他去世的时候，苏轼有一些谢上表还没有问世。但现在看来，苏轼的谢上表显然处在其间。读这些谢上表，可以深切地感受他的言简而意深，或是意在言外。上面提到的“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即是。又如：“慈母爱子，但怜其无能；明君知臣，终护其所短。自欣投老，渐获安身。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慈俭临民，刚柔布政。参天地而有信，喜怒不陈；体水镜之无心，忠邪自辨。”^②

这时是元祐六年（1091），他本因弟苏辙任尚书右丞求知杭州以避嫌。但这一年贾易等人上书，说苏轼所报浙西灾情不实，苏轼乃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所谓“自欣投老，渐获安身”，56岁的他并没有真正获得“安身”，虽然如此，他以“水镜”之喻，说明历经漫长的岁月，自己的忠心可鉴。又如“伏念臣早缘窃禄，稍习治民。在先帝朝，已历三州；近八年间，复忝四郡。平生所愿，满足无余。志大才疏，信天命而自遂；人微地重，恃圣眷以少安。”^③他不像韩愈被贬潮州之后，在《潮州刺史谢上表》里诉苦乞怜。在“信天命”里，有人生的不可左右，一任如之；在恃圣眷里，蕴含求免旦昔祸福，却又担心不知祸福何时降临。那么所谓的“平生所愿，满足无余”，何满足之有呢？

苏轼很欣赏为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④的状态，客观地说，他的谢上表特定的陈情对象，注定了他不可能在这些谢表中具有如行云流水般的完全自然状态。而常常是欲言而止，余意袅袅。如《到常州谢表二首》其二的“生逢有作之圣，独抱不移之恩。废弃六年，已忘形于田野；沿泝万里，偶脱命于江潭。岂谓此生，得从所便”；《到惠州谢表》的“臣性资褊浅，学术荒唐。但守不移之愚，遂成难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诛夷。方尚口乃穷之时，盖擢发莫数其罪。”感恩及自责亦自显中，情感是很浓的，但理往往因不敢说或不便说而显得不透。

与苏轼这些谢上表风格相近的还有一些表启之作，如《答丁连州朝奉启》自述他从儋州归来心境的“七年远谪，不知骨肉之存亡；万里生还，自笑音容之改易”等，同样是情感浸渍而“委曲精尽”之作，因其不在苏轼的谢上表之列，姑且不再赘言。

论文注释：

①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②曾枣庄等《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③、⑦、⑪、⑫、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41页《自题金山画像》、第2363页《别海南黎民表》、第998页《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第1005页《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④、⑩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2页《屈原列传》、第2343页《孟子荀卿列传》。

⑤、⑥、⑨、⑪、⑫、⑬、⑭、⑯、⑰、
⑱、⑲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69页《自评文》、第2431页《乞致仕状》、第351页《超然台记》、第829页《乞郡札子》、第691页《颍州谢到任表二首》、第706页《到惠州谢表》、第1418页《与谢民师推官书》、第1363页《答乔舍人启》、第2515页《与苏辙书》、第690页《颍州谢到任表二首》、第695页《扬州谢到任表》、第1418页《与谢民师推官书》。

⑮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吾子》。

⑯、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册第34页《四六谈麈》、第5册第4955页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三。

⑱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893页《试笔》。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苏轼和陶诗琐谈

郑秉谦

内容提要：谈及陶渊明的个性和诗歌特点以及与苏轼的遭遇和心灵的深相契合，因而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心灵艺术的推崇毕至，他读陶诗、书陶诗、和陶诗，文章着重谈及苏轼和陶诗的概况、分类和风格等。

关键词：苏轼 和陶诗 琐谈

一

陶渊明冲淡随和、风神飘逸，是魏晋风度的人格化代表。但在他表面的冲淡飘逸之下，却深深埋藏着巨大的苦恼和矛盾，而这恰恰是魏晋风度的深刻内容所在。

政坛风浪本就险恶，在陶渊明所处的混乱动荡时代就更加突出。他是个政治斗争的自觉回避者，在他 63 岁的一生中仅仅出仕 13 年，在这 13 年中还曾两次归田；到了第三次，他便从只到任数十日的县令位置上退出，永离政坛。他做官的时间不长，官位比较低，并且“一心处两端”，随时准备淡出。因此苏轼有时就视他为处士，在《题渊明咏二疏》中云：“渊明未尝出，二疏（汉朝疏受疏广）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对陶潜远离政治的自觉与决断，晚年的苏轼是颇为欣赏的。从我们后世人看来，陶潜不以外在的功名事业而以内在的人格和不委曲以累己的生活作为自己的人生道路，算得上是一种人的觉醒。

苏轼是这样一个人：一方面学而从仕、忠君爱民，谨守儒家立场；另一方面又参以佛道，对人生的空漠感非常深重。两者经常交战于他的胸中。他被政治卷得很深，曾被朝廷任命为两学士、三尚书、八郡守，经历新旧、洛蜀两次党争，其间还曾入狱与遭逐，但他总是下不了决心跳出漩涡。一直到他 57 岁（1092）守扬州时，才想到需要一个可以“心

诣”的桃花源。这时恰好有人赠他一奇石，他名为“仇池”。按：仇池山位于今甘肃，仅一径可上，山顶另有天地。这表明他此时方觉“学道苦不早”，有愧于陶潜，从此开始和陶诗。62 岁（1097），他从逐地海南写信给同样放逐于雷州的胞弟子由，表明心迹：“渊明临终疏告（其子）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游西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遗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绍圣四年（1097）末，他在子由为他的“和陶集”所作的序中，加了一大段：“嗟呼，陶渊明不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多年，为狱吏所困折，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这是他在对自己进行拷问，也是在向世人释疑。

这一修改，是他们兄弟谢世后方始为世人所知的。据古人记载，六槐堂蔡祖康于宣和年间，曾从子由第三子苏远手中见过此序手稿，上有苏轼增改笔迹。这是可信的，因为苏轼此前就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东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忧患之余生，而后学道。虽为达者所笑，犹贤乎已（不学）也。”

他决心学陶渊明，并不以过迟为意。

二

苏轼对陶渊明其人所衷心欣赏的，还有陶渊明对社会礼法规范的突破，敢于直率展现自己的个性。

陶渊明是真正意义上的“性情中人”：他 29 岁才出仕，出仕的原因是“畴昔常苦饥，投耒去学仕”，仅为糊口，不以做官为荣。后来却因“不堪吏职”

而归田，也不以退隐为高。平生好酒，乡人召饮，他从不推辞，不以为难为情。州官召饮，他不去，不是自高身价，而只因不爱去。后来州官在他必经之路旁设宴，他也就应邀欢饮终日。他瓶无储粟，便求乞于亲友，还公然写了《乞食》诗，不以为耻。一旦有钱了，他却将钱全部送往酒家，预作了今后酒资，也不以此举为奇。贵官召饮，他让一个门生、两个儿子用破烂的篮舆将他抬去，不以为寒酸。席中言谈欢笑，也“偶美于华轩”，不以为俗。

他的这种真实、不做作的性格，令苏轼心仪。这在我们后世人看来，便是他不以社会礼法规范来束缚自己，能向世人坦然展现自己的赤子之心。

三

苏轼曾说：“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于其为人，实有感焉！”他爱其诗，也爱其人，因诗而爱人，因人而爱诗，互为因果，这种热情不断循环上升。一句话，他欣赏的是陶渊明身上与诗中所体现的魏晋风度。曾集前人研究苏轼之大成的清代王文诰说：“（坡）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通过爱陶和陶，苏轼得窥陶诗堂奥，对陶诗艺术的讨论与议论颇多。在坡公看来，陶诗大致有以下特点：

其一，陶诗自然天成，无人工痕迹。《冷斋夜话》曾记苏轼一段议论，其大意是陶诗成就来自陶渊明才高志远，选语精到，“如同大匠运斤，不见斧削之痕”。

其二，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曾致信其侄，说你们不可只看到我与你父（子由）晚年诗文平淡，但这平淡是从早年的浓墨重彩中化出的。他这样形容他与子由的早年作品，张扬生动“如龙蛇，手中把握不住”。言外之意就是这种平淡，实为淡中有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而陶诗则是我国诗歌创作史上外枯而中膏、似淡实美的典型，他说读陶“初读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即此意也。

其三，陶诗“真”。文如其人，陶渊明人真诗也真。什么是诗中之真呢？前人以为就是“事真，景真，情真，理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诗中有真生活真性情。苏轼对大自然、对乡村生活是一往情深的，十分喜爱陶诗“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一类句子。《晁氏客语》曾记载过一个生动的例子：“苏子瞻学士

一日在学士院闲坐，忽命左右取纸笔，写‘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句，大书、小楷、行、草，凡写七、八纸，掷笔叹曰：‘好！好！’散其纸于左右给事者。”

基于陶诗艺术的这些特点，苏轼曾说过：“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又一次，他在书写陶诗《饮酒二十首》的最后一首“羲农去我久……”后，提笔跋云：“每体中不佳，辄取读（陶诗），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对陶诗酷爱之情，可说溢于言表。

四

为了抒发对陶诗的热爱，他读陶诗，书陶诗，最后还来个“和陶诗”。他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可说是自我作古。从公元1092年到1097年（从守扬到贬惠儋），五年间共和109首，收为一集交子由序；从公元1098到1100年又和了15首。因之苏轼和陶诗实共124首。但后世对和陶诗篇数记载不一，常有出入。除了因记载者所见“和陶诗”不一之外，还可能因计算方法各不相同。如陶渊明《答庞参军》，系记庞卫过浔阳访陶渊明，分六章。苏轼和诗，则记周彦质过惠访苏轼，自过访、忆旧、欢宴、送行一气呵成；后人有把它算作一首诗的，但更多的则按陶渊明原作分成六首。此外如和《时运》、和《劝农》、和《停云》等也有这种情况。计算方法不同，诗数自然不能相合了。

这124首和诗，均苏轼亲作。但古人抑或以为其中杂入子由之作。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误会原因可能对子由序言的理解有出入。子由在序中说苏轼自斥居黄州，其学日进，诗比李杜有余，遂比渊明，“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子由原意是说自己虽努力奔跑，也赶不上苏轼诗歌成就；自己虽也写和陶诗，但仅苏轼的十之一二。后世不仅误会了这109首中有子由之作，有人还明指《和陶〈拟古九首〉》是子由写的。其实只要细读这组诗，不难发现第一首“有客扣我门”的语言风格、第九首“城南有荒池”的地名地标，都非苏轼莫属，中间七首亦然。

子由也和过《拟古九首》，但那是另外的九首。子由除和《拟古》9首之外，还和过《饮酒》20首，《止酒》1首，《杂诗》11首，《停云》4首，《归去

来兮辞》1首，等等。总数并不止是苏轼的十之一、二。

苏轼是说过和陶“要当和尽其诗乃已耳”的话，前人也有以为他确已“遍和”了。但事实上他来不及这样做，粗略计算，约有21首未和。未和的诗中，有单篇独立的，如《述酒》、《责子》等；也有组诗中的某一篇，如《杂诗十二首》的末篇。与此同时，却也有一篇而和两次的，如《拟古九首》中的“东方有一士”。其未和的篇章，或许因为内容不便，如《责子》；或许因为原作错简，如《述酒》。但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来不及和。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苏轼遇赦北上，迁延道路越年，此后便病逝于常州。

此外，苏轼也和过一首并非陶渊明亲作的“陶诗”。陶集《归园田居六首》之六“种苗在东皋”，南宋洪迈指出系由江淹《杂体三十篇》中混入的，苏轼当时没有细察，也写了和诗。

五

苏轼和陶，当然力追陶诗风格。以他晚年对人生的感悟，以他的大师功力，不难达到神似的境界。黄庭坚在荊州读了《和陶集》后，曾以诗跋其后，跋诗的后四句是：“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他是看出两者神似的。可是若对和陶诗加以仔细分析，也可发现其中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和诗”几可乱真者。《和陶〈饮酒〉二十首》之一，是苏轼和诗的第一首：“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如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它径情直遂，外枯中膏，意真事切，心宁神逸，确如陶作。古人也曾举出过不少类似的例子：如洪迈以为《拟古九首》之一，和诗“有客扣我门”，与原作“荣荣窗下兰”，“二者金石合奏，出于一手”。纪晓岚以为苏轼《和陶〈贫士〉七首》之五，“芙蓉杂金菊……”，“置之陶集，不可辨”。

第二种，努力学陶，但其间却不自觉地露出苏轼本色的。人们所常提起的，是他《和陶〈饮酒〉二十首》的末一首，诗中突然出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之句，这纯然是苏轼风格。《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之三，原作是：“种豆南山下，草盛

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和诗则为：“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见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初一看，风味颇相似；细一推敲，“仰见江摇山，俯见月在衣”这样的句子，可能很难在陶集中发现。

第三种，陶诗风格与苏轼本色水乳交融，化为一体的。《拟古九首》之五：“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苏轼对它的读后感是：“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其意为诗中的东方一士是陶渊明，而去访问东方一士的“我”即苏轼自己。他的和诗则是“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后人也不妨说，这海南的东方一士，也即苏轼自己。陶潜与苏轼两人，一人按自己的面目塑造了“东方一士”，一人按自己的面目塑造了“黎山幽子”，而黎山幽子又酷似东方一士。因此陶渊明、苏轼、东方一士、黎山幽子，四而一，一而四。苏轼是个超越他的时代的古人，他在近千年前就能这么平等地对待一个被当时士大夫视为禽兽之属的少数民族樵子，并按自己的人格与理想把他塑造成为一个高士。在这篇和诗中，既有陶渊明的远离俗韵、冲和恬淡，又有苏轼的人文关怀、热情畅达。这篇和诗同原作，两人的诗风与四人的人格，水乳交融，化为一体。苏轼自云比起陶渊明来，“学道虽云晚，赋诗岂不如”，信哉！

六

鲁迅先生在谈及陶潜时，曾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却是一个人，倘有出入，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陶渊明的深刻，即在其静穆飘逸之中包含了矛盾与苦恼。苏轼比起他来，被政治与世事卷入得更深，觉悟得更迟，因此矛盾与苦恼也就更大。陶渊明的魏晋风度，实际上是静穆飘逸和血脉喷张合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猛志固常在，刑天舞干戚”合一的。而苏轼的和陶诗，也不是一味静穆飘逸。

固然，苏轼生前可能未见“刑天舞干戚”这样的句子。因为当时的陶诗刻本上，此句已讹为“形夭无千岁”，直到苏轼身后的宣和年间才被学者曾纮所校正。（下转第28页）

苏轼和陶浅谈

段梦云

内容提要：苏轼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了大规模地追和，有百余篇的和陶之诗传世。不仅如此，他还以词隐括、以文诠释，从而与陶渊明进行着异代的对话与交流。诗、词、文三种不同文体的和陶作品共同记载着陶苏这两位伟大的诗人穿越时空的沟通，见证着中国文学史上这一页壮丽篇章的写就。

关键词：苏轼 和陶之诗 隐括之词 诠释之文 异同

纵观上下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陶渊明所留下的诗歌数量实在不可谓多。但是他所开创的古朴自然的田园诗风、轻落尘外的审美境界，以及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卓然傲骨、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悠然自适的隐逸志趣和随性洒脱的诗酒风流等，使他在中国文学的大地上站立成一座高耸的丰碑。陶渊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指引着后世无数士子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处世态度，甚至生活方式。

苏轼在历史的尘雾中重新发现了陶渊明，并引以为旷古知音。他热爱陶渊明之诗，但又不独好其诗，且是“如其为人，实有感焉”^①。他大规模地追和陶渊明，以致“追和之者几遍”^②，穿越六百年的历史时空，与陶公深深地呼应着，形成精神上的交相辉映。

其实，在苏轼的词与文中亦不乏对陶渊明进行隐括与呼应的作品，只是不如和诗那样成严整规范的体系。他的和陶诗是将拟古与和韵相融合的产物，是对陶渊明原诗依韵唱和而创作的成规模的诗歌。依苏轼自己的说法，他“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如此大规模追和古人，可为空前绝后，自成大观。而他在词、文作品中则是通过对陶诗的隐括或发表自己对陶诗所涉相关问题的思考来达到与陶渊明精神上的交会的。这些作品的数量并不

多，隐括之词只有寥寥几首，诠释之文也不过十几首而已，但他们却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

这三种不同文体的作品各具特色，又能体现出某些共通的风神。本文将就苏轼和陶之诗、隐括之词、诠释之文之间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和论述。

—

苏轼和陶作品虽有诸多差别，但既皆为追和陶渊明，自然能体现出一些共通点。

首先，苏轼创作这三种文体和陶作品的缘由都是一致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③。

第一，陶写伊郁。苏轼在《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中道：“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尚寄味此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奈此耳。”^④可见抒忧抒愤、怡悦性情是他和陶的重要动因。历经了宦海沉浮，体验过生离死别，阅历遍世间万象，苏轼有满腔的骨鲠要倾吐，于是和陶便成了他用来抒发自己情感的平台。

在诗、词、文三种文体中，苏轼的和陶都没有局限于对陶渊明及其诗文本身的应和与学习，而是借和陶学陶来抒发一己之情怀。王文诰在评苏轼和陶诗时说“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⑤苏轼和陶绝非对陶诗逐字逐句地加以临摹，也不仅是对陶诗风格的师范，“他所追求的不止是诗歌艺术的完满，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的完成”^⑥。他是通过和陶这一文学创作活动将自己的精神境界与陶渊明相沟通。

如，在《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一方面苏轼像陶渊明一样，尽情抒发了自己的“怨”，另一方面，读者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苏轼对陶渊明的追逐与神交。“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嗟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苏轼的和陶是在思想上、在精神上与

陶渊明的沟通。缘己情而起，承陶性而来，处处谨循陶情，又处处抒泄己郁。他的目的在于“以陶自托”，他所侧重的是神之交，他所追求的是心性上与陶渊明的契合与归一，他所书写的是自己的情怀和伊郁。

第二，喜爱陶诗。苏轼拨开六百多年的历史尘雾，重新发现了陶渊明，并将陶诗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赞颂陶诗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⑦他自述在得到江州东林寺的《陶渊明诗集》后，“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⑧。因恐无陶自遣，竟强制自己每次只读一篇，东坡真是可爱之至。由此，他对陶诗的喜爱也溢于纸上了。然而他又无法仅限于读陶了，并对陶心追手效，遍和其诗。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苏轼“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将一百多首陶诗几近和遍，如此大规模地追和前人之作，可以说，若少了那份至深的喜爱和浓厚的追慕情怀是断然难以持恒的。

第三，感陶为人。苏轼曾说过：“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⑨。苏轼不仅爱陶诗，对陶渊明的为人更是推崇备至。他称赞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也正是因了这份推崇，更促使他“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如《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一词中，前世与今生这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则见出苏轼对陶渊明诚挚的情感和强烈的认同。从词的表面看，是说自己躬耕东坡，而东坡景致与陶渊明诗中的斜川之境十分相似。但在深处所表达的却是自己同与世乖违、躬耕陇上的陶渊明之间心灵的息息相通和思想精神上的契合，抒发的是人生抉择上与陶渊明趋同的意向与愿望。其文《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中，“若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与此词中“只渊明、是前生”一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极平极淡的语言中深藏着不尽的意味。

这一点在苏轼的诸多和陶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可见，苏轼对陶渊明人格的敬仰无疑也是他和陶的重要动因之一。

再者，从作品风格上看，苏轼的和陶最终都归于一个平淡。苏轼晚年有意“师范”陶渊明，陶诗

质朴平淡的风格便是他师范的对象之一，而使他的和陶作品表现出平淡朴实的风格。但这平淡又绝不是白话一句，却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苏轼称赞陶渊明的诗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而他自己和陶作品也正是力求师法陶诗的精神和风调，体现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特点。

如《和陶游斜川》一诗，“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一句，纯为白描的记录，但看似质朴的实写，美妙的诗境却自现了出来，“有自然之乐”，秀丽灵动，质而实绮。同样与陶《游斜川》诗相关的《江城子》一词中，“都是斜川当日境”一句亦是如此，出语淡然，却能荡开一笔，将无限风景蕴于简单的七个字之中，惹人遐思。再如，其文《书渊明述史章后》，全篇仅两句，曰：“渊明作《述史九章》、《夷齐》、《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余载，吾犹知其意也。”却表达出异常丰富的内涵。寥寥二十余字，不仅解读了渊明之诗，表达了对渊明诗的赞赏态度，而且寄予了自己的深思与感慨。不仅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动的心有灵犀，还表达出一种虽去五百载，“吾犹知其意”的肯定与自信。

可见，苏轼的和陶作品都同陶诗一样，皆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典范。

二

即便有如此多的相通之处，但是苏轼的和陶作品仍表现出大不相同的风貌。

首先，从写作的内容看，诗、词、文便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据《追和陶渊明诗引》载，苏轼曾说过：“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可见，苏轼作和陶诗实乃有意而为之，他是将和陶诗作为一种文学发展史上的独创而致力于做好。相比，词、文的创作则要随性一些。所以，和陶诗的内容更加多面而深广，其和诗的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揭露朝政黑暗。苏轼一生屡遭政治迫害，而其中多次皆是因诗文所慨得罪权贵而遭致祸患。友人们也曾多次劝他“休问事”、“莫吟诗”^⑩，无奈苏轼天生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硬骨头，面对官场的浑浊与黑暗，面对民生的疾苦和不堪，他偏要写文作诗，大吐骨鲠。典型的例子如《和陶拟古九首》其六：“贪人无饥饱，胡椒亦求多。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诗人将矛头直指朱初平、刘蕡

两大贪官，揭露了这帮“沉香作庭燎，甲煎粉相和”的贪官污吏搜刮民脂到连胡椒这类调味品都要疯狂聚敛的丑恶行径，对他们鱼肉百姓的恶行进行直截而猛烈的斥责。那么如此压榨下贫苦不堪、无以聊生的百姓呢？“本欲竭泽渔，奈此明年何”的慨叹表达了诗人对黎民百姓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和深深忧虑。

其二，抒写自我形象，表达人生思考。苏轼的和陶诗，可以说，是苏轼在社会价值和个体的自我价值之间矛盾的产物。所以，总的看来，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亦是苦闷之人与旷达之人的统一。苏轼的人生际遇使这个心系庙堂、胸怀天下的士子无法实现其社会价值，因而难免有不平之气。气不通则苦闷，气通则旷达，在这苦闷与旷达之间见出诗人对人生思索与探求。

《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是苏轼最早写作的和陶诗，其一便明显可见一种郁郁不平之气，透露出诗人浓浓的酸楚、无奈的自嘲和难抑的愤然。好在诗人是一个善于超脱之人，能从酒中识得趣味，甚至即便无酒，空杯亦能自得其乐。然而，又有谁能说诗人的超脱不是故作旷达呢？人生失意，又无酒盈樽，在空杯把欢的背后该是怎样孤寂苦闷的心啊！较之，《和陶拟古九首》其四则旷达得多。全诗境界阔大、气象宏伟、格调高昂，表现出一种豪迈旷放之情。其末句“芋魁倘可饱，无肉亦奚伤”，将思绪从宏观环境转向微观心理，体现出诗人超然旷达的情怀。虽言至饮食细处，却丝毫不伤豪迈之气。

在和陶诗创作的时期内，诗人的苦闷不平与超脱旷达这两种情感是交叉体现而贯穿其中的。在苦闷与超脱的挣扎和矛盾中，苏轼表达着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与求索。在他的和陶诗中，他常将自己置于陶渊明所提出的问题或相关问题中进行议论，表达着他对于现实对于人生的思索。

其三，表现岭南风土人情。苏轼谪居岭南，并且很快喜欢上了谪居之地，这在他的和陶诗中也有不少流露。在著名的《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其四中，他以岭南老父热情邀请他吃荔枝一事来展现岭南乡风民情。“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邀请诗人前去吃荔枝，还嘱咐他将剩余的打包带回去给儿子吃，并明确警告诗人不许空着手回去，足见岭南人民的淳朴可亲及乡风的淳善。最高妙的还是诗歌的最后两句，“有

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老人家没有酒，主动提出要诗人把酒带去给他喝。生动活泼的场景、率真可爱的老翁，简直要从纸上跳了出来，真可堪与孟襄阳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相媲美了！

苏轼隐括之词与诠释之文所写的内容，较之复杂的和陶诗就要简单多了。

其和陶词的内容主要有对陶渊明原诗的隐括和对自我襟怀的抒写两方面。苏轼词中的名篇《哨遍》（为米折腰），便是对陶渊明《归去来辞》的隐括，苏轼对陶渊明原作进行剪裁和改写，使之符合声律，适于扣节而唱。

但即便是隐括陶诗，苏轼之意仍在于抒发自我襟怀。《哨遍》是对《归去来辞》的隐括，全篇字皆为陶诗之境，句句皆写渊明之事，但又处处有一个“我”在。词的下阙写的是陶渊明的人生观、价值观，但又无一不是苏轼自己的。括写陶渊明的背后，更吟唱着苏轼自己的思想情感，抒发着他自己的“归去”之愿。再如《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一词中，“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有在梦中才更明了，在醉时才更清醒。一方面，有点“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意味，点名了自己无奈而孤寂的心境，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种极淡而又实有的不平之气。“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更发散出一种难以掩遮的酸味，郁郁难息。“只渊明、是前生”仅仅六字，却蕴含了不尽的涵蕴。前世与今生这非同寻常的关系，表现出苏轼在思想感情、人生志趣等方面与陶渊明趋同的倾向。而“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则直接地表现出苏轼对陶渊明人生抉择的赞赏之情，也展示了他心中对归去田园的属意。

苏轼的诠释之文主要是写由陶渊明其诗或其人而引发的思考和感想，是对陶诗以及陶渊明其人具有情趣性的接受和阐释。这类作品在苏轼的文集中大致归属于史评和题跋两类文体之下，但又绝不同于寻常之史评与题跋。在苏轼的笔端，虽是评论，但评中抒己，不仅是对文本、事件或陶渊明其人的欣赏，更是与陶心灵的沟通。虽是题跋，但所题之辞全是对因读陶而引起的随想、趣想的记录，是在人生境界上对陶渊明的真情呼应，也是对自己人生旨趣的表达。这些作品所写作的内容相当的随意，但细细咀嚼，那些随感而发的慨叹，随性而品读出的感想，无不是与陶公的对话与交流，也使读者见到一个更生活化的、更真实而有情趣的东坡。

如《题渊明诗二首》其一，由陶靖节的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苏轼引出“非古之偶耕执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的感叹。一方面表现出陶渊明是真正以归隐田园为志并躬耕实践淡漠尘俗的，见出作者对陶渊明的肯定与赞扬。另一方面，苏轼自言为世农，拉近了自己与陶渊明的距离，又言“非余之世农”不能识得陶诗之妙，更将自己置于陶渊明知己的位置，由此来欣赏此诗并从中透露自己的情怀。再如其二，是读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七几引发的思考，“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自由而随性的解读和点评看似淡然，但作者心中褒贬与价值取向读者已能了然于胸，其中也不难体悟出对陶渊明的肯定与呼应。

诗、词、文，三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使苏轼在创作和陶作品时所选取的写作形式和手法亦是大相径庭。

和陶诗是和韵诗，是以和韵的形式来追和陶诗。诗歌发展到宋代，其格律与句法皆已是成熟之至。而苏轼的和陶诗又不得不受到陶渊明原诗诗韵的限制，可谓是多重约束，所以更有“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和陶诗正是苏轼超越语言束缚，抒写心灵自由的实践，他篇篇句句依韵和之，或承陶意，或露本色，挥笔即就，游刃有余，似毫不费力。而且，苏轼和陶诗的写作手法也是十分多样的，如王文诰所说，“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意，信口改一韵者”^⑩，苏轼和陶诗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带着镣铐跳舞”，却跳得无比自如。

相形之下，隐括之词与诠释之文的写作则自由得多。

其词主要是重于括陶之意，注重对陶诗真意和神韵的发掘和隐括。如其《哨遍》一词便为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而作，但苏轼的目的绝非玩弄文字，而是要采陶之精髓、抒己之怀抱。

其文则主要写一些思考和感想，带有随笔的性质，因而更重于承陶之性。苏轼深感于陶渊明的为人，而陶之为人亦不折不扣地影响了苏轼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方式。这在苏轼这类短文中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如《书渊明东方有一士后》，作者饮醉食饱、午睡既觉之时，忽觉此东方一士即渊明也，还欲探知那从游者是谁。认为若得此一段，便能与渊明心

性相合，融而为一了。极具随笔性质，所记一时之感，尤见一个真实亲切、富有情趣，甚有渊明之风的苏东坡。

以不同的形式和手法表达不同的内容，这又使苏轼的和陶之诗、隐括之词、诠释之文各自形成了独具的风格。诗庄整，词秀丽，文随性，风神迥异。

和陶之诗是苏轼有意为之，且有意形成规模效应的。上文已经讲过，苏轼是将之作为一种得意的独创而认真对待致力于做好的。和陶诗内容广博而丰富，却首首借陶自托，手法灵活多样，却篇篇谨遵陶诗的声律。而且苏轼又用严整的对仗，常“出新意于法度之中”^⑪，使诗歌形成了庄整的特点。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其五，前三联皆为工整的对偶句，“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见此野老足。愿同荔支社，长作鸡黍局。”再如，“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其二十），“丈夫贵出世，功名岂人杰”（《和陶郭主簿二首并引》其二）等等，属对精严，使诗歌端庄而高妙，严整亦自然。

隐括之词与诠释之文则是自由的创作，数量相对少得多，风格也与和陶诗大不相同。

其《江城子》一词，虽不难嗅出其中酸楚，但东坡有超脱之能，寻得渊明是前生，愿寄余龄“斜川当日境”。不消说雪堂淡雅秀丽的景色，只那一句“斜川当日境”，不免勾人想起渊明游斜川时“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鱗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的美好景色，这景色美却不艳，是素淡的、雅致的，如一幅灵动的水墨画，不只给陶诗，也给苏词增添了一笔秀丽之美。《哨遍》隐括渊明之诗，也囊括了《归去来辞》中的诸多景象，松菊、孤云、飞鸟、童稚、征夫……素淡的人物山水，素淡的美。这一切使苏轼的隐括之词表现出素雅而明丽的词境，体现出秀丽的风格。

其诠释之文则往往是茶余饭后、酒毕话间，灵感随性而起，挥笔即就的一些短章。随性为其一大特征。如《渊明非达》和《渊明无弦琴》二文，皆是因渊明作《无弦琴》，诗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而发之感慨，所得却截然不同。《渊明非达》一文认为“无琴也可，何独弦乎”，而得出渊明非达之慨。《渊明无弦琴》则是说琴本非无弦，亦非渊明不知音，而是“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针对同一事件，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想和接受，可见是东坡此一时之

感此记之，彼一时之物彼复记之，足见其写作内容的随意性和写作方式的随意性。

另外，苏轼晚年喜陶诗，有意“师范”其诗风，而呈现出平淡自然的风神。但是这种风神在和陶之诗、隐括之词、诠释之文三种不同文体中所呈现出来的又有所差异。

和陶之诗的审美距离相对较远，诗歌的意象能在很大的时空范围内任意展开，且常将目光投射于宏观的环境，仿佛诗人站在至高至远处高瞻远瞩，一切景象都逃不过他的慧眼，而被信手拈来任其所用。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首句“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便是从宏大的外观环境写起，意象阔大。进而以“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方过渡到对生活本身的关照。再如“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其二十），杯盏间数百年的时光移行换影，无数惊天动地的旧事洗消殆尽。阔大的意境与诗歌跳跃性的语言使苏轼的和陶诗在平淡自然的风格中加入了一些跳跃性的元素。

隐括之词的意境就要和缓得多了。如《江城子》中，东坡雪堂，雨后新晴，鸟鹊唱，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像一个不曾间断的镜头缓缓推移。再那一句“都是斜川当日境”，更是荡开一笔，转向悠远不尽的想象之中。虽然是淡然一笔，却舒缓而余味不尽。

诠释之文中则是淡得只见“枯淡”了，它甚至只若一个老人闲时的自说自话，不见任何饰染和技巧，落尽繁华，唯见真淳。但这“枯淡”绝不是枯燥。苏轼在《评韩柳诗》中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⑩这句话用于评价苏轼自己的和陶文同样适用。“外枯”是指其外在形式之朴素平淡，“中膏”则是指内在含义丰富充实，有不尽之意深藏其中，而愈嚼愈有味。如前文提到的《书渊明述史章后》，全篇虽仅两句，所表达出的内涵却非常丰富。前文已作分析，此不赘述。再如其《书渊明归去来序》一文，是苏轼读了陶渊明《归去来辞》，尤其是其中“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一句而引发的感想，看似是“聊为好事者一乐”，实际上，作者的见解与褒贬态度早已暗含其中。苏轼借“储粟”之“瓶”行自我发挥，还使读者见到一个更生活化的、真实幽默而富有情趣的东坡。并且在他这自我发挥中又深含着对陶渊明的肯定。圆活流转间透露出丰富的信息，真可谓是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⑪。

三

还值得注意的是，三种文体的风格为何会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体裁的限制。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自己的特点，诗、词、文三种完全不同的体裁也就使得苏轼作品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在古代诗歌中，拟古诗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魏晋时期，鲍照的拟古诗就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和韵诗也同样有着久远的传统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历代士子文人之间的唱和，一方面是他们思想与情感交流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别致的风流。如白居易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与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便是流传千古的佳唱。苏轼的和陶诗是在前人荫泽之下，对拟古与和韵的两相融合。所以，他的和诗虽豪放洒脱，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在前辈们的创作中所形成的传统和规律的约束。他严格依从陶诗之韵，诗歌的内容也或多或少与陶原诗相关系。又由于诗既典且雅的特征，和诗言志的传统，更适于表现相对严肃而庄重的题材，苏轼在他的和陶诗中表现了大量关乎政治和人生的内容，从而形成了端庄而严整的风格特点。

但是词却大不相同。在陶渊明生活的年代，词这一文学式样远没有形成，苏轼以词隐括陶诗也没有所要依照的传统和遵循的规律。因而，在词中便有了很大的主动性和自由性，可以放开手脚任意发挥。故苏轼的词作中有隐括陶诗，或感陶而作等新颖而自由的形式。另外，词这一文学形式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便是它的音乐性。苏轼隐括陶诗，也是为了“使就声律”，适于扣节而唱。苏轼的和陶词既有旷达的精神，又有秀色的风景、和谐的声律，因而表现出素雅流丽之美。

而散文，特点之一便在于其散。散，故皆随作者笔至而就，所写全由作者一人而定。以文诠释陶诗，自然也无法像和诗那样严整，而是抒写与陶相关的感想与思考。这些感想与思考全由陶而来，但表达的方式却是随作者喜好的，于是就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也更见出作者的真性情。

第二，与苏轼的创作态度相关。诗、词、文三

种不同的文体表现出各不相同的风神，可以说也是苏轼有意为之的结果。

这三种文体中，创作时间最早的是隐括陶诗之词。它们或许只是苏轼不经意间灵感一现创作而成，只是零星几首并不成规模。但这几阙词为十来年后大规模地和诗提供了启发和先前准备。相比，苏轼作和陶诗乃有意而为之，是要当做文学史上的得意创造而努力做好的。所以，较之词文，和陶诗的内容广博而严肃，形式严整而端庄。至于其文，与苏轼笔记小品文的风格十分相似。辞能达而气通脱，圆活流转而自然率真，字数寥寥却韵味隽永。袁宏道在《三苏文范》卷首引言中说：“东坡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苏轼晚年尤喜写这一类的“小文小说”，在这些文章中更表现出一个真性情的自我，并且独具特色。他诠释之文能体现出如此风格，可以说与这不无关系，也是苏轼有意为之的结果。

苏轼的和陶之诗、隐括之词、诠释之文拥有诸多共同的性格，但又各具特色。也正因此，三种文体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它们是陶苏精神相交的产物，但反过来，也正是通过这些诗文为载体，两个缱绻的诗魂得以更好更深地沟通，才写就了中国文学史上这一页独具魅力的不朽篇章。

论文注释：

①、⑦、⑨转引自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62页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

②引自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93~1002页《附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③参看文迪义《苏轼和陶诗浅论》，2009年第4期《凯里学院学报》第27卷。

④、⑧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26页苏轼《与程全父十二首》、第2091页苏轼《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

⑤转引自棘园《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1981年第4期《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5~52页。

⑥〔韩〕安熙珍《苏轼“和陶诗”二题》，2004年第7期《学术研究》，第133~135页。

⑩据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载，苏轼遭贬，通判杭州，离京时，好友文同曾劝他道：“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⑪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①、③、⑨转引自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苏轼《书吴道子画后》、第159页苏轼《评韩柳诗》、第158页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2006中文一大班）

（上接第22页）但苏轼对陶渊明诗文中所涵的多种题材、多种感情却是知道的。他曾几次指出“渊明非达”，有一次说：“渊明作《无弦琴》诗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子曰：渊明非达者也。五音六律，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无琴可也，何独弦也。”

陶诗中有归园田，也有咏荆轲；即使一篇之内，也前有“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后有“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也就是既有愤愤不平也有悠悠我心。前人还指出，他写夸父追日、道渴而死的诗，最后说“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指夸父之杖化为邓林荫庇后人，他其实是慨叹自己在世“欲为而不能者”。今人更一再指出，陶诗中的“今我不为乐，还有来岁不”、“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出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虽世外之言，却饱含人间风波。

苏轼以其文化大师的犀利眼光，是早就感悟此点的。因此他的和陶诗中，在出世之愤这一主流之外，也是五味杂陈的。

举例来说，和陶诗中有哀惋悱恻的悼朝云诗。他以长春花来比喻自己的红颜知己，说她美艳如“卯酒晕玉颊，红绡卷生衣”，动人如“低颜香自敛，含睇意颇微”，个性张扬如“頰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挥”；表现了苏轼的深切怀念之情。也有一送、再送，以至三送张中的诗：这位儋州的军使因一再庇护、帮助苏轼，而被苏轼的政敌调离儋州。苏轼在这三首和陶诗中，哀叹两人“暂聚水中萍，忽散空中云”，叮嘱张中“汝去莫相念，我身本无依”。这些诗都如苏轼自己所说的，“情爱着人如油腻，欲去不能”，显得执着无奈。和陶诗中甚至还有直接抨击政治腐败的篇章，如《和陶〈拟古〉九首》之七，无情揭露荆南副运使朱初平与广西常平刘谊两人的贪赃枉法，讽刺他们贪得无厌地搜刮民财，“贫人无饥饱，胡椒却求多”。可见苏轼和陶诗亦非一味静穆之作。

2009年5月24日定稿于杭州

（浙江省作家协会前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温州大学兼职教授）

苏轼与赣州的文化认同

李云彪

内容提要：苏轼一生曾两次路经赣州，一次是在绍圣元年，一次是在元符三年。两次停留赣州，时间虽然短暂，但上至官僚名流，下至乡贤士绅，苏轼都有所交往。在与他们携游唱酬的过程中，苏轼尽览赣州的美景佳胜，题诗寄概，遗留文墨44首^①。两次暂留赣州，苏轼都有着相同的感悟：官宦沉浮已如昨日黄花，友谊至交才能恒古不变。在与赣州官绅士民的诗酒唱酬中，苏轼一路畅游美景佳胜，欣然起行。

关键词：苏轼 赣州 诗酒唱酬

今天的赣州，涵盖了北宋时的虔州府（以下简称虔州）和南安军^②，为宋时三十座名城之一^③。苏轼一生曾两次路经赣州，一次是在绍圣元年（1094），因“所作词令，以为讥斥先朝”而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④。赴贬所途中，苏轼坐船溯赣江而上，过十八滩，八月“在虔州出陆”^⑤。受知州黄元翁的邀请，苏轼停留虔州月余，九月经南安军过大庾岭出赣州地界。第二次是在元符三年（1100），徽宗新立大赦天下，苏轼“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⑥。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苏轼过南安军至虔州，因“须水度赣”^⑦，在虔州又暂留四十余日^⑧。苏轼两次停留赣州，时间虽然短暂，但上至官僚名流，下至乡贤士绅，他都有所交往。在与他们携游唱酬的过程中，苏轼尽览赣州的美景佳胜，题诗寄概，遗留文墨44首。为纪念苏轼，后人在光孝寺左建东坡祠^⑨。

一、苏轼与乡贤士绅

名扬天下的苏轼，早已为士人所熟知，不论他走到哪里，身边都会有朋友相随。在赣州，苏轼交友也十分广泛，特别是与虔州阳孝本、孙勣、钟志

仁、田辟等乡贤士绅交好。

（一）“道不二，德不孤”的阳孝本

北宋元祐年间，有郡人栖遁通天岩，知州林颖见他学博行高，为其居处题匾“玉岩”，并尊其为“玉岩翁”。这位“玉岩翁”就是阳孝本（1039~1112），字行先，赣州上犹人。北宋熙宁中游上庠，耿介不妄交。苏颂、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荐之。但阳孝本远俗养志，不喜为官，届期学满，携书归隐。“漫浪著书酬素志，逍遥齐物载清谈”^⑩，笃学的阳孝本在通天岩讲学著书二十年，一时名士多从之游。大观元年（1107），朝廷举八行科，知州郭知彰以经行优异荐于朝，阳孝本应诏，赐官登仕郎除国子学录，后转宣教郎秘阁校理。俄迁直移阁提举洪州，赐绯衣银鱼袋。不久，阳孝本告老返乡，复居通天岩，日与李存以恬退相觞咏，时号“崆峒二老”^⑪。

一〇九四年八月，苏轼南贬至虔州，慕名前往通天岩，拜访阳孝本。二人一见如故，“深讶相遇之晚，遂为刎颈之交”^⑫。在苏轼逗留虔州期间，阳孝本多次前往苏轼下榻的慈云寺拜访。八月二十三日，两人偕游真君楼，谒祥符宫真武像，“拜九天采访使者堂下，观观妙法像”^⑬。出祥符宫，阳孝本和苏轼观廉泉。在廉泉，情谊甚笃的两人秉烛夜话，促膝谈心，留下少为人知的名章锦句。

此后，苏轼贬惠州、迁儋耳、移廉州、徙永州^⑭，两人便中断了联系。苏轼遇赦北归，重游通天岩，访寻“西郭逸民”^⑮。来到阳孝本家，苏轼直入其室，戏以“元德秀”呼之。阳孝本回应道：“吾非元德秀，乃阳城人后裔也。”^⑯苏轼见阳孝本志行高洁，尊其为“玉岩居士”，并赋《次韵阳行先》。为感谢赋诗，阳孝本以“异书”《登真秘诀》

相赠。在分别时，为感谢友人的款待，苏轼又在阳孝本的画像上题真赞。

苏轼没有逃过官宦沉浮的渊薮，但他的心却在天地中遨游，“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⑯，孤独的他，拣尽寒枝不肯栖。阳孝本“道不二，德不孤”^⑰，让苏轼感到相知之意，好在水中人，到处相娱嬉。为纪念两人高山流水般的友谊，后人在廉泉边建夜话亭，亭内刻“苏阳二公夜话图”，以寄高景之思。

（二）“世契之交”的孙家

早在京城同朝为官时，虔州人孙立节便与苏轼相识相知。熙宁初，苏轼通判杭州，孙立节使其长子孙勰（字志康）受业于苏轼门下。当时，孙勰年未弱冠，苏轼极为称许，让长子苏迈与他相游。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礼部贡举，孙勰以荐书至京师。苏轼“得其呈文于黜籍之中，擢实第六人，廷试复居第六”^⑱。可见，虔州孙氏与眉山苏氏之间的深厚源渊。

苏轼北返过虔州，孙勰的弟弟孙勣（字志举）“远辱临访”^⑲，从家乡虔化县（今赣州宁都）赶到虔州，访苏轼寓所于水南，请苏轼为其父孙立节作墓志铭，苏轼挥手而就，为之作《刚说》。在苏轼寓所，两人相处甚欢，苏轼得知孙勣卜居延春谷，其地“环堵萧然，瓶无储粟”，榜其庐为“竹林隐居”^⑳。孙勣著述甚丰，尤工于诗，苏轼读后，称赞道“清诗五百句，句句皆绝伦”^㉑。在相互酬唱中，孙勣拿出苏轼赠予的诗词，苏轼见到侄儿所赋诗词后大为高兴，随即应和《和犹子迟赠孙志举》和《用前韵再和孙志举》。苏轼幼子苏过见长者谈笑风生，也附和一首《用伯充韵赠孙志举》。当时，孙勣的外甥崔甲（字次之）一同前来拜访，请苏轼点评自己的诗文。苏轼阅后，见其为文“萧然有出尘之资”，十分赏识，称赞道：“诗文非他师，家法乃富春。岂非空同（崆峒）秀，为国产俊民。”^㉒

一一〇一年三月，苏轼舣船发虔州，孙勣为之送行，两人“为舟次执别”^㉓。之后，由于交通不便，孙家与苏家往来甚少。政和二年（1112），当苏过出监太原府税时，孙勰作为张近的幕僚亦到太原，两家便开始恢复交往。在太原，苏过与孙勰交谊甚厚，偕同游玩太原的名胜古迹，屡有唱和。

一一〇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苏轼应孙勣之请为

其父孙立节作《刚说》，一一〇年九月，苏过应孙虬之请为其父孙勰作墓志铭，两家关系之密切，可谓世契之交。

（三）“虔州旧友”钟氏兄弟

苏轼自海南归，遇其外甥柳展如，出文一卷示之，说“这是我在岭南时写作的诗文”。柳展如读后，评论道：“《天庆观乳泉赋》词意高妙，当在第一；《钟子翼哀词》别出新格，次之；他文称是。”苏轼以为知言。^㉔

《钟子翼哀词》是一一〇一年二月，苏轼重过虔州时所作。在虔州，应钟志仁、钟志行、钟志远兄弟的邀请，苏轼到庐造访。当谈到父辈们的友谊时，相持而泣，苏轼无以致其哀，乃为其父钟棐（字子冀）追作哀词，其实，钟氏与苏氏的友谊，源于苏洵与钟棐时代。庆历六年（1046），苏洵赴京参加制科考试，落第后心若怅然，南游以畅心境。庆历七年，“下山复南迈，不知已南虔”^㉕。在虔州，苏洵在钟棐和钟槩兄弟的陪同下，“同登马祖岩，入天竺观”^㉖。当时，苏洵未为时所知，但钟氏兄弟却以礼相待，这让苏洵十分感动，引为知己。八月，苏洵得知父亲苏序去世的噩耗后，匆匆返川奔丧。55年后，故人皆已驾鹤西去，重访故人之子，苏轼留下的只有无限的唏嘘。

（四）“大隐居士”田辟

田辟，字思梦，赣州南康人，好学不倦。嘉祐间游上庠，二十年无所成，毅然归隐，自号“大隐居士”。田辟在九经台教授子侄，其子侄登第及特恩者凡七人，其中三子如鳌最知名。田如鳌，字邦镇，宣和六年（1124）沈晦榜进士。高宗曾召问江右盗贼，田如鳌对曰：“小寇不足虑，所忧者西北耳。”^㉗出知道州，民乐其恺悌，后加直秘阁、西京转运副使。田辟教子有方，深得时人称赞，“时言义方者，必曰田氏”。^㉘

一〇九四年，苏轼路经南康，闻田辟之名，登门拜访。在田氏水阁东南方，有山峰峦竦锐，苏轼赏其秀拔，问田辟此山何名，田氏回答说至今未有名，乡人只笼统地呼为“鸡笼山”。苏轼嫌名太俗，便将鸡笼山更名为“独秀峰”。在田家的陪同下，苏轼游“形如覆钟，四周环水，石随水涨落，常年

不沉”^⑩的浮石和建于浮石上的显圣寺。其中最有趣的事情是，苏轼游玩显圣寺后，留下了南康八景之一的“苏步名坊”^⑪。

一一〇一年，苏轼赦命北归，经南康时舣舟至浮石，再次登览显圣院，拜访主持元师。元师烹当地名产蕉溪茶款待。为感谢元师的款待，苏轼临别时在院壁上题《留题显圣寺》，以兹纪念。出显圣寺，苏轼再过田氏水阁，重访田辟。在田氏水阁，又望丰下锐上的独秀峰，苏轼觉得它依然秀美独特，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为之和《独秀峰》诗。

在南康，至今还流传着一个关于苏轼的传说，当地有个民俗，男方到女方家迎亲，花轿上会写好上联，空着下联让女家对，如果对不出，那就有失体面。苏轼游玩浮石时，有户人家正为此事着急。听说苏轼在田辟的陪同下游玩附近，便特意请他们过来应对。苏轼问上联写的是什么，乡人说是“新城何日旧”，并解释说“新城是男方家的地名”。苏轼略一思索，回答道“这有何难，你们的浮石便是巧对”，为其对上“浮石几时沉”。得对后，那户人家高高兴兴地发亲去了。今日的浮石早已不浮，但关于苏轼的传说依然流传。

二、苏轼与美景佳胜

在赣州，苏轼一路慕名交往乡贤士绅，领略风土人情；一路在友人陪同下偕游唱和，尽览美景佳胜。“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⑫，景色秀丽的赣州，让苏轼暂时消除了谪迁流离之苦，享受短暂的世外桃园之乐。

(一) 八境罗画屏

八境台是赣州古城的象征，位于“郡城北，因城为台，高三层，俯临章贡”^⑬。八境台飞檐斗拱，画梁朱柱。登台远眺，城外的山水田园之美和城内的亭台楼宇之秀尽收眼底。叹观光之无暇，八境台为虔州之最。在八境台下，章江和贡江合流成赣江，襟带千里，蜿蜒北向注入鄱阳湖，因此赣州素有“千里赣江第一城”^⑭之誉称。

八境台与苏轼结缘，得益于虔州八境图。北宋嘉祐间，虔州知军孔宗翰鉴于“江水坏城，改甃以石，并建台城上”^⑮。台建成后，孔宗翰登台游玩，“虔州八景”^⑯尽收眼底，故取名“八境台”，这

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八景”^⑰。孔宗翰调离虔州时，请丹青妙手将八境台上看到的楼观台榭绘制成图，名为“虔州八境图”，留作纪念。熙宁九年（1076）九月十五日，苏轼和孔宗翰在密州超然台上欢饮达旦。孔宗翰因慕苏轼的文才，请他在虔州八境图上题诗，但不知何故，当时苏轼只赋了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而没有在虔州八境图上题诗。元丰元年（1078）二月，苏轼在彭城遇见赴陕州任的孔宗翰，苏轼赋《送孔郎中赴陕郊》为其送行。当时，苏轼满足了孔宗翰二年前提出的请求，作《虔州八境图八首》。苏轼题诗时虽没有到过虔州，却根据图画，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想象，来描绘虔州的美景。

绍圣元年，受“元祐党祸”株连的苏轼被贬谪至惠州。赴贬所途中，苏轼受知州黄元翁的邀请停留虔州月余。八月十九日，苏轼父子在黄元翁等官僚士子的陪同下登览八境台。登台亲莅其境，苏轼遍览虔州的旖旎风光。“应虔州士大夫之请，苏轼书旧作《虔州八境图》八首”^⑱。同时，苏轼深感前诗未能道其万一，遂补作《虔州八境图后序》一篇，来对虔州美景进行新的诠释。

“当年孔南康，八境罗画屏。东坡题妙句，一一传其名”^⑲，从此，八境台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唱和不绝的诗画台，一展时人风骚意气，缅怀古今风物流年。

(二) 郁孤如旧游

北方贺兰山脉，群岭奔腾；南方之贺兰山，郁然孤峙。郁然孤峙的贺兰山在虔州西北隅，又名文笔山，其山“郁然而隆阜，突然而孤起，峙于章贡二水之间”^⑳。一千多年前，贺兰山顶建郁孤台，台“平地数丈，冠冕一郡之形胜，而襟带千里之山川。登其上者，若跨鳌背而升方壶”。^㉑“孤峙天半，郁然独立”的郁孤台，给人一种巍峨秀丽的美感。兴衰几代，风雨迎宋，“郁结古今事，孤悬天地心”^㉒，郁孤台注定了要和与之气质相近的人产生心理共鸣。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㉓辛弃疾于淳熙二年

（1175）在虔州就任江西提点刑狱时，数登郁孤台，喟然兴叹，遂吟这首《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从而使郁孤台声名鹊起。南宋咸淳十年（1274），文天祥任赣州知州。在赣州任职期间，忧国忧民的文天祥数游郁孤台，题诗寄慨，写下“城廓春声阔，楼台昏影迟。并天浮雪界，盖海出云旗。风雨十年梦，江湖万里思。倚栏时北顾，空翠湿朝曦。”^④较之辛弃疾与文天祥，更早登上郁孤台的苏轼又会与它产生怎样的共鸣呢？

早在虔州八境图中，巍峨秀丽的郁孤台就深深地吸引了苏轼。“烟云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⑤苏轼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把郁孤台的美景比作海市美景和仙山琼阁。一〇九四年八月，当苏轼在虔州至陆登岸后，便随黄元翁等名流士子游览郁孤台。登上郁孤台，虔州“五岭之奇观，三山之灵秀”^⑥，尽览无余。俯瞰虔州美景，投荒万里的苏轼，想着自己放浪岭海之苦楚和生还内地之渺茫，发出无限感伤，一首《过虔州登郁孤台》便呼之欲出，希望自己能早日结束这惨淡漂泊的贬谪生活，遇赦北返与家人团聚。一路照顾苏轼南贬生活的苏过，见长者心情惆怅，便和《题郁孤台》进行安慰，希望长者乐观面对流放的生活，“终留思范蠡，归泛五湖舟”^⑦，重新豪迈起来。七年后，苏轼遇赦北返，于一〇九一年二月抵虔州。在虔守霍汉英、监郡许朝奉的陪同下，苏轼旧地重游。重登郁孤台，苏轼思绪万千，其中几多艰辛，几多抑郁，均化作《再过虔州登郁孤台和前韵诗》，希望自己能隐居处世，以安晚节。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郁孤台见证了苏轼两次心境的变化：从第一次南贬中对未来颇难预卜的落寞之情到第二次北归时生还内地的喜悦之感。如今，苏轼早已作古，然郁孤台仍一片丹红，矗立在贺兰山上，“孤峙天半，郁然独立”。

（三）“四十七年真一梦”

人生如梦，道出了苏轼对人生的感悟。面对漂泊不定的人生，苏轼感叹一声倒也坦然，就如明月和江水一样获得自身的淡然与宁静。

庆历七年，“下山复南迈，不知已南虔”^⑧，苏洵在钟棐和钟槩兄弟的陪同下，“同登马祖岩，入天竺观，观乐天墨迹”。^⑨“乐天墨迹”是天竺寺里的一座诗碑。早在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

虔州天竺寺建成后，僧韬光自钱塘天竺来此驻锡，好友白居易写诗相赠：“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⑩。韬光得诗后，请人凿成诗碑，作为镇寺之宝。唐以降宋，“乐天墨迹”依然笔势奇逸。苏洵回家后，对苏轼兄弟提及墨迹如新的诗碑。无疑，诗碑上禅意回绕的乐天诗，在二苏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7年后，59岁的苏轼途径虔州，天竺寺有如一位故友，静静地在等候他的寻访。遗憾的是，墨迹如新的诗碑早已不在，苏轼所见的只存石刻。真迹淹没，不胜惋惜的苏轼在石刻上复书《赠韬光禅师》。见天竺寺呈衰败之势，触景伤情的苏轼，想到自己天涯流落的辛酸，遂题诗一首《天竺寺并引》，以怅人生的梦寐沧桑。

天竺寺仿佛一个载梦的归宿，苏轼在这里，思考着自己47年雪鸿泥爪的人生，有着年少得意、有着官场沉浮，也有着人生如梦的初醒。在天人合一的天竺寺，苏轼不再惆怅岁月的流逝，依恋的却是遗迹故家。

绍圣元年，在风吹霜打的残酷政治打压下，苏轼开始了投荒万里的流放生活。贬逐岭南，苏轼可谓一路狼狈。先是启程南下“无人送临贺”^⑪，与幼子苏过和小妾朝云及仆人凄凉上路。后有夺船之辱，“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买马之资，无所从出”^⑫，后经苦苦哀求，发运使才答应让其继续坐官船至豫章（今南昌）。路经沿洄千嶂间十八滩，又水急滩险，“地名惶恐泣孤臣”^⑬。一路烟雨凄然，让年近花甲的苏轼倍感苦楚。但到赣州后，一切让苏轼感到既陌生又亲切。陌生，是因为初至赣州，人生地不熟，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亲切，缘于赣南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官绅士子的文人相重，让苏轼倍感温暖。当苏轼离开赣州继续南贬时，他已不再畏惧烟瘴的岭南之地，“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⑭。七年后，苏轼遇赦北归，爱妾朝云和仆人已客死异乡，回来时只有自己和幼子“全躯得还”^⑮，让苏轼感触颇多，“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⑯。两次游经赣州，苏轼对于人生的感悟发生了改变。一〇九四年，59岁的苏轼首过赣州，对于人生，他早就沧桑历尽。又过七年，66岁的苏轼再经赣州，对于世态，他已是淡然处之。两次暂留赣州，苏轼都

有着相同的感悟：官宦沉浮已如昨日黄花，友谊至交才能恒古不变。在与赣州官绅士民的诗酒唱酬中，苏轼一路畅游美景佳胜，欣然起行。

论文注释：

①在《赣州府志》(重印本)、《南安府志》、《南安府志补正》(重印本)中共记载了苏轼44首诗文，但据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和《苏轼诗集》来看，包含文简在内，苏轼在赣州写下的诗、赞、散文等共计70余首。

②北宋开宝八年(975)，改昭信军为军州。太平兴国元年(976)，改军州为虔州，隶江南西路。淳化元年(990)，以虔州之南康、大庾、上犹三县别置南安军，隶江南西路。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改虔州为赣州，赣州之名始此。

③、④、⑤《赣州市志》1999年版，自序、第1页概述、第1015页第二十六篇艺文。

⑥、⑦、⑧《宋史》，第10816、10817、10817页。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㉑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16页卷五十七《与黄元翁一首》云：“到治下当作陆行”或第1043页卷三十七《赴英州乞舟行状》云：“至南康军出陆赴任”(南康军为虔州的古郡名)、第1771页卷五十八《与朱行中十首》第五简或第1806页卷五十九《与宋汉杰二首》之一云：“某只候水来即行矣”、第1741页卷五十七《答苏伯固四首》之二云：“某留虔州已四十日，虽得舟，犹在赣外”或第1679页卷五十六《与孙志同三首》之一云：“旅泊两月”但是林语堂《苏东坡传》认为苏轼遇赦北返在赣州停留了七十天、第2266~2267页卷七十一、第640~641页卷二十二《玉岩隐居阳行先真赞》第1679页卷五十六《与孙志同三首》之一、第1966~1967页卷六十三《钟子冀哀词并引》、第1680页卷五十六《与孙志同三首》之二、第1966页卷六十三《钟子冀哀词并引》、第2150页卷六十七《书乐天诗》、第1740页卷五十六《答苏伯固四首》之一。

㉒、㉓、㉔《赣州府志》(重印本)，第451页卷十一、第638页卷十六、第638页卷十六。

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㉟、
㉟孔凡礼点校《江西省赣州市地名志》1988年版，第365页林颜《赠玉岩翁阳孝本》、第419页、第419页、第349页清顾嗣立《八境台》、第632页卷之十七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第632页卷之十七文天祥《郁孤台》。

㉟、㉟、㉟、㉟、㉟、㉟、㉟、㉟、㉟、
㉟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35页卷四十五《和犹子迟赠孙志举》、第2431~2432页卷四十五《次韵阳行先》、第2434~2435页

卷四十五、第2441~2442页卷四十五《崔文学甲携文见过，萧然有出尘之姿，问之，则孙介夫之甥也。故复用前韵，赋一篇，示志举》、第2053~2054页卷三十八《过虔州登郁孤台》、第795页卷十六《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引》、第2426~2427页卷四十五《过岭二首》、第1042页卷三十七《赴英州乞舟行状》、第2052~2053页卷三十八《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第2056~2057页卷三十八《过大庾岭》、第2424页卷四十五《赠岭上老人》。

㉛、㉜、㉝、㉞、㉟《南安府志》(重印本)，第668页卷二十六《赠玉岩翁阳孝本》第10小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曰：“阳行先平生不娶，东坡直造其室，尝以元德秀呼之。”、第347页卷十六、第374页卷十六、第152卷六和173页卷七南康八景为：“南山挹翠、东渡观澜、苏步名坊、吕仙丹井、苍龙跃浪、宝马腾云、秀峰文笔、旭岭书台。”

㉟、㉟《斜川集校注》，第653页卷九苏过《孙志康墓铭》，第5页。

㉟《宁都直隶州志》(重印本)，第546页卷二十二或第326页卷十七。

㉟《梁谿漫志》，第45页。

㉛、㉜《苏洵集》，第164页《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第164页《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

㉟、㉟《舆地纪胜》，第1538页卷三十六、第1421页卷三十二。

㉟宋时虔州八景分别为：石楼(今八境台)、章贡台、白鹊楼、螺亭(也叫皂盖楼)、郁孤台、马祖岩、尘外亭和崆峒山(今峰山)。后来，随着景观的改变，虔州八景也不断变化。

㉟史树青《王维北京八景图研究》，1981年第5期《文物》。

㉟《苏轼年谱(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68页卷三十三。

㉟、㉟《赣县志》1991年版，第501页清刘峙《重建郁孤台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苏轼与尚意书风的兴起

杨江帆

内容提要：苏轼的书法，名列宋四家之首，他倡导并促进了“尚意”书法的全面兴起，开创了有宋一代“尚意”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就苏轼尚意的美学背景，尚意的具体含义以及对后世影响进行了解读与梳理。

关键词：苏轼 尚意 书法

一、苏轼书法“尚意”的背景

（一）书学背景

北宋初期的书法，承晚唐五代的余绪，风格更趋秀丽，而这种秀丽又很快沦为颓靡，黄山谷《李致尧乞书书卷后》说：“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梳妆，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

宋初书法的衰落，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整个中国历史正处在“中世”到“近世”的转折期，“自晚唐已降，为吾中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独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①书法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也同样处在历史发展的低谷。其次是时人“趋时贵书”。淳化三年，宋太宗出密阁所藏历代书法，刻成《淳化阁帖》十卷，分发大臣，以后辗转翻刻，风行天下。《淳化阁帖》选本一半以上为二王法书，其中参杂不少摹本和伪迹，再加上辗转翻刻，漫漶失真，以这样的法帖学书，书风容易僵化和媚弱。但想靠科举进身的人都得认认真真临摹学习，不敢越雷池一步，更加蔓延和助长了媚弱的书风。宋初书法江河日下，一蹶不振。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唐安公美政颂》中感叹道：“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

楷书在唐代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法则和秩序，上下笔画之间有着不可移易的呼应关系和精确姿态，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会破坏整体和谐，减少艺术魅力。唐代楷书的成熟，也不可避免地要反作用于行草书，影响行草书的创作，唐人总体写得理智规范，虽然无魏晋“萧散简远”的境界，但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唐代书法在“尚法”的思想指导下，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各种风格形式都得到充分表现，后世已无法超越，继续在“尚法”的道路上发展，已经难以为继了。苏

轼在这个历史转型时期，利用当时的各种有利条件，倡导并用自身实践阐释了书法“尚意”理论，改变了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

（二）文艺美学背景

宋初，以欧阳修为为代表的北宋文士阶层发起一场诗文革新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诗文领域，对后世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深远，逐步塑造了宋代文化新的审美特质和艺术品格。

1. 欧阳修首开“尚意”先声

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不断深入，诗文理论中的意境论得到较大发展，北宋文士观念逐步由“文以明道”向“有道有艺、文理自然”转化，诗文创作中尚意倾向明显起来。

欧阳修《试笔·系辞说》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自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而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然则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②欧阳修的“意”是指人的精神存在，偏重于情感、意趣、韵味。

2. 陶渊明审美旨趣影响至深

苏轼的生命实践与陶渊明有着精神上的相同之处，他一生写了大量的和陶诗，翻阅苏轼诗文，陶渊明的名字出现了上百次，足见对其崇敬和向往之情。“陶渊明的诗风反映出融合了纤秾与简古、至味与淡泊、外枯与中膏、似澹与实美、质与绮、癯与腴等对立美学因素的平淡美。陶诗的艺术之长是在质朴简古中包含了丰富的意蕴，在看似干枯的外表下积聚了生命的活力，在凝练简短的形式中蕴藏了悠远的韵味，一句话，以平淡的形式表现不平淡的内容。”^③苏轼《送参寥师》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④可以作为“平淡美”最好的解读，其实不是平淡，而是绚烂之极也。

（三）哲学背景

中国书法美学直接来源于传统哲学的儒道禅，苏轼作为一个兼有道、禅思想的大儒，其传统哲学思想深入书法观念，这是苏轼尚意观念的哲学背景，也是最为基本的根源所在。

《庄子·外物》：“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说明了中

国传统哲学是以“心”为终极关怀的，也就是得其意。还有诸如“道法自然”、“写形尽意”等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心学”观念。苏轼就是深受此类观念的影响，《石苍舒醉墨堂》诗云“我书臆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⑤表明了“意”高于“书法介质”本身的美学观念。又如《跋赵云子画》说“赵云子画笔略到而意已具”。^⑥苏轼对“意”的崇尚还有很多例子，此不赘述。总的说来苏轼“尚意”观念深受传统哲学的影响。

二、苏轼倡导并引领“尚意”书风的兴起

苏轼作为当时文坛领袖，性喜奖掖后进，所以游其门下者甚多，逐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以欧阳修为思想先驱，以苏轼和“苏门六君子”（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为中心，由朝野知名人士文同、王诜、李公麟、米芾等人组成，具有基本相近的政治见解和文艺主张，这一文士集团的形成是自然生发而成，苏轼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艺观和艺术实践。

针对时人学古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以媚弱为美的弊端，苏轼首先揭起创新的大旗，苏轼《评草书》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⑦黄庭坚在《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⑧他们提出的“无法”的创作态度，破除了条条框框的禁锢，撇开了唐以来逐步形成的一套模式和定势，为宋人的创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黄庭坚、米芾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紧紧追随苏轼，在创作实践中，反对唐楷的“大小一伦”和“字做正局”美学主张，开始有意识追求主观处理，点画不求平直匀称，强调提按顿挫的起伏变化，结体不求平稳工整，追求欹侧变化，这种主观意识处理即“意造”，是宋代书法革新的纲领，即对点画结构的变形处理。由于他们这样一批有地位有声望的文士、艺术家的推动，从北宋中期开始，书坛掀起振衰救弊的革新运动，引领一大批文化精英追随，陆游《草书歌》说“神驰意造起雷雨，坐觉乾坤真一洗”，显然是受了苏轼“意造”理论的影响的。

三、苏轼书法的“尚意”观解读

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提出书法的最高境界是“萧散简远”，书法要表达的是情感、意趣、韵味而非炫耀技巧。他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

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⑨从这段文字，可以得出这样的见解：一、技巧上的最高的成就不是艺术上的最高境界，有时甚至会妨碍艺术最高境界的完成。二、书法的最高境界是“萧散简远”。

在方法论上，苏轼进一步提出了迥异古人的观点“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守烦推求”，后人称宋人书法“尚意”，其审美旨趣是晋人的萧散简远、平淡天真，在方法论上来说就是“意造”。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受任何束缚，当然，苏轼这里所说的“意造”应该是指在深刻理解和继承前人技法的基础上的主观处理，将自我审美意识、个人境界反映到字体的结构和点画之中的再创造，而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试将苏轼《黄州寒食帖》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比较，这三件行书手卷，都是抒情写意的代表作。《兰亭序》是应请为诗集作序，《祭侄稿》是为亡侄做祭文，两者都是无意于佳乃佳的典范，而《黄州寒食帖》则是将得意的诗作，书写成书法艺术的形式，纯为创作而作，始终存在着“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创作自觉，用经意的手段追求不经意的效果，用意造构想的方法去达到天然的化境，这是其间最大的不同。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论述苏轼的艺术精神时说：“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高到了悟的哲理高度。”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正是有了“悟”的高度，“意造”才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达到绚烂之极的“平淡美”。

四、“尚意”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苏轼开创的“尚意”书风，对后世影响巨大，首先，开启了书法艺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觉，苏轼曾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显示出强烈的创作自觉。宋代首开书画两院，选拔书画两院博士，开启了书法纯为艺术创作的开端（唐代按“身、言、书、判”开科取士，但还停留实用层面）。皇家的倡导和文化精英的推动，促进了宋代文士书法艺术创作的真正自觉，并因此促进了长卷这一书法形式的繁荣。

（下转第39页）

苏词甄辨

邹同庆 王宗堂

内容提要：考证了《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为苏轼词；还考证了《全明词》辑商辂词5首，认为有4首都不是商辂作，而是苏轼词误入。

关键词：苏词 误入 甄辨

苏轼是我国词坛上开宗立派的大家，名篇佳作叠出，深受同代人和后代人的喜爱，口诵传抄者有之，模仿拟作者有之。因此，其词作被冒名误入到他人集中者甚夥。我们原发现有100多首，在拙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已作考辨，最近几年在读书过程中，又发现几首误入到元、明人集中，现略作甄辨，以就正于方家。

(一)

蝶恋花 清明

春事阑珊芳草歇，客里风光，又过清明节。
小院黄昏人忆别，落红处处闻啼鴂。 咫尺
江山分楚越，目断魂消，应是清尘绝。梦破五
更心欲折，角声吹落梅花月。

此词见清康熙年间刻本元胡一桂《双湖先生文集》卷四。唐圭璋先生编《全金元词》未收胡一桂词集。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元史》卷一八九有传。本传上说他“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十八，领乡荐，试礼部不第，退用讲学，远近师之，号双湖先生”。其诗文集明代有刻本，至清初已罕见。《双湖先生文集》是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其裔孙据族人所藏草稿刻印，今有《续修四库全书》本。其中卷四诗词合编，收词八首，然与宋、金人词互见者六首。此其一也。这首词又作苏轼词，见明茅维编《苏东坡全集》本《东坡词》(以下简称明刊全集)、明焦竑批点《苏长公二妙集》本《东坡词余》(以下简称二妙集)、毛晋汲古阁本《东坡词》(以下简称毛本)、朱孝臧《东坡乐府》(以下简称朱本)、

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以下简称龙本)、《全宋词》本《苏轼词》(以下简称全宋词)、香港曹树铭《东坡词》(以下简称曹本)、台湾郑向恒《东坡乐府校订笺注》(以下简称郑本)及大陆当前出版的各种编年校注本。明刊全集、二妙集、毛本均有题作“离别”。该词最早见《草堂诗余》。《草堂诗余》为南宋书坊所编，原为两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有著录。其成书在庆元元年(1195)以前，因庆元元年成书的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四已引及《草堂诗余》。胡一桂生于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说明该词在胡一桂生前五十多年就在社会上流传，作胡一桂词显然是错误的。然而宋本《草堂诗余》已佚，现存最古之本乃何士信增修本，故曰《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这首《蝶恋花》是否何士信将胡一桂词补入？据吴熊和先生考证，何士信增修本，大约成书于南宋淳祐九年至宝祐、景定年间，即1249~1264年间，其时，胡一桂才3~18岁，当不会写出如此文风苍劲、“字字惊心动魄”(王士祯评语)的佳作。再者，何士信增修本，现传最古之本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遵正书堂刊本，书中凡增添之词，均标明“新增”、“新添”字样，注“新增”者23首，“新添”者83首，凡106首。这首《蝶恋花》不在增添之列，可证其为宋本原有篇目，故作胡一桂词，误。洪武二十五年遵正书本此词载后集卷下“人事”类附“离别”门，排在苏东坡《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一词之后，不著撰人。嘉靖十七年(1538)陈钟秀重刊《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二卷，此词载卷下“人事”类“离别”门，仍排在苏东坡《虞美人》之后，署名苏东坡，此当为苏轼词题作“离别”的出处。以后刊刻的武陵逸史(顾从敬)编次《类编草堂诗余》卷二、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二、《词坛合璧》本杨慎评点《草堂诗余》卷三、董其昌《新刻订正评注便读草堂诗余》卷三、李廷机《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

林》卷三、李攀龙《新刻题评名贤词话草堂诗余》卷三、陈耀文《花草粹编》卷七、潘游龙《古今诗余醉》卷八、清朱彝尊《词综》卷六、沈辰垣等编《历代诗余》卷三九、黄苏《蓼园词选》、董毅《续词选》卷一、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卷二、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乙集、王官寿《宋词抄》卷五均署名苏轼或苏东坡。词话杨慎《词品》卷一、王士禛《花草蒙拾》、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下、况周颐《惠风词话续集》卷二亦作苏轼词。此词宋、元诸本苏轼词集未收，茅维编《苏东坡全集》始据《草堂诗余》补入，以后刊行的苏轼词集，都认为是苏轼作而收入，别无疑义。毛本有跋云：“东坡诗文不啻千亿刻，独长短句罕见。近有金陵本子，人争喜其详备，多混入欧、黄、秦、柳作，今悉删去。”毛晋说的“金陵本子”，即焦竑《苏长公二妙集》，是毛晋编《东坡词》的底本。《二妙集》采自明刊全集。全集收词凡 73 调，316 首。《二妙集》比全集增添 20 首，在当时是收词最多的苏轼词集，所以“人争喜其详备”，但毛晋认为它“多混入欧、黄、秦、柳作”，于是“今悉删去”。他从《二妙集》中共删去 8 首：《点绛唇》（醉漾轻舟）、《点绛唇》（月落乌啼）、《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满庭芳》（北苑龙团），以上四首他认为是秦淮海作；《浣溪沙》（风压轻云贴水飞）是李后主作，《浣溪沙》（玉碗轻寒滴露华）一首是晏殊作，《鹧鸪天》（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首诗黄庭坚作，《醉落魄》（醉醒醒醉）据“山谷老人云非东坡作”，以上 4 首均删。另外还有 7 首与他人重出，计《点绛唇》（红杏飘香），注“或刻贺方回”；《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注“或刻黄山谷”；《诉衷情》（海棠珠缀一重重），注“或刻晏同叔”；《西江月》（别梦已随流水），注“或刻黄山谷”；《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注“或刻贺方回，或刻黄山谷，或刻秦淮海，或刻晏小山”；《蝶恋花》（玉枕冰寒消暑气），注“或刻晏同叔”，《江城子》（银涛无际卷蓬瀛），注“或刻叶梦得，或刻张元干”。以上 7 首中除《西江月》（别梦已随流水）一首《山谷词》与《东坡词》互见外，其余 6 首均从他集删去归苏轼。对这首明刊全集和《二妙集》均收的《蝶恋花》，毛晋没有提出任何可疑之点。历代学者也都确信是苏轼词。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苏轼词底本用的是宋曾慥辑《东坡词》，曾本未收此词，唐先生用毛本补入。1993 年 7 月巴蜀书社出版刘尚荣校证《傅

干注坡词》，傅本未收此词，刘先生用毛本补入《注坡词补遗》。题明程敏政编《天机余锦》卷一收此词，原不著作者，2000 年 1 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兆鹏等校点本，也据《全宋词》补作苏轼。可证作苏轼词当不谬。

(二)

2004 年 1 月中华书局出版饶宗颐先生初编、张璋先生总纂的《全明词》，全六册，收入词家 1390 人，词作约 2 万首，是继《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唐五代词》之后，将明代词集汇编成帙的开山之作，为学术界提供了较完备的明词文献，值得庆贺。在《全明词》第 1 册 266 页辑商辂词 5 首，则令人生疑，现按原样抄录如下：

一丛花 初春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东风有信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寒意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朝来初日半含山。楼阁淡疏烟。游人便作寻芳计，小桃杏应已争先。衰病少悰，疏慵自放，唯爱日高眠。——《明词综》卷二

鹧鸪天 秋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古今词汇》卷二、卷三

祝英台近 旅怀

挂轻帆，□飞桨，还过钓台路。酒病无聊，倚枕听鸣橹。断肠簇簇云山，重重烟树。回首坐、孤城何处。闲离阻。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要知欲见无由，痴心犹自，倩人道、一声传语。——《古今词汇》卷二、卷三

满庭芳 花朝

鵲径寒烟，燕巢华露，小窗夜雨新晴。竹兰苔砌，寂寂点芳春。屈指春光已半，徒翘首、千里关城。云横处，蛮笙戍角，隐隐杂啼莺。放衙人乍散，琴抛案牍，酒载郊坰。身世风前絮，更欲何凭。十载邯郸古道，枕中事、暗里魂惊。平茵软，尽容酩酊，杜宇任多情。——《古今词汇》卷二、卷三

梦江南 春尽

微雨过，何处不催耕。百舌无言桃李尽，
柘枝深处鶗鴂鸣。春色属芜菁。——《兰皋明词汇选》卷一

以上5首词，有4首都不是商辂作，而是苏轼词误入，拙著《苏轼词编年校注》2007年第二版“重印后记”中对此已稍作论列，限于篇幅未得其详，故再作甄辨如次。

《一丛花》（今年春浅腊侵年），最早载南宋初年仙溪人傅干《注坡词》卷一一（下称傅本），以后元延祐庚申刊《东坡乐府》（下称元本）、明吴讷编《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下称吴本）、明茅维编《苏东坡全集》本《东坡词》（下称明刊全集）、明焦竑编《苏长公二妙集》本《东坡诗余》（下称二妙集）、明毛晋汲古阁本《东坡词》（下称毛本）、清王鹏运《四印斋所刊词》本《东坡乐府》（下称四印斋刻本）、朱祖谋《彊村丛书》本《东坡乐府》（下称朱本）、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下称龙本）、唐圭璋编《全宋词》本《苏轼词》（下称全宋词）、香港曹树铭《东坡词》（下称曹本）、台湾郑向恒《东坡乐府校订笺注》（下称郑本）、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下称石唐本）、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下称薛本）、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下称邹王本）、朱靖华、饶学刚、王文龙、饶晓明《苏轼词新释辑译》（下称朱饶王本）均收。傅本、元本、朱本、龙本、曹本均有题《初春病起》，是熙宁九年（1076）初春苏轼任密州太守时小病初愈而作。直到明末才误作商辂词，始见于明末沈际飞《草堂诗余新集》卷三。沈氏把苏轼词误作商辂词，不详所本。从此讹误延传，明潘游龙辑《精选古今诗余醉》卷二、清赵式《古今别肠词选》卷三、清顾璟芳等辑《兰皋明词汇选》卷二、清王昶辑《明词综》卷二、清陈世焜辑《云韶集》卷一二，以至于今尤振中、尤以丁编著《明词纪事会评》、张璋等纂《全明词》，皆踵沈氏之误作商辂词收录，倘不呼呼叫停，积习相沿，以讹传讹，将继续贻误后人。

《鵞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最早见宋人傅干《注坡词》卷一一，调名后注云：“东坡调黄州作。此词真本藏林子敬家。”宋人早已明白无误地注明此词为苏轼作，连写作的时间、地点，真本所藏都说得很清楚，其后元本、吴本、明刊全集、

二妙集、毛本、四印斋刻本、朱本、龙本、全宋词、曹本、郑本、石唐本、薛本、邹王本、朱饶王本均收，《历代诗余》卷一二亦作苏轼词。直到清初顾璟芳等编《兰皋明词汇选》卷三此词才误作商辂词，未详所本。此书刊刻于康熙元年（1162），到康熙十七年（1678）卓回编成《古今词汇二编》，次年刊刻，该书卷二也将此词误收商辂名下，当本《兰皋明词汇选》。《全明词》承《古今词汇二编》之误亦作商辂词，不察500多年前傅干早已把此词归于苏轼了。

《祝英台近》（挂轻帆），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1522~1566）年间程敏政编《天机余锦》卷二，不署作者姓名，亦无词题。“挂轻帆”作“挂轻帆”，“□飞桨”作“飞急桨”，“回首坐”作“回首望”。“帆”乃“帆”的异体字。其余两处当以《天机余锦》为胜。此词又见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苏轼《东坡全集》，以后二妙集、毛本、朱本、龙本、全宋词、曹本、郑本、石唐本、薛本、邹王本、朱饶王本均收录，皆题作《惜别》。异文全同《天机余锦》。再见万历间鳙溪逸史编选《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卷四。作明刘基词。作商辂词起自明末沈际飞《草堂诗余新集》卷三，以后明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卷七，清卓回《古今词汇二编》卷三、清赵式辑《古今别肠词选》卷三并作商辂词，题均作《旅怀》。此词作者一说无名氏，一说苏轼，一说刘基，一说商辂，究竟以谁为正？我们认为应为苏轼，原因：1. 作苏轼词最早见明刊全集和二妙集，毛晋编《东坡词》时，是以二妙集为底本参校明刊全集而成。当时有人称二妙集收词“详备”，毛晋则认为“多混入欧、黄、秦、柳作，今悉删去。”毛晋从中删去8首，但对这首确认为苏轼词保留不动。以后学者也深信不疑为苏轼作品。朱孝臧为苏词编年时，把这首词编在熙宁六年（1073）春，苏轼时任杭州通判，寻行富阳、新城、桐庐时过七里濑作。2. 唐圭璋编《全宋词·苏轼集》，以曾慥《东坡词》为底本，曾本无此首，唐先生据毛本补，词后加注：“案此首草堂诗余新集误作明商辂词。”肯定为苏轼作品，作商辂词误。1993年，巴蜀书社出版刘尚荣校证《傅干注坡词》，此词亦据毛本录补在《注坡词补佚》中。明人程敏政编《天机余锦》此词不署作者，2000年1月辽宁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兆鹏等校点本《天机余锦》，此词已据《全宋词》补作苏轼词。3. 作刘基词亦误。刘基

(1311~1375)字伯温，元末明初人，现存其词集两种：一是《写情集》四卷，明洪武十三年(1380)刻印，有1989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二是《诚意伯词》不分卷，以《写情集》为底本，又补词10首，有《惜阴堂丛书》本，见1992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词汇刊》。这两个版本均未收此词。《全明词》刘基词，是以《诚意伯词》为底本，又据《历代诗余》补3首，共收词234首，也没有收此词，故作刘基词亦误。4. 作商辂词明末才出现，比万历间刊苏轼《东坡全集》晚出，应以《东坡全集》为正。

《梦江南》(微雨过)，这首词是截取苏轼的《望江南》词的下片，弃其上片“春已老，春服几时成。曲水浪低蕉叶稳，舞雩风软纻罗轻。酣咏乐升平”而成。《望江南》又叫《忆江南》、《梦江南》、《江南好》、《春去也》等，唐、五代时多为单调，到了宋代，词人将单调重填一遍，成为一种前后一韵平仄相同的双调词体。故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五云：“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宫，字句亦同。止是今曲两段，盖近世曲子，无单遍者。”苏轼共作《望江南》词两首，均为双调，是熙宁九年(1076)任密州太守时所作，现传诸本苏轼词集均载。清初顾璟芳等编《兰皋明词汇选》时，截取一首苏轼词下片作商辂词入选，不知何据。卓回《古今词汇二编》卷一亦误作商辂词。清沈辰垣等人辑《历代诗余》，卷一收商辂单调词，卷二五又收苏轼双调词，自相抵牾。《全明词》依《兰皋明词汇选》作商辂词，陈陈相因，谬误延传。

以上4首都是苏轼词误入，只剩下《满庭芳》(鹊径寒烟)一首是否商辂所作，也值得怀疑。此词最早见明末沈际飞《草堂诗余新集》卷四，作商辂词。以后清人编《兰皋明词汇选》、《古今词汇二编》、《历代诗余》，皆步沈际飞后尘作商辂词入选。《草堂诗余新集》是根据钱允治编选、陈仁锡笺释《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删补而成。钱氏的《国朝诗余》是现存较早的明人选明词本，其中没有商辂词。沈际飞补入的三首商辂词，即前边提到的《一丛花》、《祝英台近》和本词，前两词已考辨为苏轼词误作商辂词，以彼例此，这首来路不明，不知何据补入的《满庭芳》自然使人心生疑窦。何况商辂的文稿在他家两遭火灾时大都烧掉，到两百多年后怎么会忽然冒出词作来呢？这首词词主是谁，无从考证，只好存疑。

虽然《全明词》存在误收。是因不察历史上出现的误收而以讹传讹，比起它对学术上的贡献，只是微疵小疵，瑕不掩玉，如果能再加以精雕细磨，定能成为一部精品巨著。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河南财经学院文化传播系教授)

(上接第35页)其次，标志着书法从追求技巧的时代跨入了超越技巧的时代，也就是技进乎道。“书为心画”开始成为书家的自觉追求。在追求技巧的时代，人们视技巧为书法美的首要因素，因而着眼于创作对象的客体，将汉字的点画和结体锤炼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超越技巧的时代，人们注重主观意识的表达，自我的审美意识、个人境界可以主动反映到字体的结构和点画之中，特别强调创作主体即书法家本身的情感表达。多读书，提高修养的要求就是由此产生的，李昭杞《跋东坡真迹》云：“昔东坡守彭城，尝语舒尧文曰：‘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终不能见妙。’”

另外，标志着打破了美和丑的极端对立，以个性的多元表现代替唯美标准。苏轼《和子由论书》云：“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⑩黄庭坚、米芾分别也有“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和“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的相同论述。这些观点发展到明末清初，由于现实的黑暗，人们体会到现实中的残缺与血泪同样或者更加能够表现生命本质的时候，便发展为对“丑怪”的赞美——正如西方美学的“悲剧之美”，傅山的“四宁四毋”、刘熙载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等，都是“尚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论文注释：

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章。

②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85页。

③寿勤泽《中国文人画思想史探源》，容宝斋出版社2009年版，第3章。

④、⑤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05、235页。

⑥、⑦、⑨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14、2183、2124页。

⑧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04页。

⑩李福顺编著《苏轼与书画文献集》，容宝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

三苏为官的职能及相关情况

胡先酉

内容提要：本文综合相关资料，阐释苏洵、苏轼和苏辙在人生仕途为官的官署、官职、职能及相关情况。

关键词：苏洵 苏轼 苏辙 官署 官职职能

北宋朝廷和地方的各种官职，涉及到中央朝廷的各种官署和地方的各级行政区划。对中央朝廷的官署情况，本文在谈到三苏父子在中央朝廷的官职职能时对相关官署作介绍，而对北宋的地方行政区划，笔者先作简要介绍。

北宋的地方行政区划主要有县、州、府、路。

县的行政区划古今变化不大，县的行政长官在秦汉以来直到唐代，都称县令。而在北宋，县令之名虽存，可事实上多以朝廷派官员执行其职务，称为知某县事，简称知县。知，就是主持的意思。

州是比县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州与今天的地级市差不多，一州辖有数县，如眉州就辖有眉山、彭山、丹棱、洪雅、青神等县。州的行政长官在汉以来直至唐代称刺史（中间有时也改名为“牧”，如东汉末年大多以“牧”为州行政长官的官名），而北宋虽有刺史之名，但仅是一种带荣誉性的虚衔。北宋州一级的行政长官是朝廷派朝臣去担任，称“权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意为暂行主持本军（军在北宋也是一种行政区划名，有两种，一种与州府同级，隶属于路，一种与县同级，隶属于州、府）本州事。

府在北宋实际是与州同级的行政区划。府作为行政区划始于唐代，唐代将京师和陪都所在地的州升为府。北宋除了将京师、陪都所在地升州为府外，还在四京之外把一些重要的州升为府。首都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陪都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这四京的府称为“京府”，四京之外的

如凤翔府、成都府、太原府等称为“次府”。以州升为府的地方，其行政区划仍是原州的行政区划，所以说府、州是同级的行政区划，只不过府显得比州的地位高一点。宋代府的行政长官称为知府，也是朝廷派朝臣担任，称为知某府事。

路是北宋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与今天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差不多，但其管理方式不像今天设省长为一省的行政长官。北宋开初，为了加强中央朝廷直接管理地方的权力，所以府、州（乃至县）的行政长官都是直接派朝官担任，就是上面所说的知府、知州、知县。但朝廷面对数百个州府，尽管不愿在府、州之上再增设一级行政机构，可管理起来，难度确实不小。为解决这一问题，后来就设置路这样一种行政区划，将全国分为若干路，分路而治。最先分为二十一路，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定为十五路，宋真宗时增为十八路，宋神宗时增为二十三路，每路辖有若干府州，如成都府路便辖有成都府以及眉、蜀、彭、绵、汉、嘉等十余州。每路设由中央朝廷直接控制的监司这一机构。这个机构开始只有一个，设转运使一职来代表中央朝廷掌管本路的财赋，监察本路各府州的情况。宋真宗时，考虑到转运使的权力过重，几乎控制了全路的行政事务，于是又设了“宪司”、“帅司”这两个监司来分权，“宪司”由提点刑狱使来掌控，主要掌本路的司法事宜。“帅司”由安抚使（或称经略安抚使，或只设置马步军都总管、兵马钤辖）来掌控，主要掌本路的军政事宜。而转运使就只管本路的财赋转输和民政，其监司机构称为“漕司”。这样宋代一路便有三位长官，不像府、州、县，只有一位掌控全面的行政长官，也不像今天的省级行政区划只有一位掌控本省全局的行政长官，即省长。宋代每一路的三位长官权位重，尽管各自权职有专，但往往兼及他务，互相制约。北宋分路较长时间仍以转运

司为主，上面所称十五路、十八路、二十三路等，均指转运司路而言。

下面介绍三苏父子为官的职能和相关情况，首先，说说苏洵任官的职能及其相关情况。

苏洵一辈子多次参加举进士的考试，但都名落孙山。在其年近半百之时，他带着苏轼、苏辙兄弟进京参加举进士的考试，而他早已“绝意于功名”，不想同儿子们一道上考场竞技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带自己十多年来在不受为功名所拘束的情况下写成的《权书》、《几策》、《衡论》等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来到京城，先后向欧阳修、韩琦等大臣献上自己的著作。欧阳修读了苏洵的著作后，对其大加赞扬，并希望朝廷能重用苏洵。

但作为宰执的韩琦虽称赞苏洵之文，待苏洵以礼，却不愿给苏洵授官，原因可能是苏洵在著作中的改革之论让当权者不是很舒服。直到嘉祐五年

(1060)八月，朝廷才特任命苏洵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是中央朝廷一个主管图书典籍的官署，可以把它称为国家图书馆。这个官署始于晋朝，先叫秘书寺，后改为省。唐代曾改称兰台、麟台。秦始皇焚书后，天下藏书极少，加上手抄方式和简、帛等载体的限制，所以图书是极为珍贵的物品，两汉以来，朝廷曾多次下诏书求书，藏于宫内秘府，一般人难得一见，“秘书”一词即由此而来。校书郎是秘书省的小官，其职能是从事校勘书籍的工作。这个官职虽然是个苏洵能胜任的文字工作，但官阶太低，而且还是“试”。“试”是宋代职事官领薪水一种制度，凡是以低于该官两级的官职来任该官，享受该官的俸禄，称之为“试”。其他还有“行”、“守”等名称，后文提到时再说。苏洵尽管可以拿校书郎这一官职的俸禄，但其实际官阶比校书郎这一小官还低两级，心中当然不满意。因此在就职一年后又上书宰执韩琦要求另外安排官职。嘉祐六年(1061)七月，适逢太常寺(朝廷主管宗庙礼仪的部门)要编修建隆元年(960)以来的礼书，才任命苏洵为霸州文安县的主簿，同陈州项城县令姚辟一道编修礼书。文安县即今河北文安。主簿这一官职在汉代开始设置，中央及地方官署都设置有这一官职，其职能是掌官署的各种公文办理及相关事务。魏晋时的主簿还成为大臣幕府中的重要属官，参与机要，总领府事，像个大管家，唐宋之后，其职能渐轻，仍是主管文书及相关事务。文安县主簿一职其官阶虽比试秘书省校书郎高一点点，但仍

然是一个小官，苏洵接受得也勉强。而由于他这时的任务是编修礼书，所以他在四年后修完礼书直到第二年因病辞世，都未去文安上任。不过，苏洵去世后，张方平、欧阳修等在为其写墓志铭时，大都以“文安先生”“文安县主簿”这类名称来称呼苏洵。苏洵死后，朝廷特赠予光禄寺丞这一比主簿官阶高几级的官衔，算是对死者的一种安慰。

其次，说说苏轼为官的职能及相关情况。

嘉祐五年(1060)苏轼兄弟在眉山为母亲程夫人服丧，期满后随父返京，三月被朝廷授予河南福昌县(今河南宜阳)主簿之职。但他并未去赴任，经欧阳修的推荐，苏轼参加了制科考试。制科是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临时考试科目。苏轼参加的是直言极谏科的考试，结果入三等。自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科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

苏轼应制科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一职，这是苏轼被朝廷授予的第二个官职。大理评事是掌刑狱的京官。而判官一职始于唐代。唐代准许特派担任临时职务的大臣可以自选中级官员充任判官，辅佐该大臣处理事务。唐代中期以后，节度观察等使均有判官，由本使选充，以备差遣。宋代沿置于各州、府，选派京官充任时称签书判厅公事，简称“签判”。苏轼就是以大理评事这一京官充任凤翔府的“签判”。“签判”这一官职的职能主要是审理案件、掌管文书以及协助知府处理各种事务。苏轼在凤翔干了近四年，尽管无突出的政绩，但由于作为官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到了百姓的疾苦，所以他多次写奏折上奏朝廷，提出改革“衙前之役”、要求“以官榷与民”、“免除积欠”等为民主张。

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从罢任的凤翔回到京师，被朝廷任命“判登闻鼓院”，“判”是在苏轼被授予的官职中首次出现，接下来还有“判官告院”。笔者在所查的《宋史职官志》未查到(可能有，但我没有找到)，而在《辞海》与《古汉语常用字典》中查到基本上是一样的解释。《辞海》：“唐宋官制，以大兼小，即以高官兼较低职位的官称判。”《古汉语常用字典》：“高位兼低职或出任地方官(称判)”。而且这两种工具书都举的《宋史·韩琦传》：“除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这一相同的例子。笔者再查找宋代官制的资料中发现，《辞海》、《古汉语常用字典》的解释尽管与韩琦的任官情况相符，但其他情况便不适于这

种解释。首先说“以高官兼低职”这一点，如在宋代“中书省”“门下省”这两个权力机构中，尽管中书省设了“中书令”这一头号长官，门下省设有“门下侍中”这一头号长官，但都是有名无职，中书省有时是另委派机构内的属官“中书舍人”来“判中书省事”，门下省有时是另委派机构内的属官“给事中”来“判门下省事”，这里的“判”，均是以低位兼任高职。而《古汉语常用字典》中以韩琦“判相州”这点还加了充任地方官的解释，这与苏轼判“登闻鼓院”又不相符，因为登闻鼓院是中央朝廷的一个机构。笔者认为，“判”的意思应理解为以不是这一官职的他官来任这一官职的事，可称其为判。苏轼从凤翔签判任回来，还未被正式授予其他官职，估计仍保留着大理评事这一京官官职，而这一官职应是大理事的属官，而非登闻鼓院的属官。这时要他去“登闻鼓院”工作，所以用了“判”这个称谓。“登闻鼓院”是宋朝专门处理人们上访、上诉的法律机构，它的作用相当于当今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访办。苏轼在凤翔府“签判”任上，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审案这类司法事宜，而“判登闻鼓院”这一官职的职能是掌处理上访、上诉的案件，也是司法这一类。

此后不久，苏轼通过考试，入三等，被授予“直史馆”一职。“直史馆”即史馆的官职之一——直馆。而史馆是宋代朝廷监修国史的机构，有点像今天的中央文史馆。“直馆”这一官职的职能也就是掌修国史，即主持和监修国史。

苏轼在“判登闻鼓院”、“直史馆”这两个职位没有干好久，其妻王弗、其父苏洵先后辞世，苏轼兄弟便护丧回眉并在眉山为父亲服丧三年。

熙宁二年（1069），苏轼服丧期满返京，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殿中丞是殿中省的属官。殿中省是唐代设立来掌皇帝生活诸事的官署，下设各局，分管皇帝的衣食住行。宋代设置这一机构，但它的职能基本被其他机构取代。如原管吃的尚食局的职能归御厨，尚药局的职能归医官院，而殿中省这一机构内如殿中丞之类的官职，都仅为寄禄官。寄禄官是北宋一种官名与职务分离的官，即有这个官名而不做这类事，所以苏轼被授予殿中丞之官名，并不任其事，他的任事的职务是“直史馆判官告院”。“官告院”是掌管官员的任命，以及王公命妇的司封的官署，有点像今天的国家人事部。官告院里设兵部、吏部、司封、司勋四司，每司由郎中

主管。苏轼判官告院具体在哪个司，任何职，笔者现今还无法找到材料，所以不敢妄言。有人说苏轼所管的人事仍在史馆的范围内，像今天中央文史馆的人事处长。

熙宁三年（1070），由于苏轼激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便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推官是掌管刑狱的，这个官职起自唐代，唐代在节度使、观察使下设置推官，主持勘问刑狱。权，代理，兼理。权开封府推官，也就是代理开封府法院的审案长官。但在开封府内，负责审案的还有判官，权职还略高于推官，所以说让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是变法派对他的一种惩处。苏轼此前的官职应属中央级别，现在变成地方级别，并且还是“权”，再加之推官每天刑狱事务繁忙，这在变法派看来，的确是一种惩处。

熙宁四年（1071）又任命兼判尚书祠部。尚书，即尚书省，又称都省，宋代的中央权力机构三省之一（另两省为中书、门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但宋代的尚书令从不委任，而是另外委派诸司三品以上者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尚书省设左右仆射，即两位副长官，分掌左右司，左司管吏、户、礼三部，右司管兵、刑、工三部。左右仆射下各自有一助手，其官职为左丞、右丞。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一员为该部的长官，（不过北宋初，如户、礼、兵、工等部，都只设“判某部事”一员，而未设尚书），各部设有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分管各部内各司之事，这六部与今天中央国务院的各部相似，各部内的各司也与今天部内的各司相似。苏轼所兼判尚书祠部，就是判尚书省礼部中的祠部这一司。祠部是礼部中主管礼乐、祭祀的，苏轼在祠部的官职，估计是员外郎，因为后面熙宁九年（1076）苏轼就是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的官职知河中府。

苏轼不愿在京与变法派纠缠，便请求出任地方官，熙宁四年四月被任命通判杭州。杭州即今浙江杭州，通判一职始于宋，宋王朝为加强中央对州级行政区划的掌控，除设知州外，为防其权过于集中，便设通判一职，作为副长官与知州共同处理政事。其职责为“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知州）通签书施行”，通判还有一个职责是监察本州的各级官吏为官情况，并上报朝廷。说白了，通判就像今天地级市副市长，只不过今天的副市长太多，而宋代则一州只

有一个，权力也较大，除与知州共同处理本州事务外，还可以将本州官员的表现好坏情况上奏朝廷。苏轼于这年十一月到任到熙宁七年（1074）九月离开，三年的时间，协助知州办理杭州各种事项，最值得一提的是协助知州陈述古修复钱塘六井。

熙宁七年（1074）五月，苏轼被任命为知密州。这是苏轼担任的第一个地方行政一把手的职务。该年九月离杭赴密州，密州即今天山东诸城。苏轼在密州任上干了两年，结合所在地的实际在救灾、防盗上，既向朝廷上奏折表明自己的主张，又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百姓做实事好事。

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朝廷任命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员外郎为中央朝廷尚书省六部的属官，员外郎之前还有侍郎、郎中等。尽管如此，苏轼仍以中央朝廷官员的身份而担任河中府的知府，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可就在他去河中府上任的路上，朝廷又将他改任知徐州。徐州即今天江苏徐州。苏轼在徐州任上两年，其值得一提的是组织徐州军民防洪抗洪，保全徐州，派人在徐州西南找到煤炭（当时叫石灰），解决了当地燃料奇缺的问题等政绩。

元丰二年（1079）三月改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可到任不及两月，“乌台诗案”便发，被朝廷逮捕入京下狱。这年十二月经多方营救，加之宋神宗本来也赏识苏轼的才华不愿杀他，苏轼得以出狱，贬官到黄州。苏轼被贬官的全称是“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对于这一全称，笔者要解说一下。所谓“责授”，就是降级授予官职，贬责官员，不限降低几关，称责授。《二十二史考异·宋史五》：“宋时有节度副使、团练副使，皆为责授官，不得签书公事。”团练使本为掌一州军事的长官，而苏轼的团练副使，仅是一种责授官的名称，毫无任事的职权，至于检校尚书，那也是一种虚衔，从唐代开始，在尚书之类的官职前加“检校”二字，意为一种名誉头衔，所以苏轼的“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等都是一种表面上说起好听点的虚衔而已。黄州即今湖北黄冈市。苏轼在黄州从元丰三年（1080）至元丰七年（1084），生活了四年多，尽管无任官之事，但却是他在文学上的丰收时期，《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脍炙人口的诗文均写于这一时期。

元丰七年（1084），苏轼“蒙恩量移汝州”。“量移”是旧时封建王朝对因罪被贬官员一种特殊的施

恩方式，将其从比较远的贬所酌情量移地比较近的地方，苏轼从离京城远的黄州量移至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今河南临汝），就是一蒙恩的体现，而这一恩是神宗皇帝下的手诏。苏轼量移汝州仍冠以“团练副使”的虚衔。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皇帝病逝。五月苏轼被任命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可苏轼到登州任上五天，就被朝廷召回任礼部郎中，郎中是礼部中仅次于侍郎的属官，比先前苏轼在礼部祠部的员外郎官阶高，是礼部的高级部员，郎中一般是要掌本部各司中一司的事务，有点像今天中央各部内一司的司长。其职能就是前面说过的礼乐、祭祀、宴会、贡举类。半月后，又被升为起居舍人。起居舍人是中书省的属官，职能是记录皇帝的言行，是皇帝的近臣。“舍人”是皇帝亲近左右之人的通称。这一任命，把苏轼从尚书省这一中央权力机构调到中书省这一中央权力机构。中书省是北宋三大中央权力机构之一，其职权是主管郊祀、皇帝册文、州县官考课等。中书省又称“右省”，其长官名为中书令，实际上有名无职，副长官为中书侍郎。又另委派一名中书舍人任“判中书省事”，真正掌管本省职权。其属官有右散骑常侍、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等。

元祐元年（1086），苏轼升职为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中书舍人的职能是掌管起草皇帝的诏令。中书舍人这一职能起始于魏，魏在中书省设置中书通事舍人，掌传宣诏命。晋及南朝历代设置，至梁时除去“通事”二字，直称中书舍人。北宋在宋神宗之前，虽设此官，但不任职，直到神宗元丰改官制后，又才名职相符。不久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翰林学士这一官始于唐代。翰林，即文翰之林，即文苑之意。唐高祖武德年间，设立由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翰林院，除文学士外，医卜、方伎、书画，甚至僧道皆可入选，史称“翰林初置，杂流并处”。唐玄宗时，遴选擅长文词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制，皇帝命令一类的文书），翰林院因此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本来起草诏命是中书省中书舍人的专职，唐玄宗担心一些机密诏命难以保密，难以应急，所以才另建翰林学士院，将文学士从杂流中分出，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尽管都是起草诏命，但分工是明确的。翰林学士负责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内制；而中书

舍人负责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事告，称外制。二者并称两制，内制重于外制。所以说苏轼从中书舍人知制诰到翰林学士知制诰是一种荣升。

元祐二年（1087），苏轼又升职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侍读是高级翰林官。宋之前的唐开始设置集贤殿侍讲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职能为皇帝讲论文史，备皇帝顾问，可以说是皇帝的老师。

这二三年间，苏轼从一个贬谪边远之地的小官回到朝廷，连升数级，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但在朝期间，由于他坚持自己一贯为民的政治主张，不仅得罪了新党，而且得罪了旧党，经常遭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回避，连上奏章，要求出任地方官。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龙图阁学士也是一种官名。《宋史职官志二》：“龙图阁，大中祥符中建。阁上供奉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官。”不过，这些官衔都是侍从的荣衔。兵马钤辖是北宋路这一级行政区划专管军事的官员，前面介绍路这一行政区划时已作了说明。苏轼即以龙图阁学士这一京臣的荣衔出任杭州的军政一把手。十几年前，苏轼在杭州是副长官，这次以一把手的身份再莅杭州干了两年，在赈济饥民、救治疫病、兴修水利上做了不少好事，至今让杭州人世代不忘。

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依旧是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的原职。不久，又再次遭到攻击，他只好再次请求离开是非之地。这年八月，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在颍州尽管干了半年，仍然做了兴修水利、赈济饥民的好事。

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改知扬州。八月以兵部尚书诏还。十一月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守”与前面说苏洵的试校书郎的“试”，都是宋代职事官领俸禄的制度，以低于该官一级的官职来任该官，并享受该官的俸禄称“守”。如果是以同级官职来任该官，称为“行”。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是兵部、礼部的长官，和今天的国防部长、文化教育部长差不多。而端明殿学士这一官职始于后唐，以翰林学士担任，职能为主持进读书奏。宋代设置了这一官职，由资深学士大臣担任，宋神宗元丰改官制后，并以执政官担任，但无具体的职掌，仅出入侍从备顾问。第二年苏轼还被授予左朝奉郎一职。朝奉郎是宋寄禄官官名，

无实际职事。

元祐八年（1093），苏轼在为官上又开始了差不多直到辞世的倒霉日子。这年九月，一贯坚定信任苏轼兄弟并实际掌中央朝廷主宰之权的高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哲宗亲政，起用新党，苏轼马上被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苏轼在定州虽然只干了半年，却在整饬军纪、赈济饥民等方面做出了实绩。

绍圣元年（1094）四月，朝廷以讽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贬知边远地英州（今广东英德），八月，还在苏轼去英州赴任的路上，朝廷再将他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节度副使前文已说过，这只是宋代的虚衔，与前面苏轼贬黄州时的团练副使一样，仅是责授官的一种名称而已。苏轼在惠州生活了差不多三年，尽管他不任官事，且是被贬之人，却依旧关心民事，带头修东西二桥，写下了《荔枝叹》这一类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

绍圣四年（1097），以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再贬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别驾也是宋代责授官的一种名称。在儋州这种海外荒野之地，过着苦日子的六十多岁的这位老人还热心于培养后学，这真是让人十分钦佩。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遇大赦，量移廉州（今广西合浦），七月到廉州后，八月又改舒州（今安徽安庆）团练副使，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在去永州的路上，这年十一月，得旨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军州任便居住。提举是一种官名。提举就是今天说的管理。宋代设立管理专门事务的官职，即以提举命名。宋代还另有提举宫观，专为安置罢退的大臣及闲员而设，坐食俸禄而不理事，号为“祠禄官”，苏轼的提举成都玉局观即为此类。“外军州任便居住”，就是你想到什么地方住就到什么地方住。相当于今天的政府官员退休后，拿着退休金，想住哪里就住哪里，让你享余下的有生之年。

苏轼最终选择了在常州居住，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卒于常州。第二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均台上瑞里。

苏轼死后，南宋高宗赠资政殿学士，孝宗赠太师，谥文忠。后世大多称其为苏文忠公。

苏轼一生为官的生涯，在地方为官的时间远多于在中央朝廷为官的时间，尽管他在中央朝廷历任翰林学士、侍读、尚书一类的高官，但值得提的政绩不多，反倒是在近二十年各地地方官任上，做出

了不少的政绩。

最后，说说苏辙为官的职能及相关情况。

嘉祐五年（1060）三月，在眉山为母亲程夫人服丧期满后随父、兄一同进京的苏辙被授予渑池县（今河南渑池）主簿一职，这样，父子三人都有了主簿这一官衔。但他也未去上任，在龙图阁学士杨畋的推荐下，与兄长苏轼一道参加了制科考试。尽管他的考试文章指出了当时皇宫及皇帝本人的问题，但由于太直接、太尖锐，所以在是否录取上，考官们意见不一，争论颇大，最后还是在开明君主仁宗皇帝的肯定之下，才勉强被录为第四等次。

嘉祐元年（1061），朝廷任命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商州即今陕西商洛市的商州区，这里自古为西北至东南的交通枢纽，历代王朝都陈兵把守，所以苏辙此职应为军队中的勘问刑狱的长官。但苏辙未去赴任，这主要原因是当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不肯为苏辙的任命撰词，理由仍是说苏辙在制科考试中“专攻人主”，尽管拖到第二年才由另一知制诰沈遘撰词，这也使苏辙十分气愤，便以在京侍奉父亲为由，未去商州赴任。

治平二年（1065），苏辙被任命为大名府推官。大名府即今河北大名，在宋代为四京之一的北京。苏辙到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差管勾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管勾”的意思是办理，宋代开始将其作为官职名。“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是大名府路安抚使的官署。“机宜文字”，有关机密的文书。此官职的职能就是在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里办理有关机密文书。尽管这个职务官小，但这是当朝宰执韩琦对苏辙的眷顾而授予的，加之薪俸比推官高，而当时边境也比较平静，所写的公文也不多，相对清闲，所以苏辙对此还比较满意，并专门写了《北京谢韩丞相启》，对韩琦表示感谢。

熙宁二年（1069），苏辙同兄长苏轼在眉为父服丧期满返京后，正值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开展变法，苏辙便向神宗上书，表达自己改革的看法。神宗对此十分赞赏，便任命苏辙为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宋代沿前朝之制，设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总揽一国的财政，其长官为三司使。而王安石为了使自己以为朝廷敛财为目的的改革能顺利推行，便设置了三司条例司这一当时的变法总司令部，来统领推行变法。“检详文字”，宋代官名，掌朝廷机要文字。苏辙这个官也就是三司条例这一临时官署内的属官，其职能大致是提出并编写变法中

的法令条例。这个官职在当时可以说是个很让人羡慕的官，苏辙本人出于为国为民而改革时弊的热切愿望也准备大干一场，可在三司条例司里呆了才半年，苏辙就呆不下去了，原因是王安石那些只顾为朝廷敛财而不顾百姓受害的做法，让苏辙很不以为然，争了几回，毫无作用，再呆下去也无丝毫意思，且会惹来祸患，便请求外任，结果被任命为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宋时为四京之一的西京）推官。但苏辙并未赴任。

熙宁三年（1070）正月，张方平知陈州（今河南宛丘一带），奏请朝廷任命苏辙为陈州教授。教授在宋代是学官的名称，职掌学校课试等事。苏辙的陈州教授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教育局长。

熙宁六年（1073），被“以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阳”的文彦博奏请朝廷任命苏辙为河东（北宋十五路之一，治所在并州，即今山西太原）教授，苏辙很感激文彦博的知遇之情，但由于他自幼肺上有问题，怕不习山西水土，便请求朝廷改任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一职，获准。“掌书记”这一官名简称“掌记”，司职笺奏，即章奏一类的文书。

熙宁九年（1076）十月，苏辙在齐州掌书记职任上干了三年，回京候命。被朝廷任命为著作佐郎。宋代有著作郎这一官职，职能是汇编每天的时事。著作郎下置有著作佐郎、校书郎、正字等官。苏辙的著作佐郎一职，也就是做汇编时事的事。

熙宁十年（1077）二月，张方平为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宋代为四京之一的南京，又称南都）留守。奏请朝廷任命苏辙为应天府的签判。

元丰二年（1079），受兄长苏轼“乌台诗案”的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务。盐酒税务的职能就是征收盐税和酒税。

元丰七年（1084）九月，在筠州干了差不多五年盐酒税的苏辙被朝廷任命知绩溪县（安徽绩溪）。这是苏辙第一次担任地方行政一把手。这时苏辙已经四十六岁，年近半百了，他元丰八年（1085）二月到绩溪县任上，半年后就被执掌朝政的高太后召回朝廷，开始了长达八九年的元祐朝臣苏辙这一生中最辉煌的为官生涯。

元祐元年（1086）二月，苏辙到达京师担任右司谏。右司谏为中书省（又称右省）这一中央权力机构的属官，职能是对朝廷的重大事宜、官员的任免提出意见，尽管官阶不高，但权力颇大。苏辙在职半年多的时间，写了很多为国计民生及如何对待

新法、处置新党的奏折，其工作热情极高。

这年九月，又被升为起居郎。起居郎是门下省（又称左省）的属官，其职能是同中书省的起居舍人一样，掌记录皇帝的言行。好在是他的哥哥苏轼此时也未在中书省任起居舍人，而是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了。要不然兄弟二人一为起居舍人，一为起居郎，共同站在朝廷上，共同记录皇帝的言行，这还真有点意思呢！

这年十一月，苏辙又升为中书舍人知制诰，这时的苏轼已是翰林学士知制诰，两弟兄一为“外制”，一为“内制”，“两制”都有，都在为皇帝发布命令，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元祐四年（1089），这年三月苏辙兄长苏轼在三月便出知杭州，苏辙又被朝廷任命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了比中书舍人知制诰更重要的“内制”。而户部侍郎虽是户部的副长官，但大多是主持户部的工作。

这年八月又被朝廷任命为出使了辽国的国信使，代表大宋祝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又称国信，为两国的通使，以符节文书作为凭信。苏辙此次出使了辽国的工作就像今天中国派特使代表国家去参加他国的国庆，表示祝贺。

元祐五年（1090）二月，苏辙又得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的官职。御史中丞这一官职起于汉代，为御史大夫的主要辅助官员，亦称中执法。其职能较宽，权力颇重。在殿中掌图籍秘书；在朝廷外监察地方行政及官员的情况，在朝廷内领侍御史，考察四方文书，劾按公卿章奏。这是西汉时御史中丞的职权。到西汉末期，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就成为御史台的一把手。自东汉至南北朝，御史中丞的威权颇重。唐宋虽置有御史大夫一职，但往往缺位，主要由御史中丞代行其职。其职权相当于今天中央监察部部长的职权。在这个位职上，苏辙主要政绩是坚决抵制将新党重新召回朝廷任职，为此，他写不少这方面的奏折。

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辙又升为尚书右丞，为尚书省的属官，位置在左、右仆射之下，但由于宋代尚书省虽有尚书令这一头号长官的官位，但一般不管事，尚书省的职权通常由左、右仆射行使，而作为尚书省的左、右丞，其他职权也很重要。具体是说，右丞是协助右仆射分管尚书省右司的兵、刑、工三部，是执政官之一，威权在各部之上。

元祐七年（1092），又以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

太中大夫本是掌议论的，在宋已经是寄禄官的名称，而门下侍郎则是门下省的副长官，在北宋，门下省虽有门下侍中这一头号长官的官职，但一般不任人，所以门下侍郎是门下省的真正意义的长官，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封还皇帝失宜的诏命，驳正臣下有违误的章奏）之权。“守”的意思前文已介绍，这里不再重复。获得这一职位的苏辙，也就成为北宋的副宰相。

不过，他的职权运用却不顺，他的意见常常不为同为宰相的刘摯、吕大防所同意，其他如反对让李清臣、邓温伯等新党回朝为官等意见通通未被采纳。而更大的不顺还在后面，或者说灾难即将临头了。这是不是事物到了极点就要开始走向反面呢？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灾难降临到元祐党人包括苏轼苏辙兄弟的头上，第二年四月，苏辙从副宰相的位置一下贬为以端明殿学士知汝州，到汝州任上才一二月，又被贬为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左朝议大夫是北宋寄禄官名称之一，袁州即江西宜春，已属边远之地，不久又贬为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少府监本为朝廷掌所用服饰器玩的官，这里也是成了责授官名称之一，此时苏辙，无职无权，仅是“居住”而已。

绍圣四年（1097），苏辙再贬为化州（今广东化州）别驾（责授官名称之一），雷州（今广东海康）安置。第二年，又被贬移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到元符三年（1106），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向太后执掌朝政，大赦天下，苏辙量移永州（今湖南零陵），四月再移岳州（今湖南岳阳），以后又复太中大夫的官位，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外州军任便居住。

苏辙选择了在颍川（今河南禹州市）居住，一直到政和二年（1112），他离开人间，十多年居住在这里（其间只有一年住汝南），自号颍滨遗老，垂暮之年的苏辙在完成自己的著作上做了不少的以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南宋孝宗谥苏辙为文定，人称苏文定公。

苏辙一生为官，只有元祐初期八九年间，有较突出的政绩，以后官越做越大，政绩反不如前。另一点是尽管他做的官高过其兄苏轼，但远不及苏轼所做十多年地方官的政绩显著。

（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东坡雪堂故址

王琳祥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苏轼自述，张耒、陆游、范成大、王十朋、祝穆、王象之、朱彧、王文诰的记述，以及明、清《黄州府志》的记载，考证了东坡雪堂的准确位置就在“十三坡”黄冈市烟草专卖局宿舍院内。

关键词：东坡 雪堂 故址 考证

北宋元丰四年（1081）正月，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为团练副使的苏轼，生活日益穷困，跟随其多年的老朋友马正卿哀其乏食，特向黄州太守徐君猷请得废弃的军营地数十亩，使之躬耕其中，自食其力。由于躬耕之地素号“东坡”，而苏轼所钦慕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曾在忠州一个叫“东坡”的地方以种树自娱，苏轼自忖其中颇有因缘，故将自己别号“东坡居士”（居士，在家学佛的人）。

元丰五年正二月，苏东坡在躬耕地“东坡之胁”作草屋五间。因房子落成之日适逢大雪，有感于雪的品质，苏东坡将草堂内四壁绘满雪花，并将其名之为“东坡雪堂”，不久，作《雪堂记》以彰其举。

星移斗转，沧桑巨变。930年后的今天，黄州人对苏东坡当年的躬耕所在地已说不明白，就是几位从事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总的趋向，则以今日黄冈师院老校区、体育路一带为是。由于此种说法，出自于黄冈的学者，以至外地苏学专家均仿效此说，影响较大。笔者经过长时间的考证，认为此说有误后来君子：东坡、雪堂的遗址不在今日黄冈师院老校区、体育路一带，它的准确位置应是在黄州城区内的青云街与考棚街之间。

一、苏东坡自述东坡在黄州城中

元丰四年（1081）春日，苏东坡给杨元素去信

一封说：“近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不久，苏东坡又与堂兄子安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亦开门见山地写道：“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杨元素即杨绘，四川绵竹（今四川德阳市北）人。子安名不危，系苏东坡伯父苏涣的第三个儿子。当年十月，苏东坡在《东坡八首》诗叙中又记述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稍后，又与巢元修写信说：“近日牢城失火，烧荡十九，雪堂亦危。”从苏东坡与杨元素、苏子安的两封书信及《东坡八首》诗叙中有“城中”、“郡中”之语，可知东坡位于黄州城内。又，牢城即今监狱，只能是在黄州城内。雪堂既与牢城相近，也一定不会是位于黄州城外的。苏东坡是当事人，他的记述应是最可靠的原始资料。

二、《入蜀记》中记述东坡雪堂位于黄州城内

南宋大诗人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游览黄州后，在《入蜀记》中用了大量的笔墨记述了他游览东坡诸胜的全过程。现仅将有关文字摘录如下：

十九日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坦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是为雪堂。……又有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出城五里，至安国寺，亦苏公所尝寓。

按照以上文字，可知陆游当日游东坡，是“自州门而东”之后才到东坡的，在游览了东坡、雪堂、四望亭诸胜之后，又“出城五里，至安国寺”。原文中既有入城又有出城，这东坡、雪堂明显是位于

黄州城内。倘若东坡位于黄州城外，陆游大可不必“自州门而东”，“至东坡”后再“出城五里，至安国寺”。从“自州门而东”五字来看，陆游是从西门入城。又“出城五里，至安国寺”，这个城门又只能是南门，因安国寺位于黄州城的南边，古今未曾改变。

三、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述东坡雪堂在郡东

苏东坡曾在《与王定国》尺牍中说：“近于侧近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众所周知，苏东坡躬耕东坡之时，寓居临皋亭（临皋亭位于今黄冈中学内，笔者已有专文考证，此不赘述）。苏东坡《与王定国》尺牍中“侧近”二字道出了天机。东坡既与临皋亭侧近，说明雪堂离临皋亭不远。

南宋人范成大继陆游之后游览黄州，在《吴船录》中，范成大记述东坡雪堂说：

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东坡卜居时，是亦有取于风水之说。前守鸠材欲作设厅，已而辍作雪堂，故稍宏壮。堂东小屋榜曰东坡，堂前桥亭曰小桥，皆后人旁缘命之。对面高坡上新作小亭曰高寒，姑取《水调》中语，非当时故实。然此亭正对东岸武昌数峰，亦登览不凡处。

所谓郡东，即指州治的东边。与陆游的记述相比较，范成大的记述显得细腻一些。范成大认为位于郡东的雪堂之所以具有良好的风水，即“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陆游说“亭下面南一堂颇雄，……是为雪堂”，范成大经过了解，知道“前守鸠材欲作设厅，已而辍作雪堂，故稍宏壮”。陆游说“又有四望亭，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范成大则说“对面高坡上新作小亭曰高寒，姑取《水调（歌头）》中语……然此亭正对东岸武昌数峰，亦登览不凡处”。依前所述，四望亭曾被宋人张激改名为高寒楼。陆游所说，沿袭古称谓，范成大所言，即当时的叫法，二人所言实则一亭。

四、南宋人皆言东坡在州治之东百余步

苏东坡有《日日出东门》诗，南宋人王十朋注引王子仁的话说：“《东坡图》云东门，近东坡之门

也。在乾明寺前五十步，今无矣。”南宋人施元之注《东坡八首并叙》说：“东坡，在黄冈山下，州治东百余步。”南宋人祝穆在《方舆胜览》卷之五十黄州堂馆门下也说：“雪堂，在州治东百步。”南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四十九黄州景物上也记述说：“东坡，在州治之东百余步。元丰三年，苏轼谪居，寓临皋亭后得此地，立雪堂而徙居焉。七年移汝州，去黄之日，遂以雪堂付潘大临兄弟居焉。四望亭，在雪堂高阜之上。”

所谓州治，即黄州太守的公署，如同今日黄冈市政府办公大楼所在地。施元之、祝穆笔下的“州治东”、王象之笔下的“州治之东”与范成大笔下的“郡东”意义相同。

宋代的黄州州治，北宋人张耒在《续明道杂志》中说：“黄州，江南流在州西。……去治无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颇峻峙，土人言此赤壁矶也。”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记述说：“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

从古到今，赤壁的位置始终未变。根据张耒与苏东坡的记述，黄州州治与赤壁相距“无百步”，黄州太守的居所与赤壁相距数百步。很明显，元、明、清时代黄州府署的所在地（今日黄州区委宿舍区），即宋代的黄州州治。再以南宋人笔下的“郡东”、“州治之东百余步”来考证东坡、雪堂的旧址，结合苏东坡“近于城中葺一荒园”、“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牢城失火，……雪堂亦危”的自述，我们可以得知东坡、雪堂只能是在黄州城内距离黄州府署所在百余步的地方。

南宋人朱彧曾在《萍州可谈》中记述说：“苏子瞻谪黄州，居州之东坡，作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后人遂目子瞻为东坡。其地今属佛庙。”《萍州可谈》以上“其地今属佛庙”的记述表明，雪堂在南宋时曾一度改为佛寺。

五、明代《黄州府志》、《黄冈县志》记载东坡、雪堂、洗墨池皆在县学东，距城南的一字门四百三十步

明代弘治《黄州府志》古迹“东坡故居”下载：“在今县学东。宋元丰三年，苏轼为吴兴守谪黄州。三年，故人马正卿为守得此地，立雪堂居之，自号东坡居士。”又，该府志古迹“东坡梅”下说：“独株，在东坡洗墨池畔，相传东坡亲植，古树犹存。”又，该府志“亭堂”条下说：“雪堂，在府城内东

南百步”，“四望亭，在雪堂之南高阜处。唐太和年间刺史刘胤之建，李绅作记，后张激更为楼。今无址，疑在今一字门西城高处是其址也。”

撰纂弘治《黄州府志》的黄州知府卢濬在《古黄遗迹集》中说：“东坡，在府治东南、县学前。宋苏子瞻先生谪黄筑居于此，因以为号。有洗墨池，尚存，后人思之，为建祠塑像焉。”

明代万历《黄冈县志》古迹下载：“雪堂老梅，在城东南百步。……以《东坡图》考之，自黄州门，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元季，堂毁。洪武戊申展筑城，遂围旧址在内，建县学。”

清乾隆进士陈诗不同意万历《黄冈县志》“洪武戊申展筑城，遂围旧址在内”的说法，故在《湖北旧闻录》卷二十七中批评说：“《县志》言东坡雪堂旧址，至洪武戊申展筑郡城，遂在城内。考之本集，与杨元素及兄子安尺牍，并云‘于城中得荒地’，而简巢元修又言‘牢城失火，雪堂亦危’，则《志》言未为的也。”

将以上府志、县志的记载进行综合分析，可知东坡、雪堂、洗墨池皆在明代县学的东边（明代的县学据黄州城图在今市艺术学校院内），又在四望亭的北边。雪堂老梅在东坡洗墨池畔（据城图洗墨池在今市烟草专卖局宿舍区院内），又在黄州城东南百步的地方。雪堂与黄州城门相距四百三十步。

需要说明的是，古黄州城依赤壁山而筑，虽有东、南、西、北四门，但四门并非是正对东、南、西、北的。除东门之外，南门实际位于东南，西门位于西南，北门位于西北。由于黄州城特殊的地理环境，明代万历《黄冈县志》所说的“雪堂老梅在城东南百步”，其城东南实际是指黄州城内的东南。

（“雪堂老梅”即弘治《黄州府志》所说的“东坡梅”，后称“东坡老梅”）又，“自黄州门，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是说雪堂在黄州南门的南边四百三十步。“南至雪堂”的南是与北相对而言的，因南门左右两边亦有南、北之分。又，《黄冈县志》中所说的“府旧志”即指弘治《黄州府志》。弘治《黄州府志》言四望亭在雪堂的南边，并疑一字门西边的高阜即四望亭遗址，与陆游《入蜀记》“又有四望亭，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王象之“四望亭，在雪堂高阜之上”的记述相同。

六、清代学者王文诰实地考察，自临皋亭至东

坡不及一里

清代苏学专家王文诰曾于嘉庆四年（1799）七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游览了黄州东坡诸胜，并将此行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二十一元丰四年的记事中进行了回顾，其原文如下：

诰于嘉庆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抵齐安，夜泊赤壁矶下。翌日，登赤壁。壁上为公祠，祠依山为高下，窈窕而幽邃。门屏刻王式丹手书《赤壁赋》。一出栏外，则江山数百里间，苍翠明练，皆奔赴闼下。因沿江而至朝宗门。门之左，峙江岸，为临皋。入门而左绕，历阑干，至尽，多陂陇莳植之地，则东坡雪堂在焉。堂三楹，塌其右，中有“雪堂”二字榜，字古而劣，且失考订，公原榜为“东坡雪堂”也。余无所见，惟宋牧仲泥像在右，朝衣冠坐榛莽中而已。黄城瞰江而跨谷，在处皆黄泥之坂，一入公文便成幽胜。自临皋至东坡不及一里，故公得往来其间也。

齐安，黄州前称。朝宗门，本是唐宋时期黄州城南门的称谓，明清时已改称一字门，王文诰此处仍用旧称，亦可佐证宋元明清黄州城一脉相承，亦可排除今人有“宋城不在明清黄州城内”的说法。阑干，即市区。陂陇莳植之地，即高低不平种植农作物的地方。在处，所在之处。坂，即斜坡。临皋，临皋亭座落之地。

将王文诰以上文字简而言之，即在游览赤壁之后，王文诰沿江步至黄州城东南的朝宗门，入城门后左转弯，穿过闹市区抵达东坡雪堂，原文中“入门而左绕”一句十分重要，它表明东坡雪堂的所在地靠近朝宗门左边的城墙，而且与朝宗门相隔不远。又，王文诰最后强调“自临皋至东坡不及一里，故公得往来其间也”。一里，市制150丈，合公制500米。清代的一里是多少呢？清人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以三百六十步为里。”步，量词，古人一般以六尺为一步。按王文诰所说，临皋亭位于朝宗门外的左边（即今黄冈中学校内），由此计算，包括“入（城）门而左绕”，不足一里路程的地方只能是今日黄州城内的穆家街一带。又“自临皋至东坡”，是指从临皋亭到东坡地界。据苏东坡自称“近于城中得荒地数十亩”，数十亩的东坡毕竟也有起止界限。以上万历《黄冈县志》载“黄州门，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是指南门至雪堂之间四百

三十步。王文诰言“自临皋至东坡不及一里”，是指临皋亭到东坡地界。南门与临皋亭之间的距离虽然未明确言及，但稍加分析，可知不足半里，而临皋亭至雪堂之间的距离亦可想而知不会超过二里。

七、清代《黄州府志》记载培风亭即四望亭，亭下稍北即雪堂

清光绪《黄州府志》古迹条下记载说：“东坡，在城东南隅，宋苏轼居此，号东坡居士，慕唐白居易而名也。”又，“雪堂，在城东南，宋苏轼谪黄得故营地数十亩，躬耕其中，是为东坡。筑垣作室，落成时大雪，因名雪堂。”又，“高寒楼，在今南城高阜，楼下稍北即雪堂，俗呼南楼墩，旧为四望亭（县志：嘉庆十八年，通判胡楷建石亭于其上，更名培风亭）。”又，“四望亭在城南高阜，即今培风亭。”

所谓“城东南隅”，即指城的东南边。将以上文字进行综合分析，即可认定东坡、雪堂皆位于黄州城内的东南边。与雪堂相直的四望亭在城南高阜，明清时因高寒楼而俗称南楼墩，自嘉庆十八年（1813）建石亭于其上之后，更名为培风亭。培风亭位于黄州城南的城墙上，雪堂既在培风亭下稍北处，其址显然是在城内。

八、清光绪《黄州府志》的黄州城图上，东坡位于大穆家巷侧

世居黄州的市民一定会记得明清时代留存下来的黄州城的东门。东门称为清淮门，在宋代称之为怀化门，它座落于今市邮政局、市幼儿园的那一段街面上（明清时代的黄州城是在唐宋时期的黄州城址上修筑，只是西北边稍加拓展，鄙人已有专文讨论，此不赘述）。根据城门的所在位置，今日市幼儿园西边的市实验小学等单位及市邮政局西边的考棚街等均可视为位于古城之内，而市邮政局、市幼儿园东边的地盘皆属城外。有鉴于此，主张今日黄冈师院老校区、体育路一带系东坡雪堂所在地者，实际上都是把苏东坡的躬耕地误会成位于黄州城外了。

根据苏东坡雪堂在“东坡之胁”的自述，结合宋人陆游、范成大、王象之等人的记载，可知四望亭（高寒楼）与雪堂南北相对。四望亭位于高阜，

正对江南武昌西山、樊山数峰。考今黄冈中学侧近之处，黄州区幼儿园所在地因位于黄州城墙之上，其位置最高。园内赭色山包上的清代培风亭遗址，今黄州耆旧皆可指数，由此可知，此地即四望亭故址。陆游言四望亭与雪堂南北相直，范成大说雪堂在高寒楼的对面，王象之言“东坡在州治之东百余步，轼得之，筑雪堂而居焉”，明代的弘治《黄州府志》也说四望亭在雪堂的南边，洗墨池旧址尚存，并言东坡老梅在洗墨池畔，由此推知，雪堂的位置只能是在今日黄州区幼儿园的南边。

以上宋明清时代的方志，明确记载了东坡雪堂位于黄州城的东南隅，与一字门相近，在培风亭稍北处。事实上，在清光绪十年（1884）绘制的府城图上，绘图者早已注明了“东坡”的具体位置，即城南的大穆家巷一带。与“东坡”相近处尚有古迹“洗墨池”与之联袂，《黄州府志》、《黄冈县志》皆认定它为“苏轼洗墨处”。府城图上大穆家巷的南边是培风亭，培风亭稍东即一字门。

清光绪十年绘制的黄州城图与今日黄州老城区的街道闾巷的布局基本相同，培风亭的遗址已辟为黄州区幼儿园，东坡躬耕地因大、小穆家巷而称之为穆家街，而最具有说服力的洗墨池遗址在今日黄冈市艺术学校（原黄冈地区汉剧团）的东边依稀可辨。从今日仍存的地形地貌来看，东坡雪堂的准确位置就在“十三坡”黄冈市烟草专卖局宿舍院内。

（湖北黄冈市赤壁风景管理处副研究馆员）

三苏在京城开封的寓所、宅院、府邸和别业初探

刘继增

内容提要：三苏在京城汴梁的寓居、宅院和别业，以其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私人空间里特有氛围营造着贴近生活、自由交游的创作环境。本文从三苏诗文、文献典籍和城市考古研究成果中，探究他们在京都的寓居、宅院和别业，并以此为视域对不同身份、不同境遇时处于相对私密空间的三苏生平、诗文予以讨论。

关键词：三苏 京城 寓所 宅院 别业

现在的开封是北宋的京城汴梁，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对三苏在京城的活动和创作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从其寓居、宅院、府邸、别业的视角来研究三苏，呈现三苏立体、鲜活形象却少有。本文从三苏诗文、文献典籍和城市考古研究成果中，探究他们在京都的寓居、宅院和别业，并以此为视域对不同身份、不同境遇时处于相对私密空间的三苏生平、诗文予以讨论。

一、京城应试时的寓居

(一) 兴国寺浴室院

嘉祐元年（1056）五、六月间苏洵携子轼、辙抵京师应试馆于兴国寺浴室院。据《汴京遗迹志》卷十载：“兴国寺，在马军桥东北，太平兴国间建。”①即里城墙西门——阖闔门（今大梁门）内至宫城宣德门前之间的“御路”南侧。

浴室院是兴国寺为羁旅之人提供客房的普通僧舍。浴室之南有古屋，东西壁画六祖像。其东壁，刻木为楼阁堂宇以障之，不见其全，而西壁三师，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苏轼《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序》云：“予嘉祐初举进士，馆于兴国浴室

老僧德香之院。”②苏辙有“昔年旅东都，局促吁已厌。城西近精庐，长老时一覩”。（苏辙《和子瞻宿临安净土寺》）③三十一年后的“元祐三年（1088），苏轼闲暇之时前往太平兴国寺浴室院游观，发现中书舍人彭汝砺“亦馆于是”。岁月沧桑，物是人非，“院中人无复识予者。独主僧惠汶，盖当时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导予观令宗画，则三祖依然尚在荫翳间。”旧地重游，拜访故人，年少时在此居住的那段往事已凝结成一份特殊的情愫。之后，苏轼又携秦观来此拜访僧惠汶。秦观得以“始识汶师”，“后二年复来，阅诸公诗，因次韵”。④此时，陈慥“寓棋簾于”太平兴国寺，苏轼与范百禄“数来从之”。李廌在京也寓居于此，也许与苏轼的推荐不无关系。李廌有诗，题曰：“廌寓龙兴仁王佛舍，德麟、公定、道辅、仲宝携酒肴纳凉，联句十六韵。”⑤

(二) 西岗

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苏轼母丧服除离蜀抵京师，在里城西岗赁居一宅子暂住。

据苏轼《与杨济甫第一简》载：“为别忽已半岁，倾想之怀，远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贵眷各安吉？自离家至荆南，数次奉书，计并闻达。前月半已至京，一行无恙。得腊月中所惠书，甚慰远意。见在西岗赁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缘会见，千万珍重！珍重！”⑥

(三) 怀远驿

嘉祐五年（1060），苏轼授福昌县主簿、渑池县主簿未赴，仁宗诏敕制科考试，遂寓居怀远驿准备制考。

怀远驿，待交阨使，为京都四驿馆之一。据孔凡礼《三苏年谱》引施注《苏轼诗集》、《北道刊误

志》载，怀远驿位于丽景门河南岸，旧城内左一厢，又名崇德坊、兴道坊。

日食“三白”。据《曲洧旧闻》卷三载：

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

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⑦

“夜雨对床”之约。苏轼兄弟在怀远驿读韦应物“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诗句时，两人感慨不已，相约将来及早退引，归隐田园，共践“夜雨对床”之约。苏轼《辛丑十一月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首寄之》、《初秋寄子由》、《感旧诗》，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再祭亡兄端明文》相继提及此事。^⑧发生在怀远驿苏轼兄弟“夜雨对床”遂成为兄弟情深的标志。

（四）城南痒斋（太学）

痒斋，即太学，北宋为最高学府，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隶国子监，在里城南。苏辙中制科后，从怀远驿搬出居此，与国子监直讲黎錞比邻。

苏辙《辛丑初日寄子瞻》有“城南痒斋净，终岁守坟籍”之句。^⑨苏辙《次韵子瞻寄眉州黎希声》自注：辙昔侍先人于京师，与希声邻居太学前。^⑩

黎錞，字希声，登第后累官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欧阳修荐为学官，得国子监直讲，据墓志铭载：“是时，太学生凡几千数，诸博士讲解，先日撰口义，升座徐读而退，无复辨析旨要。公独不然，置经于前，按文释义，听者乐闻其说，咸宗尚之。”^⑪

《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五载：黎錞任直讲日，英宗以蜀士问欧阳修，对曰：文行苏洵，经术黎錞。初，眉山苏洵与黎錞具客京师。僦居比邻。苏公二子轼、辙及黎公二子俦、诜皆在。二公父子具受知于欧阳公，时望归之。^⑫

（五）雍丘

雍丘，古多杞柳，西周称杞国，秦置雍丘县。雍丘城（即今杞县县城）是杞国的都城。距京东八十七里，北宋畿内十六县之一。嘉祐五年（1060）三月苏洵寓居雍丘（杞县）一年余，轼、辙备考制科期间多次前去与伯父、父亲相聚。

苏轼的伯父苏涣（1002~1062）是眉山苏氏弟子中最先从政的一个。初字公群、晚字文甫，天圣元年（1023）始就乡试，明年（1024）登科，官至都官郎中、提点利州路刑狱，在杞有产业。嘉祐二年

（1057）十月，苏涣知卫州任满，授知涟水军未行。苏洵因轼、辙备考制科寓居怀远驿，苏洵遂居雍丘（杞县）。苏辙《辛丑初日寄子瞻》道出其父苏洵寓居雍丘（杞县）的真正原因：“居梁不耐贫，投杞辟糠覈。”^⑬

苏轼曾向伯父求教为政之道，据宋陈天倪《颍滨语录》载，“颍滨尝语陈天倪云：亡兄子瞻及第调官，见先伯父，问所以为政之方。伯父曰：‘如汝作《刑赏忠厚论》。’子瞻曰：‘文章固某所能，然初未尝学为政也，奈何？’伯父曰：‘汝在场屋，得一论题时，即有处置，方敢下笔，此文遂佳。为政亦然。有事入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至今以此言为家法。”^⑭

苏辙九岁那年在老家眉山第一次见到伯父，第二次见伯父就是在杞，“辙生九年始见公于乡，其后见公于杞”。^⑮

二、任职期间京城的寓所、宅院

（一）宜秋门里南园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苏辙应制科考试，朝廷任苏轼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赴任前，苏轼在宜秋门里购得一住宅，名南园。

宜秋门为内城西墙南门，因唐汴州城称郑门亦称旧郑门，位于今开封城西墙南门（小西门）附近。从州桥向西经宜秋门（旧郑门）至顺天门为京城的四条主要街道之一，为皇帝御路，街道宽20~50步，南园当位于御路一侧。^⑯南园四周高槐古柳，四面有院墙，园有堂、斋，檐下置木假山。庭前花圃“无数亩”，种植有翠竹、芦笋、石榴，有萱草、葵花、牵牛花，还有一座葡萄架。苏辙《赋园中所有十首》将园中花草树木一一题咏，苏轼在凤翔作《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⑰

嘉祐六年（1061）七月，五十三岁的苏洵任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苏辙授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苏辙以父亲年迈需人服侍为名未赴任，奉官师居其中，苏洵在南园住了三年零十个月。

苏洵在南园房前檐下置木假山。三苏眉山老家原有一座木假山，南园中放置的这座木假山是嘉祐四年赴京师途中杨纬赠送的，苏洵视作“忘言伴”，并作《寄杨纬》诗表示“京洛有幽居，吾将隐而玩”。^⑱“庭前三小山，本为水中楂。当前凿方池，寒泉

照谿砾。”（苏洵《答二任》）⑩苏辙帮其父苏洵穿墙引水，置木假山于池中，水从池中溢出，浇灌园中花草树木，苏辙作有《木山引水二首》，苏轼作《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⑪尤其是苏辙在园中作诗，苏轼在风翔唱和，二人合著《岐梁唱和集》。苏轼兄弟一生唱和之作很多，但亲自编辑成书的只有这一部。

苏洵上班编《礼书》，下班在南园操弄花圃、为《易经》作注。治平二年（1065）四月二十五日《太常因革礼》书成，方奏未报而以疾卒。“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曾巩《苏明允哀辞》）苏轼兄弟在南园设置灵堂，英宗赠苏洵光禄寺丞，并敕官府备船载苏洵之丧回川。“三年弟子行丧礼，千辆乡人会葬车”。（欧阳修《苏主簿挽词》）⑫朝野之士为之作挽词者有一百三十三人。

（二）范镇东园

范镇东园，位于京城外城东门——陈桥门外。范镇，字景仁，时以户部侍郎致仕，东园是其别业。熙宁十年（1077）二月，苏轼在此寓居两个月

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十五日，苏轼由密州知州改知河中府（今陕西永济西）诰下，熙宁十年（1077）二月十二日，至京城外城东门——陈桥门，为门者所阻，苏轼改知徐州，“有旨不得入国门”，遂寓居京师郊外范镇东园。⑬时范镇致仕在东园别业休养。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苏辙自齐州至京师也在此寓居，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寄范文景仁》：

京城冠盖如云屯，日中奔走争市门。
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
隐君白发养浩气，高论惊世门无宾。
欣然为我解东阁，明窗净几舒华茵。
春天雪花大如手，九衢断绝愁四邻。
平明熟睡呼不觉，清诗渌酒时相亲。⑭
苏辙得知其兄来京，亲到黄河的边上迎接：
我兄东来自东武，走马出见黄河滨。
及门却遣不得入，回顾欲去行无人。

东园桃李正欲发，开门借与停车轮。⑮

苏轼在东园寓居期间，范镇把别墅交给苏轼兄弟自己去嵩洛一游。苏轼兄弟在东园，访友、会友，为十九岁的长子苏迈娶妇石氏，请人为子苏迨治病。

苏轼访友、会友，创作了六诗三词。《送范景

仁游洛中》、《次韵景仁留别》：三月三日，范镇前往西京洛阳游，作诗送之，范镇作留别诗，苏轼次韵答之。《书韩干画马》：韩干，唐代著名画家，以画马著称。驸马王诜知苏轼寓居郊外，三月二日致简苏轼在城外四照亭相见，席间赋《洞仙歌》、《喜长春》词二首。三月三日，又送韩干画图，请苏轼题跋，苏轼在画轴上作《书韩干画马》诗。后又至京城王诜花园中相会。据《王直方诗话》载：东坡与孙洙（巨源）会于王晋卿花园中，与晋卿、孙洙在一起品茶、联对，苏轼并赋《满庭芳》词一首。《京师哭任遵圣》：任孜，号遵圣，四川眉山人，以学问气节和苏洵一样，名重乡里。弟任师中，同举进士，官至中大夫简州平原县令卒。苏轼评价他“文章得少誉，诗语龙清壮”。《送鲁元韩知卫州》：鲁元韩，名有开，安徽亳州人。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曾通判杭州，苏轼与鲁一起任职，此日，任卫州（今河南辉县市）知州，苏轼送之。还有诗《次韵子由送蒋夔代州学官》。

为长子苏迈娶妇：据苏轼《与眉守黎希声三首》载：“向自密将赴河中，至陈桥，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儿子娶妇，暂留城东景仁园中。”⑯

为仲子苏迨治病：“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对坐为布气，迨闻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苏轼《李若之布气》）⑰直到四月苏轼才与苏辙同行，沿汴河乘船赴徐州任。

（三）阖闔门外白家巷

元丰八年十二月上旬末，苏轼再次回到京城居阖闔门外白家巷中。阖闔门为内城西墙北门，位于今开封城西墙大梁门处。该门址唐汴州城时称梁门，北宋时称阖闔，金元时称安利门，明清时称大梁门，今仍称大梁门，俗称西门。⑱

苏轼不怕鬼。据李廌《师友谈记》载：

东坡先生居阖闔门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妇欧阳氏，产后因病为祟所凭，曰：“吾姓王氏，名静奴，滞魄在此居，久矣。”公曰：“吾非畏鬼之人也，且京师善符剑遣厉者甚多，决能逐汝，汝以愚而死，死亦妄为祟。”为言佛氏破妄解脱之理，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时当用佛氏功德之法与汝。”妇辄合爪，曰：“感尚书去也。”妇良愈。明日昏时，为自书功德疏一通，仍为置酒脯香火遣送之。

公曰：某平生屡与鬼神辩论矣。顷迨之妇，

忽云有贼貌瘦而黑，衣以青，公使数人索之，无有也。乳媪俄发狂，声色俱怒，如卒伍辈唱喏甚大。公往视之，辄厉声，曰：“某即瘦黑而衣青者也，非贼也，鬼也，欲此媪出，为我作巫。”公曰：“宁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学士不令渠出，不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纸，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杯水，可乎？”公曰：“与之。”媪饮毕，仆地而苏。^⑩

六君子齐聚苏宅。元祐时期“苏门”正式确立，也是“苏门”最为活跃繁盛时期。^⑪元祐二年的一个暇日，六君子齐聚苏轼宅中。苏轼时任翰林学士，忽有旨令其撰《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口宣茶药诏，东坡就牍书云：“于赫神考，如日在天。”然后问诸位：“能代下一转语否？”各辞之。东坡随笔后书云：“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六君子“大以耸服”。^⑫

苏门士人造访。据梁建国先生在《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考证，元祐元年，黄庭坚曾独自来到苏轼家中。^⑬元祐三年四月，李廌欲离京返乡，前来苏轼宅中作别，苏轼馆之于东斋，又怜其贫寒无以为生，将所得天厩马相赠，又亲笔作马券为据。^⑭黄庭坚则为之作跋，跋文中设身处地地考虑到李廌当卖掉此马，并指出马券上苏轼的墨宝将使之大大增值。^⑮李廌临走时，苏轼又“作诗送之”，^⑯黄庭坚亦有和诗。^⑰在这年的礼部试中，黄庭坚为参详官，与苏轼共同参与了录拔工作，因而二人对于李廌的意外落第都深表愧疚，于是在送行诗中既肯定其才华的出众，又鼓励其继续努力。^⑱

东坡在家巧拒谋官者。据《墨庄漫录》卷五载：

有一故人，与子由兄弟有旧者，来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来见子由，且云：“某有望内翰以一言为助。”公徐曰：“旧闻有人贫甚，无以为生，乃谋伐冢，遂破一冢，见一人裸而坐，曰：‘尔不闻汉世杨王孙乎？裸葬以矫世，无物以济汝也。’复凿一冢，用力弥艰，既久，见一王者，曰：‘我汉文帝也。遗制圹中无纳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济汝？’复有二冢相连，乃穿其左者，久之方透，见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饥色，饿于首阳之下，无以应汝之求。’其人叹曰：‘用力之勤无所获，

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谓曰‘劝汝别谋于他所。汝视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⑲

三、京城任职期间的府邸、别业

（一）宣德楼右掖门之前的东府

东府——苏辙在开封的府邸，位于京城大内宫城正门宣德楼右掖门之前。^⑳宣德楼右掖门，非正门而在两旁，若人之臂掖也，故称宣德楼右掖门，在宣德楼右边者为右掖门，在宣德楼左边者为左掖门。宣德门南向正对御街，为全城中轴线，从宣德门到州桥是宫廷广场。广场东西两侧建有千步之廊，又称御廊，东西御廊向北正对宣德门两边的左右掖门。^㉑有“床头枕驰道，双阙夜未央，车轂鸣枕中”之称。^㉒宣德楼右掖门位于今宋都御街与西门大街的交叉口处，北宋时期镇守宣德楼的石狮至今还保存在午朝门广场入口处。^㉓

宣德楼右掖门之前的东府，是宋神宗提议为执政大臣修建的府邸。据陈曦《东府纪》载：“国朝以来，尚袭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间，乃出圣画，新创二府，度地于阙之西南，自熙宁三年，兴作东、西府，凡八位。明年八月，东府四位告成。^㉔东府庭院内还种植有梧桐树等。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辙任尚书右丞、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尚书右丞为六执政之一，掌参议大政，位在六部尚书之上；门下侍郎为副相。苏辙上任后即迁居东府，直至绍圣元年（1094）四月以太中大夫知汝州止，一直居住在这里。

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辙任尚书右丞。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被召入京，任吏部尚书，位在苏辙之下，后又改任翰林学士承旨、侍读。苏轼多次上疏辞免，五月行至南都，苏轼又上《杭州召还乞郡状》，在《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一状》说：“兄居禁林，弟为执政，在公朝既合回避，于私门实惧满盈。……伏望圣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元祐六年六月，苏轼自杭州召还，至赴颍州（今安徽阜阳）之前，寓居子由东府数月。^㉕

苏轼辞翰林学士的同时，苏辙却在辞尚书右丞，苏辙辞尚书右丞，曾四上札子，两上表章。他在《辞尚书右丞札子》中说，学无他师，以父兄为师。“其后不幸早孤，（与兄）友爱毕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顷者兄弟同列侍从，臣已自愧于心。

今兹超迁，丞辖中台，与闻政事。而臣兄轼适自外召还，为吏部尚书，顾出臣下。复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实不遑安。况轼之为人，文学政事过臣远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远慕古人，内举亲戚，无所回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与兄轼同为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⑭

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东府寓居数月后作《感旧诗》诗，留别子由去颍州任上。苏轼在诗中留下了“扣门呼阿同，安寝已太康。”寓居东府的难忘瞬间。苏辙在和诗中与兄长规划着：“家有二顷田，岁办十口粮。教敕诸子弟，编排旧文章。辛勤养松竹，迟莫多风霜。”^⑮致仕后的生活。元祐八年（1093）八月，苏轼赴定州任，再次和苏辙在东府相聚，忆起三年三次相聚在东府的情景：“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并借白居易《杏为梁歌》诗意，语重心长发出“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的警策之语。^⑯

（二）浚仪别业

苏辙在京师任职期间于浚仪置有别业。浚仪即今开封县旧称。汉于此置浚仪县，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改称祥符县。属北宋京畿十六县之一，故有浚都之称。

“别业”业主原有一处住宅，而后另营别墅，称为别业。别业和宅园的区别在于前者位于郊区，是以家宅为主体的园林；后者位于城市，是在家宅用地中划出一部分用地专门布置成园林，供游憩之用，同家宅隔开。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常州病故，次年闰六月移葬郏城，其子在郏守孝期满后，相继投靠居住在许昌的苏辙，生活十分拮据。苏辙此时方降三官，谪籍夺俸。据苏籀《栾城遗言》载，“公笃爱天伦，囊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⑰

论文注释：

①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0页。

②、⑬、⑭、⑮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3页、第1561页、第2333页、第679页。

③、⑨、⑩、⑪、⑫、⑯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第15页、第151页、第15页、

第518页、第46~48页、第171页、第145页、第1039页、第1842页附录三苏籀《栾城遗言》(节录)。

⑦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页《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师从翰林苏先生过兴国浴室院始识汶师后二年复来阅诸公诗因次韵》。

⑧《黄庭坚全集》，第727页卷二七《跋浴室院画六祖师》；李廌《济南集》，卷二第1115册第729页。

⑨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8页；刘春迎《考古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北宋东京地形复原像示意图》；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北宋东京地形复原像示意图》标注的岗有：内外城北：百冈、牟驼冈、霍赤冈、风城冈；城西：望牛冈、城东：独东冈、白石冈。西冈在东京城位置不详，未能标出。《汴京遗迹志》，卷九第131~132页载，城西有冈六：城西三里奉圣寺冈、城西南十里望牛冈、城西三十里狼城冈、城西北二十五里黑冈、城西五里苏家冈、城西三十里狮子冈。疑为城西五里苏家冈，待考。

⑩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2页。

⑪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3页卷三《辛丑十一月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首寄之》、第1169页卷二十二《初秋寄子由》、第1775页卷三十三《感旧诗》。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栾城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卷七《逍遙堂会宿二首》、第1390页卷二十《再祭亡兄端明文》

⑫、⑬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第348和372页。

⑭颜中其《苏轼轶事汇编》，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5页。

⑮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172页、第56页。

⑯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8页；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0~208页。

（下转第58页）

苏轼曾任常州团练副使考

谢 忖

内容提要：苏轼有没有担任过常州团练副使呢？此乃苏轼与常州情缘的悬案。作者对史料进行的梳理、归类、抉择，得出的结论是：此远非孤证，虽有歧见，也应予以肯定。

关键词：苏轼 常州 团练副使

在苏轼前后 40 年的宦海沉浮中，相对安定的生活只有 27 年左右；前后谪居流落竟有 13 年左右，占了他整个仕途生活的三分之一。他一生迁徙 18 个州县，其中 9 个是实任，6 个是虚任的流放地，3 个未至其地即改任他州。颠沛困顿，于此可见。

苏轼与常州的关系，早在他初下江南、赴杭州通判任的 1071 年就开始了。在他以后的 30 年中，与常州结下了深厚的情缘。然而，有一个有关的历史情节迄今还是悬案，就是：苏轼有没有担任过常州团练副使？

1084 年，神宗下手诏调苏轼仍以检校水部员外郎徙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还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流露出神宗爱才心切，其心情是十分宽容的。汝州离京师开封只有三百来里，比起黄州到开封远隔千里要近得多，是最贴近京师的流放地，便于朝廷随时起用。本州安置也是便于苏轼就近支取俸钱。

苏轼两次上表请求神宗准其居常，神宗对其居住常州之请，“朝奏入，夕报可”。至于这“团练副使”的官衔是挂在汝州还是挂在常州，的确有点讲究。从史料上看，明言苏轼仍授汝州团练副使的，只出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的极个别的资料中。

神宗真要照顾苏轼，绝不会维持汝州的任命。这在《资治通鉴后编》及《续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得到了肯定：“帝从其请，改常州团练副使。”其他史书也都作了“朝奏入，夕报可”，“从其请”的正面叙述。

在神宗同意苏轼居常之后，汝州对苏轼来说已是毫不相干，此后苏轼也从未去汝州（报到、取俸

等活动）。说明其供给关系已经转移到了常州，这只是苏轼改任常州团练副使之后才有可能。

《宋史·苏轼传》记载：哲宗元祐二年（1087），轼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常锁宿禁中，如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元丰八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侍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神宗）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可见神宗对奇才苏轼十分怜惜，只因他早逝，才未及进用。辅政的宣仁后秉承神宗遗意，召用了苏轼，并让他担任少年哲宗的老师。宣仁死后，哲宗为嫉恨苏轼的权臣们所包围，听信他们的诬告，才使苏轼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之中。

作为正史的《宋史·苏轼传》，在记载苏轼第一次居常时没有写明他改任常州的情况，直到叙述轼在两年后答宣仁语中才明确地宣告：“臣为常州团练副使。”这是《宋史》的正式补充，并得到《宋史纪事本末》、《通鉴续编》以及《纲鉴汇纂》等重要史书的首肯。

据此，苏轼任职常州之事不难作出定论了。可是，还有人认为《宋史》所提“常州团练副使”中的“常州”是“黄州”的误刻，而其他史书或史料又有“因之”的可能。清代《御批历代通鉴辑录》就记载苏轼的答语是“臣为黄州团练副使”。还有，本来明载苏轼在居常时“改常州团练副使”的《资治通鉴后编》及《续资治通鉴》，却在后来苏轼的答语中写作“臣为汝州团练副使”。这是否可以看作这两部史书用后面的说法（汝州）来否定前面的说法（常州），进行“更正”的表示呢？

“误刻”的说法，如无一定的准则、检测和进一步的论据，很难界定其是否可信。每种说法都有“误刻”的可能，为什么不可以提出“黄州”、“汝州”可能是误刻的呢？

（下转第 60 页）

再说苏东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吗

赖正和

内容提要：本文列举苏东坡所写有关“乞居常”的文字，并略作分析，说明苏东坡没有当过“常州团练副使”。

关键词：苏东坡 常州 团练副使

我在《乱弹三章》(载《苏轼研究》2010年第1期)中说，苏东坡没有当过“常州团练副使”。但有学者举出某些史书(大多是清代所编纂)上的记载，说明苏东坡硬是当过“常州团练副使”。故有必要再说说这个问题。

史书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应当予以重视。但在研究苏东坡当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这个问题时，苏东坡的原著则更值得重视，也最可靠最可信。所以，本文主要用苏东坡原著中的话来说明苏东坡没有当过“常州团练副使”。

元丰七年(1084)三月，苏东坡接到量移汝州的命令，上了《谢量移汝州表》。他在谢表中说：“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诰命，特授臣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者。”^①“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是宋神宗把他量移汝州时给予的职务。

九月，苏东坡在宜兴买得庄田。他写信告诉王定国：“近在常州宜兴，买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余硕，似可足食。”^②又写信告诉秦观：“某宜兴已得少田，至扬附递，乞居常。”^③可见苏东坡此时已打算在常州居住。

十月十九日，苏东坡在扬州上表“乞居常”，但未能投进。他写信给王定国说：“某往扬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得耗：奏邸拘微文，不肯投进。”^④

十二月一日，苏东坡抵泗州。在泗州另撰《乞常州居住表》，遣人至鼓院投之。《表》说：“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餧食，欲望圣慈，许于常

州居住。”^⑤他在《泗岸喜题》中写道“今日离泗北行。……然吾方上书求居常州”。^⑥

苏辙说苏东坡这件上表“书朝入，夕报可”。^⑦苏东坡于元丰八年(1085)正月十九日写信告诉徐州开元寺僧法明说“仆已得请居常州”。^⑧在《和王晋卿并引》写道：“上书得自便，归老湖山曲。”^⑨在《满庭芳》词的序中写道：“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羡。”^⑩

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苏东坡到达常州，上谢表说“先蒙恩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寻上表乞于常州居住，奉圣旨，依所乞”。^⑪

在苏东坡抵达常州前十六天，即五六日，朝廷就下诏任命他知登州：“诏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⑫

十月十五日，苏东坡抵登州任，上谢表。他在谢表中重提“乞居常”事：“击鼓登闻，止求自便，买田阳羡，誓毕此生。”^⑬

仔细研读上述文字，可以明白以下几点：

一、苏东坡无一字说他当过“常州团练副使”。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二、苏东坡写了“乞居常”“乞常州住”“乞常州居住”“求居常州”“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等一串话，意思十分明确，就是请求皇帝允许他居住常州。关键词是“居住”。

三、苏辙写的“书朝入，夕报可”，表明皇帝接到苏东坡《乞常州居住表》的当天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他的请求既然是“乞常州居住”，批准的当然也就只限于“常州居住”这一点，并未改任他为“常州团练副使”。不信？请看苏东坡自己如何说——“仆已得请居常州”，说的是获准“居常州”；如果真像有些学者说的是改任“常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就该说“仆已得常州团练副使”。可他没有这么说。“寻上表乞于常州居住，奉圣旨，依所乞”，

说得更明确：皇帝仅是“依所乞”。所乞的是什么？是“于常州居住”。如果皇帝这时真的让他改任“常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就应当写作“奉圣旨，授常州团练副使”。可他没有这样写。

有学者认为，既然在常州居住，其供给关系也就转至常州，这只能在改任“常州团练副使”之后才有可能。这种由“推测”加“想象”而得出的结论恐怕站不住脚啊！宋代贬官的居住地有三种情况：一是“本州安置”，如授苏东坡为“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二是限定在本州之外的某地居住，如元符三年（1100）四月二十一日，宋徽宗以生皇子恩，诏授苏东坡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三是任便居住，如元符三年十一月初一，诏授苏东坡为“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由此可见，任“汝州团练副使”的苏东坡在常州居住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四、宋神宗死后，朝廷起用苏东坡知登州所下诏书仍然称他为“汝州团练副使”，表明他在被起用前的职务就是“汝州团练副使”。如果已授他为“常州团练副使”，诏书就写错了。这可能吗？

最后，我引用孔凡礼先生的话作这篇短文的结尾。孔凡礼先生写到苏东坡“蒙恩放归阳羡”后的官职全称时，写道：“至是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⑭ 这无疑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2010年7月，于三苏故里

论文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⑪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6、1522、1537、1522、657、2261、1894、658、660页。

⑨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7页《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⑫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23页。

⑬曾枣庄主编《苏东坡词全编汇评本》，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六。

⑮孔凡礼编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68页。

（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上接第55页）

⑯、⑰余冠英等《唐宋八大家全集·苏洵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182页、第3165页。

⑱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9页；余冠英等《唐宋八大家全集·苏洵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171页曾巩《苏明允哀辞》；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页欧阳修《苏主簿挽词》。

⑲、⑳刘春迎《考古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第152页《皇城遗址的发现与考古研究》。

㉑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

㉒、㉓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第151页《北宋东京城的三重城垣》。

㉔《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391页《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的特点》。

㉕王明清《挥麈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8页卷一《后录余话》。

㉖、㉗、㉘《黄庭坚全集》，第1295页外集卷一八《雨过至城西苏家》、第646页正集卷二五《题东坡所作马券》、第98页正集卷四《次韵子瞻送李廌》。

㉙王昶辑《金石萃编》，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2页卷一三九《赠李方叔赐马券》，券文后录苏辙《方叔来别子瞻馆于东斋将行子瞻以赐马赠之方叔作诗次韵奉和》，此诗见《苏辙集》第310页卷一六，诗题略有不同。

㉚、㉛、㉜、㉝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68页卷三〇《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第1775页、第1991页陈曦《东府记》、第1775~1776页、第1991~1992页。

㉞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1页。

㉟孔凡礼点校《墨庄漫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5页。

㉟伊文文笺注《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页。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郏县苏轼学会执行会长）

苏辙《冻合帖》考

吴 健

内容提要：作者发现了上海有正书局民国十一年版《苏黄米蔡合册》有苏辙墨迹《冻合帖》，不見于流行的“苏辙文集”諸版本，并且从书简的内容考证了它写作的时间、地点，指出其具有的文献、书法价值。

关键词：苏辙 冻合帖 考证

《苏黄米蔡合册》(下称《合册》)①，汇集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五人的法帖若干。其中一篇苏辙的书简，不見于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本《栾城集》及所附《栾城集拾遗》，也不見于陈宏天、高秀芳点校本《苏辙集》及所附刘尚荣《苏辙佚著辑考》，也不見于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三苏全书》，是苏辙的佚文。现略作考证如下。

《合册》所收此简为墨迹本②，未命名，未编年。钤印甚多，可辨识者有明代收藏大家项子京的“项墨林父秘籍之印”、“项元汴氏审定真迹”、“欩李项氏士家宝玩”等印，清代文学家蒋仕诠的“清容斋”印，清代书法家爱新觉罗·永瑆(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的“皇十一子永瑆鉴赏古书画真迹珍藏之印”等印章，流传有序。经查容庚《从帖目》，永瑆将此帖刻石收入《诒晋斋法帖》，命名为《冻合帖》③。此帖全文为：

辙再启。所烦差人并已到。至荷！至荷！
适亲至冻合处视之，人虽多，然不甚齐一。又乏锤棒等，恐须烦地分官员一到乃办。不尔，复经一夜，益加坚厚，为力愈多矣。千万恕簶。不罪！不罪！辙顿首。

示喻且还舟。邑下极荷厚意，但恐打冰入
兵解弛，猝未得通耳者。照悉！照悉！乏人，
不及重封。不讶！不讶！

帖中“冻合”、“还舟”、“打冰”等语，可
证时值寒冬，且苏辙为舟行。对照苏辙生平形迹，
此帖系年有两种可能，一是元丰八年(1085)岁末

于返京途中；一是元祐四年(1089)使辽往返途中
(次年一月返回京师)。

苏辙使辽赋诗凡二十八首④，没有舟行的记
载。就行程而言，也无适宜舟行的河流，途中经过
的河流大略有拒马河、易水、桑干河、琉璃河，均
为东西向，当横渡。就气候而言，黄河以北的河流
冬季结冰后也难于破冰而行，苏辙在回程有《伤足》
一诗，言及遇到河流冻结，是马夫牵马直接行于冰
面。细味此帖，收简者也不似辽国的地方官员。

因此后一种系年可以排除，而元丰八年的形迹
则完全与此帖契合。苏辙于本年六月在绩溪令任上
被召入朝，随即绕道杭州，沿京杭运河行经苏州、
扬州、高邮，后由泗州转入汴河，于次年元月抵达
开封⑤。此帖当作于汴河舟次，《苏辙集》收录了
七首诗⑥，详细描绘了他因汴河结冰而舟行受阻的情
形。在《河冰》诗中，言及“旋涉冻浅地”、“千
楫竞纷委”；在《复赋河冰四绝》诗中，言及“朝
来县令借长船，仍遣千夫上下牵”；在《河冰复结
复次前韵》诗中，言及“引纤低徊疑上坂，打凌辛苦甚攻城”，均可进一步印证此帖的写作背景及系年。

另，《河冰》有“穷冬治舟行”句；《河冰稍解
喜呈王适》有“春风未到冰先解”句，均点明季候，
可证此简作于元丰八年十二月而非次年元月。

汴河是北宋时期非常重要的漕运通道，如以京城
开封起算，大致流经陈留、雍邱(今杞县)、南都
(今商丘)、夏邑、永城、安徽灵璧、夏邱(泗县)，于江苏盱眙北入淮河，与京杭运河接通⑦。
据《宋史》载：“元丰间，四月导洛通汴，六月放
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有冻，即督沿河官吏，伐
冰通流”⑧。可见汴河在冬季结冰阻航是常态，而
沿河地方官则负有及时组织破冰的职责。

据《苏辙集》的编次，苏辙应阻于泗州(今盱
眙)和南都(今商丘)之间⑨。由此可以推测，收

简者为此段汴河沿岸某县县令，即《复赋河冰四绝》中提及的派遣船只和打冰人的县令。

苏辙的文集由其亲自编定，但遗憾的是基本未收录私人性质的书简，流传至今的书简不足五十封，不比苏轼有八百多封书简传世。由于《冻合帖》是墨迹本影印，此帖在文献和书法艺术上均有较高价值。

论文注释：

①《苏黄米蔡合册》，上海有正书局民国十一年版。

②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荣宝斋1991年版。卷三四附录了苏辙的传世书作，亦未收此简。

③容庚《丛帖目》卷七，华正书局1984年版，第565~567页。

④、⑥、⑨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著《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7~323页卷十六、第275~276页卷十四、第274~275页。

⑤孔凡礼著《苏辙年谱》，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1~304页。

⑦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342页卷一八〇《隋本纪》。

⑧（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33页卷九十四《志第四十七河渠四》。

（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接第56页）

至于在同一本书记载同一事件前后有不同的叙述是否就是自我否定和更正，也须作具体分析。只有对“误刻”和“自我更正”作进一步的论证和澄清，才能为解决苏轼任职常州的悬案扫清障碍。我们不妨以探讨“元祐二年”的“前年”即元丰八年（1085）时的苏轼究竟在何地任何职作为论证的切入点。

据《续资治通鉴》载：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庚辰，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丰七年春正月“辛酉，诏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汝州”。说明苏轼黄州之任，始于元丰二年十二月，终于元丰七年春正月。可见元丰八年时的苏轼，早已离开黄州多时，因此苏轼答语中的所谓“臣为黄州团练副使”一说应予排除，“黄州”误刻“常州”之虑自也失去依据。

据载，元丰八年二月，苏轼在商丘接到准许常州居住的调令。六月，诏苏轼赴朝奉郎知登州。如

果认定苏轼没有改任常州，则在本年六月以前的苏轼应为没有报到赴任的汝州团练副使。如果认定苏轼改任常州，则自本年二月到六月期间的苏轼应为常州团练副使，二月以前为未报到赴任的汝州团练副使。据此，苏轼在答语中自言“臣为汝州团练副使”或“臣为常州团练副使”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此，同一本史书前面说“常州”，后面说“汝州”并不悖谬，更不是“更正”。二者皆能成立，因为其间存在着时间差。

据本人借以参考的15种史书、史料的不完全统计，在由黄徙汝的事件中，除个别未涉及此事外，几乎都记载神宗“从其（移居常州）之请”，或“书朝入，夕报可”。只有一种资料明言苏轼仍任汝州团练副使。而在苏轼答语的事件中，只有一种史料明言元丰八年时“臣为黄州团练副使”，那是不能成立的；有两种持“汝州”说，有四种持“常州”说，都是可以成立的。在这15种史书、史料中，明确记载苏轼曾任常州团练副使的有以下6种：《宋史》、《宋史纪事本末》、《通鉴续编》、《资治通鉴后编》、《纲鉴汇纂》及《续资治通鉴》。

前北京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林语堂博士写的《苏东坡传》，自谓“书中的对话都有出处可查，而且尽可能引用原句，只是不太容易看出来。”他对苏轼这段事是这样写的：

苏轼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要职后的某一天，“太后叫苏东坡起草吕大防拜相的命令，说完突然问道，‘你前年任什么官？’‘常州团练副使。’”

可见，与常州没有什么瓜葛的林语堂，也是首肯东坡曾任常州团练副使一说的。

千年悬案，终须一解。苏轼曾任常州团练副使之事实远非孤证，虽有歧见，也应根据正史文献及权威著作，予以肯定。史家们的椽笔再也不要受陈说的暧昧态度的约束，不要再把本来不成问题的史实当作难解的悬案。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有根据地澄清这个近千年的悬案，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告：苏轼曾任常州团练副使。

参考书目：《宋史》、《宋史纪事本末》、《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东坡先生年谱》、《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续编》、《宋史全文》、《续通鉴》、《资治通鉴后编》、《纲鉴汇纂》、《续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苏诗补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宋诗纪事》

（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学术委员）

海南万里真吾乡

熊朝东

减字木兰花·立春

苏轼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首词作于苏轼贬谪儋州（今海南岛）的第三个年头，即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立春之日。这是一曲赞美海南春光的恋歌，是诗人博大情怀的袒露——苏轼不只囿于家乡的热爱，故土的眷恋，中原大地的思念、向往，而对被视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亦同样充满爱恋之情。苏轼一生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或是宦游，或是贬逐，他对所到之处都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来热爱，来赞美，来歌颂。这是苏轼热爱祖国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高尚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只有具备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境界的人，才能身处天涯而无天涯之感；才能身处异乡而无飘零流落的悲戚；才与其他迁客逐臣有着不同的情怀，对异地风物不是排斥、敌视，而是由衷地认同、热爱；才能从内心倾泻出“他年谁作輿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真挚情感；才能以其欢快跳跃的笔触，将祖国边陲的春光写得绚丽多姿，生机盎然；才使得这首《减字木兰花》成为我国词史中对海南之春的第一首热情赞歌。

此外，这首《减字木兰花》还表现了苏轼一生“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书》），随遇而安的旷达胸怀，对我国旧时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曾季狸《艇斋诗话》说：苏轼贬谪惠州时因作《纵笔》诗：“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至京师，政敌章惇笑道，苏子瞻还这般快活吗？于是就把苏轼再贬儋州。这是绍圣四年（1097）四月发生

的事。当然，这决不仅仅是因为章惇不满苏轼的“春睡美”，偏要弄得他睡不着；而是出于更大的政治目的和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苏轼再贬儋州时，已经六十二岁。这对一位暮年老人来说，不论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打击和重压。当时的海南岛确实是一块蛮瘴僻远、荒凉落后的土地，那里“海氛瘴雾，吞吐呼吸。蝮蛇魑魅，出怒入娱”（《桄榔庵铭》）。生活更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几乎什么都没有。这对于过去过着“十年京国厌肥羶”生活对苏轼来说，现在是“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闻子由瘦》）的穷日子，其情景可想而知了。他在《与元老侄孙书》中说：“近年来多病瘦瘠，不复如往日，……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至，药物鮓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俩苦行僧尔。”他已曾伤感道：“何时得出此岛耶？”但他毕竟是一个随遇而安、善自宽解的人。“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在儋耳书》）他坚信一切逆境终将过去。他的组诗《谪居三适》就集中表现了那种“超然自得”的生活情趣。“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旦起理发》）。“蒲团蟠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午窗坐睡》）。“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土无重臙药，独以薪水瘳”（《夜卧灌脚》）。这些都是在官场中享受不到，也体会不到的乐趣，所以他问：“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因此，苏轼才在《减字木兰花》中由衷地发出“不似天涯”的自适之感。这是此词高出他人的可贵地方。如南宋词人朱敦儒的《沙塞子》：“万里飘零南越，山引泪，酒添愁。不见凤楼龙阙又惊秋。九日江亭闲望，蛮树绕，瘴云浮。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这是写南越（今岭南两广等地）的重阳节。但所

见者为“蛮树”、“瘴云”，由景引情者为“山引泪，酒添愁”，突出的是“不见凤楼龙阙”的流落异乡之愁。虽然这首词是朱敦儒南渡后，因北方沦陷于金而思乡怀国之作，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可取之处。但与苏轼这首《减字木兰花》相比，又迥异其趣。二词相较，对异地风物有排斥和认同的差别，不仅仅见出苏轼的独特个性，更见出苏轼博大的情怀和二者思想境界的高下之分。

细观这首《减字木兰花》，不仅景物描写朴实自然，而且感情触发亦朴实自然。全词无矫揉造作、吟风弄月之态。

这首词手法有其独特，上下阙句式完全相同，词意相连，层层深化。上下起句“春牛春杖”与“春幡春胜”，都从立春的习俗发端，达到强调立春的重要和迎春的欢快隆重的视觉效果。“春牛”，象征农事的土牛。“春杖”，指耕夫手持犁杖侍立。旧时风俗，立春前一日有迎春的仪式，由人扮“勾芒神”，鞭土牛，由地方管行香主礼，叫做“打春”。卢肇《谪连州书春牛榜子》诗云：“不得职田饥欲死，儿依何事打春牛。”“春幡”，即“青幡”，指旗帜。

“春胜”，一种剪纸，剪成图案或文字，又称剪胜，彩胜，也是表示迎春之意。《后汉书·礼仪志上》云：“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古时对于立春日是相当重视和隆重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记载：“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人禁中鞭春。”可见这种习俗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也很盛行。

上下阙首句交代立春的习俗后，紧接着又用同样的两个对句：“无限春风来海上”与“一阵春风吹酒醒”，都着重写“春风”。上阙的“春风”，写出风从海上来，不仅将地处海岛的特点画出，而且意境壮阔，令人胸襟为之一舒，大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情画意，使人犹如置身于那“春情不可状，艳艳令人醉”(李群玉《感春》)的春暖秀色中。诗人曾作《儋耳》诗：“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便与此相合，充分表露出诗人对海南的热爱之情。下阙的“春风”，则强化了全词欢快的基调。它点明在迎春仪式的宴席上“欢言酌春酒”，春酒且醉人的浓郁情趣和勃发兴致。

“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与“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皆以景入词，由景生情，点透全词主旨所在。“便与春工”，乃将春神人格化，大意是说被视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因得

力于春神之力，才将桃花染得如同血肉之艳色一般。热情赞颂造物主孳乳人间万物的亲切之情；极尽描绘出边陲绚丽的春光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景色。而“卷起杨花似雪花”，乃点睛之笔。海南地暖，其时已见杨花。诗人次年人日有诗云：“新巢语燕还窥砚”，方回《瀛奎律髓》评曰：“海南人日（旧称夏历正月初七日为“人日”。杜甫有《人日》诗：“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燕已来巢，亦异事。”盖在中原，燕到春分前后始至，与杨柳飞花约略同时。以此知海南物候之异，杨花、新燕并早春可见。诗人用海南所无的雪花来比拟海南早见的杨花，于是才自然而然地发出“不似天涯”是“故乡”的亲切愉悦欢快轻松之情，方现见出苏轼不为逆境所难，随遇而安的旷达胸怀和青山处处是吾乡的高尚情操。

这首词采用“类字”的修辞写作手法，大量使用同字，把同一个字重复地间隔使用。本来，遣词造句一般要避免重复。《文心雕龙·练字第三十九》提出的四项练字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权重出”，以“同字相犯”为戒。但并非教条，这种“类字”手法用得恰当自然，则能获得强调词意，加深意境，渲染气氛的艺术效果。反之，便有堆砌之忌，矫揉造作之嫌。如五代欧阳炯的《清平乐》：“春来阶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红杏蒂，春燕舞随风势。春幡细缕春缯，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缭乱，非干春梦无凭。”就给人以平板堆砌之感，读起来就别扭，不大自然。苏轼这首《减字木兰花》却不然，从词的本身蕴意来看，乃为海南春色所感发，为眼前春日之情景所引动，一气贯注地写下来，因而自然真切，朴实感人，无丝毫玩弄技巧之嫌。再从词的本身结构来看，全词八句，共用七个“春”字(其中两个是“春风”)，但不平均配置，有的一句两个，有的一句一个，有三句不用，显得落笔自然，错落有致；而不用“春”字之句，如“染得桃红似肉红”，“卷起杨花似雪花”，却分别用了两个“红”字，两个“花”字。所以，全词谨严而不死板，活泼而不拘泥，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佳作。

苏词之妙，妙在既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而有所发扬；更重在自身的不落窠臼而有所创造、开拓。所以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光辉璀璨的里程碑的地位！

(《今日东坡》前总编、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一个杰出而伟大的灵魂

——读苏有恒著长篇历史小说《苏轼》

苏兴良

苏轼是我国古代的文学巨匠和济世爱民的杰出政治家。有关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和他的政治生涯、高尚品格，古今中外学者的有关评论可谓多矣！但以历史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苏轼不凡的一生，还不多见。最近由苏有恒先生创作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苏轼》，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长篇历史小说《苏轼》，于2010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六十四章，分上下两册，约43万字。作者对苏轼一直怀有仰慕之情，退休后便开始搜集、整理、学习有关资料，并于2007年苏轼诞辰970年之际，着手开始写作，经过三个寒暑，终成皇巨著，被纳入“中国作家文库”。

我收到有恒先生寄来的赠书，怀着兴奋的心情，捧读后立刻被书中精彩的描写和动人的情节所吸引，更为苏轼缤纷耀彩的跌宕人生所感动。

忠于历史事实，没有戏说，也不用演义，而是以认真负责的史学态度和生动形象的文学笔致，忠实地记述了苏轼一生“为官”、“为文”、“为人”方面的从政经历、文学功绩和道德精神，这是本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全书着力描写的内容。早在少年时期，苏轼就在母亲的教导下，以东汉时为官清正的范滂为楷模，树立“为国献身”的政治理想。22岁时，他在京城应试的策论《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试卷中，阐述了孔子的“仁政”、“德治”的治国思想，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视之为“才大志高”的难得人才。苏轼与弟弟苏辙连闯礼部考试的初试、复试和殿试三关，名列前茅，双双中了进士。小说的开头四章，即以简练精彩的笔触，生动描绘了苏轼少年有为、胸怀大志，踏上仕途的经过。

苏轼一生处于北宋王朝的晚期，由于皇位多次

更迭，边患内祸频仍，社会矛盾重重，他一方面因才华出众，颇受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高氏的赏识，官职连升四级，至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另方面又因熙宁变法、朋党纷争，使他身陷乌台冤案、元祐党祸，难于立足朝廷，多次外放，最后竟至连贬三级，流放到蛮荒之地儋州。苏轼的这种乖蹇仕途、人生经历，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作者也能紧紧抓住这些历史事件，以饱含情感的笔墨，营造出跌宕起伏的情节，形象地展示了苏轼的人生足迹。这在小说的第23、24和第37、52等章节中，都作了充分的描绘，从仕途坎坷的角度塑造了苏轼生性耿直，勇于坚持政见，一心为国济民的刚正不阿的杰出政治家形象。

在苏轼的政治生涯中，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所引发的朋党之争，对苏轼的仕途影响最大。苏轼也卷入了这场纠纷。他不是完全反对新法，而是对新法的改革方法和途径有不同意见，认为新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便屡上奏章，因而受到弹劾，于是主动要求“补外”，后又遭到御史加害，身陷“乌台诗案”、元祐党祸。小说紧紧围绕熙宁变法事件所引发的政局变化，层层深入地揭示苏轼最后被贬黄州后的心灵跳荡，尤其写出他经历这场牢狱之灾，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反思。他拓荒东坡，与山野村夫往还，怀古作赋，神交陶潜，放歌赤壁，虽然身处逆境，却胸怀坦荡，安然处之，同时也“未忘为国家虑也”，使其政治家品格和人生境界得到了升华。

苏轼在朝为官时光明磊落，从不阿谀奉承，而外放地方官则更是关注民生，政绩卓著。小说很具体地描述了主人公在凤翔任判官时为民抗旱求雨，在杭州通判时访察民情、灭蝗减赋，出知密州时与民同乐，改知徐州时奋战洪峰、拯救了全城百姓；后来出知杭

州，疏浚漕河，治理西湖；在知颍州、扬州、定州时也都是勤政为民。总之，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即便是远谪岭南、流放海南，自身生计艰难时，也能热心公益、为民解难。全书通过这一系列动人的情节和绘声绘色的描写，彰显了一位“济世救民”的杰出政治家的本色。

苏轼还是才华横溢的伟大文学艺术家。他是位全才，可谓独步天下，诗文词赋无所不精，书法绘画也造诣非凡，怎样写好苏轼“为文”的卓越成就，乃小说写作的成败关键。作者深知此中利害，故将苏轼的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贯穿始终，共引用了诗词赋等作品两百余首（篇），将其镶嵌在各个章节中，并借助与友人间的相互唱和、赏析，进行艺术概括，既交代了作品写作的写作时代背景、时间、地点、情境，又借助他人的品评道出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审美情趣。这就避免那种平铺直叙的单调写法，做到形象生动、真实可信，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极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给予读者醇美的艺术享受。

苏轼才思敏捷，诗艺高超，出口成章。例如，书中第十三章描写苏轼陪同词坛名宿张光同游西湖，谈起当年白居易、元稹吟诗的佳话和苏小小的趣事，又为彩船美女当场填词的雅事；后又带领家人游西湖，即兴写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诗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句，比喻贴切新颖，情景辉映，成为世人传诵的名句；又如，第三十章描写苏轼和友人泛舟赤壁，接连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等名篇，奇逸飘渺，雄浑清旷，开一代词风，成为千古绝唱。作者通过赤壁地形水势、抚今怀古、壮志难酬等一系列情节，烘托出主人公虽遭贬谪，仍“雄心犹在，壮心不已”的高尚品格；尤其是他与友人畅游江中，把酒临风，挑灯作赋的情景，描写得尤为细致感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吟诵，将主人公的文学才华和豪放洒脱的情怀，发挥到淋漓尽致。写苏轼远贬岭南时，生活虽然艰苦，却仍然热心公益，建桥筑堤，开办学堂，吟诗作赋，笑对人生。还有第二十七章苏轼为拯救女婴而写对联筹款一节也描写得十分精彩。怎样引用文艺作品将历史人物的个性、气魄刻画出来，《苏轼》一书作了有益的尝试。小说不仅是简单的引用苏轼的作品，而是让人物相互唱和、赏析，情景交融地加以表现，对苏轼的文学伟业作出全面的评价。

作者选择以章回小说的文体，沿着主人公的生

平足迹，逐次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是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很注重内心情感的揭示，即对苏轼“为人”方面的描绘。苏轼的人生命运充满着悲剧，然而他又性情乐观旷达，有着博爱的胸怀。正当他和弟弟在京师双双高中进士时，慈母程氏却在家中逝世，他便归乡守孝。走上仕途后，由于种种变故，他的发妻王弗、继室王闰之和侍妾朝云相继去世，他悲痛至极，均撰写墓志铭悼念；他与弟弟苏辙感情甚笃，《水调歌头》一词写得出神入化，充分抒发了对弟弟的思念之情，临终还托付弟弟写墓志铭；他为人正直，喜欢交友，对友人更是肝胆相照，即使是对曾经迫害过他的人也不记恨，心胸似大海般宽阔。他更亲近普通的黎民百姓，和尚道士，山野村夫，黎民儿童，卖歌少女等，他都引以为友，为其排忧解难。小说通过主人公这种重亲情、友情、乡情的细致描写，烘托出一个伟大的灵魂，使艺术形象更为丰满、感人，放射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其次，在语言运用方面，作者也是苦心经营，为了达到历史的真实，符合宋代社会的生活实际，叙述语言往往运用简洁的白话，人物的对话则用富有个性的浅近文言，拿捏得十分妥切。

信息丰富，知识性强，也是小说的可贵之处。作者在书中不仅详细记述了北宋政治体制、官员称谓、科举程序、州县设置、社会习俗等，还有山川地貌、名胜古迹、水利农事、寺庙道观、乃至文化名人、农夫野叟、僧人道士等的记述。把这种大量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渗透在描写、叙述、评论之中，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还有，书中对苏轼诗词文赋的大量引用、解读、品评，借以抒发自己的感悟，都说明作者具有很高的文史知识素养和文艺审美能力，值得称道。

读罢全书，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含英咀华，深为书中塑造的苏轼的高大形象所震撼。正如小说最后一章《尾声》中所抒写的那样：“他静静地走了，终于走完了他那辉煌而经历磨难的一生。留给人们一大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财富。一个杰出而伟大的灵魂，就这样告别了人世，他的灵魂仿佛从躯体中升腾，飞向天空，在天空中俯视人间，俯视着他深深挚爱和无限眷恋的祖国田野、山川……。”

2011年2月8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熊朝东的三苏情怀

宋明刚

我认识朝东大约有20多年了。我们的兴趣爱好相似。对文学、对苏轼都有一种真情，对苏学的研究都有爱好与执著。

熊朝东先后出版了有关苏轼、苏辙的专著7部：《苏东坡》（1989）、《苏轼词选析》（1991）、《明月几时有——苏轼诗词文精品选析》（2001）、《芳草天涯路——影响苏轼一生的六位女性》（2003）、《苏东坡养生谈》（2005）、《眉山苏辙》（2009）、《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2009）以及具有一定分量的论文。

熊朝东是眉山人，是东坡的老乡。他当过航空兵，曾供职于宣传部，在《眉山报》当过老总。荣获眉山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称号。

熊朝东是眉山人，他在《苏东坡》后记中曾写道：“我和苏轼是同乡……小时候就经常去三苏祠，转悠。”这块神秘的宝地曾孕育出三位大家，祠中殿堂里的三苏雕像，朝东常常站在他们面前久久仰望，他们是那么的高大和神圣。这是眉山人的骄傲。读书后学校组织学生到三苏祠参观，近水楼台，朝东常常品其陈列馆内的名句佳篇，“仿佛缩短了九百年的时间差，成为与他日夕往来，和睦相处的乡邻，倾心相谈的师友。”他受到三苏遗迹、灵气的双重熏染，渐渐地加深了对三苏的认识与理解，他开始撰写有关三苏的文章，进而学习研究苏轼的诗词文赋，对苏轼他有了一份对故乡先贤的敬仰与崇拜之情。正是由于热爱、崇敬苏东坡的炽热感情，驱使他多年来不断地去认识、探究苏轼。他是带着“一个苏轼故乡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读苏轼作品，查阅有关历史文献、研究苏轼的论著和有关传说，熊朝东的愿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苏轼。熊朝东进入研究苏轼的诗词文赋、情感、养生以及典籍和民间传说故事等多个领域，苦苦求索。

早在1978年熊朝东就在四川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千古文章三苏祠》一文，这也许是“十年文革”后，在全国媒体上正面宣扬三苏文化最早的一篇文章。继后又出版了第一本书《苏东坡》。这是一本严肃而又有趣的书，写的就是苏东坡曲折坎坷而又成就辉煌的一生的故事。该书以传记文学的形式，以苏轼的诗文为线索，以历史记载为依据，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博采正史、野史、民间传说、苏学研究等众家之长。《苏东坡》出版顿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该书在八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再版发行。

朝东在研究三苏的过程中，他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加之他有文学的功底，在后来的著作中，以史为鉴，开创了新的表现方式。例如在研究苏轼成长过程及其一生的经历中，他惊异地发现了在苏轼生命运行中紧密连结而不可分割的六位女性的作用。她们是母亲程夫人、先后两位妻子、侍妾王朝云及两宫太后。是这六位女性构筑了苏轼人生的完美。于是以一种全新而独特的表现形式写出了《芳草天涯路——影响苏轼一生的六位女性》，从史学与文学的视角去探索苏轼生命中的爱情以及六位女性对他人生的影响。这是一部集历史、学术、情感、理性、道德、艺术于一体的独特传记文学作品。作品以苏轼一生的复杂经历为经，以六位女性的高洁人格、清丽品行为纬，交相辉映地展现了北宋中后期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作品既描绘了六位凝结着中国妇女最为伟大而值得称颂的光辉形象，更立体地塑造了苏轼作为旷世无双全能文士的魅力品格。著名苏学专家邱俊鹏先生评价道：“该书深刻入微地描述了与苏轼一生紧密相关的六位女性。作品文笔清新、活泼，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文学欣赏的雅趣。”这部书获得了巴

苏学专家

金文学奖，从系统全面的角度讲，它填补了苏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项空白。

熊朝东是一位脚踏实地的苏学研究者，也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在长期的繁重工作中，他在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不懈地研究与写作，孜孜不倦，苦苦求索，写出了那么多有分量的专著。这是朝东执着勤奋与才华的写照。

后来他奉命办县委机关报，担任总编辑，为了弘扬三苏文化，开辟了“东坡湖”、“三苏研究”等等专栏，传递出东坡故里浓浓的文化气息，使许多人增加了对三苏的认识与了解，受到三苏文化的熏陶。实现了他让更多人了解苏轼的愿望。

朝东对苏轼的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认为苏东坡一生重视养生，研究养生学，追求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在生活实践中丰富和创造了数十种养生方略，总结出十分精确和科学的养生学理论，是我国古代养生文化的传承者和发展者。然而在苏学研究领域中，还未有全面系统和普及性研究专著出版。熊朝东完全以一种透视的眼光来解析苏东坡养生学理论，经过三年时间完成了专著《苏东坡养生谈》。

该书将苏东坡的养生分为：精神养生篇、炼丹养生篇、运动养生篇、食物养生篇、药物养生篇、环境养生篇等六篇。这是对东坡文化开创性的研究与总结，形成了苏东坡系统的养生文化，也让我们从另一角度去认识了解苏东坡，开阔了对苏轼的研究，认识透视生活质量，延长人之生命的诀窍与奥秘。可以说熊朝东填补了苏轼研究领域中又一空白。无疑，这是熊朝东对苏学研究的一大贡献。一位苏学专家曾这样评价熊朝东：“他具有独特性的思路，思考研究问题具有独创性。”这和朝东对苏轼长期深入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朝东的生活道路多艰辛曲折，常被人“误解”，但他心地宽厚，淡泊名利，为人低调，不善言词，有自己做人的准则。他在《苏轼词选析》后记中曾经说过：“我将不遗余力地为弘扬三苏文化继续努力，不负做一个三苏故乡人。”由此想来，苏东坡真的没有看走眼。我也曾研究过苏东坡被贬的历史，贬黄州、惠州、儋州。有时苏东坡接到贬令起程前往报到，有时还在中途，一道贬往另一个地方的命令又到了。苏轼曾自我评价：“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这种逆境中的平静心态也让朝东获益不浅。他常说，只要想起苏东坡，就没有

什么怨气了。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结晶，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尺。”他说：在无数耀眼的灵玉制造者中，苏东坡最为光辉，他被历史储存的文学艺术作品，与日月同辉，且数量无与伦比。熊朝东是一位容易焕发激情的作家，在1997年时他曾说过，他不准备再写什么了，谁知新区成立后，眉山活跃的文坛让他激动不已，

1999年的春节前夕，我约他去海南岛，他爽快答应了，可临行前他却放弃了，理由是要利用春节假期完成一部书稿。

从研究苏学的角度，朝东是学者，是研究三苏的专家。他的多数专著都是写三苏的，可朝东又是作家，他的散文、报告文学也写得很好。出版有《悠悠乡情》（1991）、《熊朝东散文》（1999）等散文集。他的散文流畅，语言很美，透射出一种文化韵味。有作家评论：“超然物外的熊朝东，超然物外的散文”。我想，他在困境中不知读过多少遍苏轼的名篇《超然台记》，我记得，1998年我曾和他一起到山东诸城市参加全国第十一次苏轼学术研讨会，我们在开研讨会，他却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中途逃会打的士去了“超然台遗址”，据说他少年时代就有此愿望，后来他又写了“超然台感怀”，熊朝东所推崇与欣赏的是苏轼旷达、乐观的人生精神。熊朝东能有此成就，也许就在于他的超然物外。

后来他又出版了《眉山苏辙》，这是一部描写苏辙的传记文学，眉山没有人写过。填补了东坡故里的文化历史空白。熊朝东写完《眉山苏辙》的书稿后，不禁涕泪横流，仰天一声长叹。作者为苏辙的事迹所震撼、所感动、所深思：古今为人者、为学者、为文者、为官者，如苏辙者，有几人何！？遗憾，千年来，苏辙在其兄苏轼的巨大光环笼罩下，默然而未能被世人充分认识、了解和推崇。《眉山苏辙》的问世，能够引发更多当代为人者、为学者、为文者、为官者的思考，作者倍感欣慰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直善良的学者和作家，对人类社会公平正直的渴望与呼唤。

正如位著名苏学专家说过，三苏故里的作家，文化的血脉在他们身上流淌。他们对三苏文化的研究理解中包含着对乡贤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激情。

（四川省眉山市委宣传部调研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永远的苏轼

——千年苏轼接受的历史描述

王友胜

作为世界文化巨人，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丰碑、巍峨的昆仑、浩瀚的长江，具有无穷的魅力。他那渊博的学识、敏捷的诗才、刚正守节的政治风范及幽默风趣的行为方式，令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为之倾倒、崇拜；他那洒脱自如、从容儒雅的人格鼓舞，激励了无数封建文人追求思想解放与个性自由；他那丰富而技艺精湛的作品是历代作家学习、效仿的范式，是无数读者阅读的文本，也是无数学者研究的对象。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是领一代风骚的宋朝超级万人迷。林语堂《苏东坡传序》说：“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熠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

苏轼巨大的文学成就与多样的文化性格使其与历代读者建立了异乎寻常的亲切动人的关系，本文即以时间为序来逐一探讨苏轼的学术与人格魅力。

—

苏轼生前即文名满天下，上至皇帝、宰臣，下到平民百姓，无不对苏轼充满景仰、崇拜之情。从北宋仁宗到南宋孝宗，苏轼一直是宋代皇帝、皇后及妃嫔们心目中的偶像。嘉祐二年三月参加殿试，仁宗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又以《春秋对义》

获得第一名。据说殿试结束后，仁宗回到后宫十分高兴，对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英宗的高皇后也是苏词的忠实读者，苏轼每有新词，她必吟诵再三，并安排宫中乐人演唱。王巩《随手杂录》载：神宗特别喜爱苏轼的诗文，吃饭时总要诵读苏轼作品，常因入迷而“举箸不食”。在北宋上层统治者中，政治家、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轼最为赏识。嘉祐二年苏轼入京应举，参加礼部考试，试题《刑赏忠厚之至论》，所作虽仅六百余字，然见解独到，说理透辟，笔力稳健，文风质朴自然，主考官欧阳修阅后颇为赞赏，原以为只有弟子曾巩才能写出，为避嫌疑，故批第二名；接到苏轼的谢书后，又在当时的编排评定官梅尧臣的书信《与梅圣俞》中感佩之至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又曾预言：“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苏轼在平民百姓中更是拥有大量追星族：《庚溪诗话》载：黄州歌妓李宜因“语讷”，未得到过苏轼赠诗，苏轼将量移临汝，李宜请求在其披肩上写诗，苏轼诗云：“东坡居士文名久（一作“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黄州进士李委则在东坡生日特谱新曲《鹤南下》吹奏，以献苏轼。《宋元学案补遗》卷九十九载：苏轼贬官海南，江阴葛延之于元符间“自乡县不远万里省苏公于儋耳”，拜东坡为师，请教作文之法。《栾城后集》卷二十四《巢谷传》亦载：苏轼贬儋州、苏辙贬循州，“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四川隐士巢谷（字元修）却于元符二年（73岁）徒步从眉山至岭南，见苏辙于循

州，欲去海南见苏轼，未及渡海即病逝。《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亦载：“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其受追捧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影视名星。还有人因为极度崇拜苏轼而走了极端。李廌《师友谈记》载：“章元弼倾娶中表陈氏，甚端丽。元弼貌寝陋，嗜学。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说为朋友言之，且曰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相貌丑陋的章元弼娶漂亮的表妹陈氏为妻，因废寝忘食地阅读苏轼的《眉山集》，以致孤枕难眠的陈氏主动要求离婚，章元弼被妻子所“休”，还以此为荣，逢人即说自己休妻的缘由是因为读苏轼集入迷而致。

苏轼的作品当时不仅在宋朝流传，而且还远播域外，其传播方式有刻印、传抄、刻石、歌唱及其亲笔手迹等多种形式。《东坡集》、《东坡后集》、《眉山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和陶诗》以及《南行集》、《岐梁唱和诗集》、《汝阴唱和集》等合集已经编撰，部分曾经刻印；其传抄本层出不穷，不胫而走，文章一经落笔，人们争相传阅，如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载：苏轼在徐州登燕子楼，作《永遇乐》词，脱稿即“哄传于城中”；书商甚至以刻印苏诗而牟取暴利。据说，成都姚麟以苏轼的墨迹书简为珍，遇人持赠，即以羊肉数斤为报，并刻之於石、拓下拓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苏轼的《眉山集》曾在辽国契丹族流布，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其一载：“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此为《眉山集》流播契丹，为辽人所阅读之确证。辽国文化人多能背苏诗，指出苏诗好用佛典。高丽（935～1392）人金觀元丰三年（1080）曾来汴京，因仰慕二苏，为二子取名金富轼、金富辙。苏轼作品还曾被朝廷当作礼品赠送给高丽王朝。

除作品外，苏轼的饮食、用物也得到人们的喜好、摹仿。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茶的故事家喻户晓，东坡帽的流行亦别有意味。苏轼曾经自制一种高筒短沿、脱戴方便的高帽子，没戴几回就在全城流行起来，人们美其名曰“东坡帽”，京城的儒生、外地的考生，一般后生乃至中年男人竞相仿效，每逢节日更是流行于大街小巷。凡此种种，足以看

出苏轼早在宋代即有着天皇巨星般的社会地位及由此生成的轰动效应。

二

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孙氏宅逝世，举国悲痛。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黄庭坚悬挂苏轼遗像于正厅，每早整肃衣冠，上香拱拜。李廌在悼词中说：“皇天后土，知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杭州人则家藏苏轼的画像，“饮食必视，又作生祠以报。”时人以失去一位千年难得一遇的杰出天才而悲痛不已。

苏轼去世后的北宋二十余年，宋徽宗与蔡京之流实行元祐党禁，崇宁二年（1103）甚至诏毁苏集印版，可越禁传越盛。朱弁《风月堂诗话》云：“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宣和间（1119～1125）有人冒险窃携《东坡集》出城，为逻卒所获，执送有司，见有题诗，“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京尹义其人，因阴纵之。当时苏轼的文章和书法一字千金。朝廷曾以五万文制钱赏购苏轼一篇文稿，太监梁师成以三十万文制钱购颍州桥上苏轼的碑文，另有人以五万文制钱购某学者书斋上苏轼题匾的三个字。金人甚至索取苏轼的字画作战利品。

南宋高宗、孝宗皆为苏轼的超级“粉丝”，故当时文禁大开，高宗增资政殿学士，赐封其孙苏符高官；孝宗追谥文忠，特赠太师，亲为文集作序，又作《赠苏文忠公太师制》云：“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上有所行，下必效之，全社会由此掀起了一股浓厚的宗苏风气。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引时语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序》高度评价苏轼“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

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

南宋时期苏轼研究出现第一次高潮，其具体表现在：第一，注苏之风颇浓，其盛况不亚于注杜、注韩。集注有四注、五注、八注、十注，分类注有托名王十朋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编年注有施元之、顾禧、施宿合编《注东坡先生诗》42卷。文选注有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60卷，词注则有傅干的《注坡词》12卷。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载：“赵右史家有顾禧景蕃《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可见，顾禧也补注过苏词。第二，年谱编撰成风。据各种书目及有关序跋统计，宋人所编苏轼年谱，计有八种（已佚五种），现存的三种是：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二万五千字；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一万五千字，附于各种《东坡七集》本中；傅藻《东坡纪年录》，一万五千字，附于各种类注本中。第三，散见于诗话、笔记、书信以及序跋中的苏诗论评材料比较丰富，涉及的面较广。关于苏轼的政治品节，“苏黄”优劣高下，苏诗的用典、议论、说理，苏轼的政治诗、次韵诗及和陶诗等问题还展开过争议，意见歧出，难以定于一宗。总之，两宋有关苏诗的辑录、编刻与注释，有关苏诗的系年、考辨，有关苏诗主题、艺术的探讨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为后世的苏诗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与南宋对峙的金（北方）亦对苏轼颇为崇拜。金朝立国，约相当于南宋。南北阻隔，宋金“声教不通”，故南宋文化传入金源者少，而北宋文化则传入较多，其中苏诗在金源的流布、影响就非常广泛，元好问《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即谓“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当时有所谓“苏学盛于北”，金代中叶甚至还出现了“苏诗运动”。金人学苏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上模仿苏轼，风气甚浓，其论评苏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大多数言论都是围绕“苏黄”优劣而展开的，

元明宗唐，对苏轼的热情有所减弱，但仍有苏诗的推崇者。元代刘辰翁、方回首开苏诗评点之风，明代公安三袁弘扬苏诗不遗余力，袁宗道诗学白居易、苏轼，其书房取名“白苏斋”，文集取名《白苏斋集》、《白苏斋类稿》，袁宏道《与李龙湖》

谓“近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其《答梅客生开府》亦谓“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

清代苏学再盛，注释、评点及研究成风，成为苏轼历史接受的第二次高潮。我们先以清代注苏诗者为例来看其对苏轼的崇拜程度。清初著名诗人宋荦尝画苏轼像于坐右，自侍其侧，搜讨苏诗编年注本数十年，终于从江南藏书家得其残帙30卷，主持编撰整理《施注苏诗》42卷。查慎行书斋名“初白庵”即取自苏诗“僧卧一庵初白头”，既评点苏诗四百余首，又历时三十年作《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50卷。翁方纲藏苏集宋刻残本及手迹《嵩阳帖》，书斋名“苏斋”、“宝苏室”，亦作《苏诗补注》8卷，遇东坡生日则焚香奠椒，与友朋饮酒赋诗，谓之“祭苏会”，绘己像于宋刻苏诗残帙上。冯应榴荟萃旧注，自出新注而作《苏诗合注》50卷，尝梦见苏轼，遂请人绘《梦苏图》。王文诰七岁时即受父命注苏诗，亲到广东考察苏轼渡海胜迹，所作《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46卷即为中华书局1982年版《苏轼诗集》的底本。清代诗评家同样对苏轼极其尊崇。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苏东坡诗”条开门见山地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今试平心读之，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张道《苏亭诗话》卷一则对苏轼多方面的才华作了全面总结：“余尝言古今文人无全才，惟东坡事事俱造第一流地步。六朝以前无论已，自唐而下，李太白、杜子美以诗名，而文与书法不甚爆。韩昌黎以诗古文名，而书法无称之者。白乐天以诗名，而文与书法俱不传。陆放翁以诗名，而文与书法亦不传。此世目为诗中大家最著者也。即同时欧阳永叔、王介甫，古文为大家，诗亦名家，无书名。曾子固古文为大家，并无诗名。即子由古文为大家，诗亦次乘。东坡则古文齿退之而肩庐陵，踵名父而肘难弟，故有‘韩苏’、‘欧苏’、‘三苏’之称。诗则上接四家，空前绝后。书法独出姿格，不袭晋唐面目，与山谷、元章、君谟，并号大家。至标举余艺，以雄健之笔，蟠屈为词，遂成别派，后惟稼轩克效之，并称‘苏辛’。画墨竹，齐名湖州。乃复研讲经术，作《易传》、《书传》，文人之能事尽矣！若其忠直孝友，要为冠冕千古！”

关于北宋至晚清九百余年苏轼研究的历史进程，王友胜的《苏诗研究史稿》（岳麓书社2000年初版，韩国新星出版社2002年再版，中华书局2010年增订版）、曾枣庄等所著《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皆较全面地进行了历时性的评述与探讨。

四

民国期间，战乱不已，学者连安放书桌的地方都没有，论述苏轼的文章仅数十篇，倒是远在美国的著名作家林语堂用英语撰写了《苏东坡传》。他自序其书赞扬苏轼的多才多艺说：“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中多姿多彩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内地学者虽无苏轼研究专著，但在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对苏轼还是充满敬意。胡云翼《宋诗研究》第八章说：“没有欧阳修，决不能廓清西昆体的残余势力；没有苏轼，决不能造成宋诗的新生命。”，“不能不承认欧阳修以后活动两百多年的宋诗的生命是苏轼创造的了”，“开辟宋诗的新园地，不让它永远依附唐人篱下，这便是苏轼唯一值得讴歌的伟大处所。”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十四章称“苏轼是欧阳、梅、苏后最有天才的诗人。他是一位多方面的作家，诗、词、古文，无不精好，随手拈来，皆成妙谛。而他的诗的情绪与风格，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清新，有的瘦削，有的丰腴，有的险峻”，“他的笔锋是那么样的无施不可，他的才调是那么样的无所不能。”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第二十章说，“与王安石同出欧阳修的门下，独成一家，给予宋诗以新的成就和开拓，而成为当日诗坛的代表的，是才高学富的苏轼。”

新中国以来学者对苏轼的研究经历了三次变化：解放后头三十年，研究重点侧重于政治家的苏轼，八十年代复归于文学家的苏轼，九十年代以来则又拓展于文化史上的苏轼。尤其是文革中，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红旗》1974年第2期）一文给苏轼扣上“投机派”、“两面派”的大帽子，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又加上“顽固派苏轼”的恶谥。江天（文化部写作组）将苏轼的政治诗一概斥为“诬蔑新法”的“黑诗”。有的人说他是“大地主顽固派”，将其视作反对“大法家王安石的历史罪人”。还有两篇文章，一看标题就觉得荒唐，《揭露苏轼尊儒反法的两面派嘴脸》（《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北宋尊儒反法的反动政客》（《湖北文艺》1975年第2期）。诸多苏轼遗址、景园一片荒芜，无人修理，眉山三苏祠飨殿被改为毛泽东诗词馆，塑像甚至被捣毁。苏轼在文革中受到的批判，相关遗迹受到的冷遇，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其人格与学术具有无穷的魅力。

五

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为苏轼历史接受的第三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见诸报刊杂志的文章约三千余篇，各类著作多达百余部。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统计“苏东坡居本世纪宋代词人研究成果排行榜第一名”。本时期苏轼研究与接受表现在如下数端：

1. 学术会议不断召开。全国苏轼研究会先后主办了十六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主办时间与地点依次是：第一次会议1980年9月在苏轼故里四川眉山召开，此堪称新时期苏学研究全面复兴的标志。第二次：湖北黄州（1982年11月），第三次：广东惠州（1984年9月），第四次：河南平顶山（1986年9月），第五次：浙江杭州（1988年9月），第六次：陕西凤翔（1990年9月），第七次：山东烟台（1992年9月），第八次：海南儋州（1995年7月），第九次：四川眉山（1997年9月），第十次：山东诸城（1998年8月），第十一次：江苏徐州（1999年10月），第十二次：河北栾城（2000年8月），第十三次：四川眉山（2001年8月，纪念逝世900

周年），第十四次：河南郏县（2002年8月，纪念藏郏900周年），第十五次：江苏江阴（华西村、2004年8月），第十六次：江苏徐州（2009年9月）。另外，全国各地还举办过一些苏轼纪念会，如眉山1987年9月召开的纪念东坡诞生95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召开的纪念苏东坡诞辰970周年暨“苏东坡的民本思想”研讨会，还多次举办东坡国际文化节，在苏轼生日举办寿苏会，在清明节举办公祭活动；海南1987年12月召开的纪念苏轼贬儋890周年学术讨论会；黄冈2001年9月举办的首届中国黄冈东坡赤壁文化旅游节，同时召开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暨东坡文化学术研讨会，又于2010年3月举办“苏东坡来黄州930周年纪念大会”；广州从化2010年1月举办的“苏东坡国学论坛暨纪念苏东坡诞辰973周年”大会；台湾也举办过一些苏轼纪念会，1995年4月台湾邮政还发行过一套四枚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邮票。

2. 学术组织与学术刊物不断涌现。1980年9月全国苏轼研究会成立（省内登记，全国活动），秘书处设在四川大学，2005年1月迁到入眉山。此后苏轼为政与居住过的城市纷纷成立学会与研究机构，如河南郏县苏轼研究学会于2002年8月成立，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于2002年10月成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于2007年3月成立，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于2008年3月成立，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于2009年12月成立，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于2010年1月成立。发表苏轼研究论文的书刊则有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朱靖华、刘尚荣主编的《中国苏轼研究》（2004年创刊），全国苏轼研究会主办的《苏轼研究》（2005年创刊），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主办的《三苏祠》（2002年7月创刊，出版11期后于2004年停办；2008年复刊），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主办的《苏学通讯》，出版的《苏东坡研究丛刊》（已出三辑），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放鹤亭》（2009年创刊）等。此外，代表海外五十万苏氏族人的世界苏姓宗亲总会于1994年3月在菲律宾马尼拉成立，中国大陆各地亦成立有苏氏联谊会，如四川苏氏宗亲联谊会、广东苏氏联谊会、北京苏氏联谊会、河北栾城县苏氏联谊会、山东济南章邱苏氏联谊会，等等。许多苏姓人编撰家谱，认苏轼为祖，自费参加苏轼会议，到眉山祭祖朝圣，捐款捐物。

3. 苏轼遗址、景园的整理、修复与开放。全国各地保留、修复及新造了许多有关苏轼的遗址与景园，人们永远用最真诚的方式虔诚地纪念这位文化巨人，以其到过本地而颇感自豪。河南开封、陕西凤翔、浙江杭州、江苏宜兴、山东密州（今诸城）、江苏徐州、浙江湖州、湖北黄州、山东登州（今蓬莱）、安徽颍州（今阜阳）、江苏扬州、河北定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河南郏县、江苏常州、河北栾城等地都能结合自身实际，倾力打造苏轼遗址景园。眉山市提出了苏轼遗址地缔结文化旅游联盟的战略构想，以便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眉山市政协还效仿栾城组织“苏味道及三苏考察团”的做法，2007年组织“东坡足迹行考察团”，沿苏轼当年宦游路线，行程万余里，历经十六市，实地考察了苏轼当年留存下来的遗址、遗迹、遗物一百多处（件），参观了各地的苏东坡纪念馆、历史博物馆十六处，编辑出版大型画册《千年英雄苏东坡图传》及考察报告《东坡足迹万里行》，拍摄十八集电视专题片《东坡足迹行》。2009年9月徐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了“全国第十六次苏轼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苏轼遗址景园旅游发展论坛”，与苏轼有关的十八个城市派出专家或官员与会，共襄盛举。

眉山三苏祠为三苏的故居，元延祐年间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火，清康熙四年（1665）重建，民国十七年扩建；三苏祠博物馆创建于1984年，该馆是全国苏轼遗址、景观保存最丰富、最完好的纪念地，内有文峰、并蒂丹荔、木假山堂、瑞莲亭、快雨亭、披风榭、飨殿、洗砚池、启贤堂、苏宅古井、来凤轩、云屿楼、百坡亭、苏氏宗族纪念馆、东坡盘陀塑像、千年银杏、碑亭、南堂、景苏楼、式苏轩等景点及新建的纱縠行商铺、西园、东园（有晚香堂、碑廊）。该祠发行三苏祠光碟、三苏祠邮资信封（正门为图案，发行五百万枚）。眉山市斥巨资在三苏祠对面新建的三苏纪念馆2007年11月开馆。眉山市还有三苏坟（苏洵夫妇及王弗葬于此）及新建的三苏雕像广场（三苏巨型雕塑）、远景楼等。以东坡命名的，有东坡区、今日东坡、东坡诗社、东坡湖、东坡大道、苏轼酒楼、东坡中学等。河北栾城是三苏的祖籍，新建“苏东坡祖籍纪念馆”于2002年7月开馆。常州是苏轼生前多次到过与去世之地，有东坡公园（舣舟亭、东坡古渡、洗砚池、抱月堂、御碑亭、仰苏阁、东坡铜像）及孙氏楠木厅——藤花旧馆（苏轼卒于此）。河南郏县（上

瑞里峨眉山)是苏轼埋葬之地，建有三苏园，内有三苏坟、三苏塑像、三苏博物馆、三苏祠等，该县2002年8月还召开了“纪念苏轼葬郊900周年暨中国十四届苏轼学术研讨会”。

苏轼为政、居住的城市十六座，主政八州，这些城市所存留或新建的遗址景园则更多。江苏徐州有黄楼(内有“黄楼赋碑”)、百步洪、曲港跳鱼、快哉亭、放鹤亭、东坡石床、苏公塔等五十余处，为全国面积最大、景点最多的苏轼文化旅游城市；宜兴有东坡书院及东坡海棠园，该市东坡小学的校歌为《东坡书院源远流长》，扬州有谷林堂，南京有苏轼与王安石会面的半山园。陕西凤翔东湖建有“苏文忠公祠”、“东湖碑林”、“喜雨亭”、“凌虚台”等。浙江杭州有苏东坡纪念馆，西湖十景有“苏堤春晓”，又有东坡剧院，湖州有墨妙亭。山东密州(今诸城)有超然台(在苏公岛上)，登州(今蓬莱)蓬莱阁前有苏公祠、卧碑亭。河北定州有雪浪石(在众春园旧址雪浪亭内)与东坡槐。该石黑质白脉，中涵水纹，展现出一副若隐若现的山水画卷，犹如当时著名画家蜀人孙位、孙知微所画的石间奔流、百泉涓涌、浪花飞溅之态，遂名“雪浪石”。湖北黄州有东坡赤壁公园(东坡塑像、二赋堂、坡仙亭、放龟亭等)。安徽颍州有沧浪亭，宿州(今宿县)有扶疏亭，专藏苏轼绍圣元年所作墨竹图。江西湖口有怀苏厅、坡仙楼。广东惠州有苏东坡纪念馆，西湖苏堤、“逍遙台”。广州从化苏东坡纪念馆于2006年1月开馆(苏轼后裔创办的民间纪念馆)，正筹办苏轼岭南事迹展、兴建东坡碑林，拟建成东坡文化园。海南儋州有东坡书院(东坡笠屐铜像、载酒堂、载酒亭、东坡井、东坡讲学塑像)、桄榔庵，海口有苏公祠。为了宣传苏轼遗址景园，不少学者不辞辛劳，搜集资料，撰写著作，如韩国强的《寻访东坡足迹》(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刘少泉、胡惠芬的《三苏祠楹联》(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朱玉书的《东坡胜迹诗联选》(海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余实秋的《东坡遗迹楹联集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等。

目前，苏轼遗址景园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有眉山三苏祠、郏县三苏祠与墓、黄冈东坡赤壁、海口五公祠、儋县东坡书院等五处。东坡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四川眉山、江苏徐州、河南郏县、河北栾城、湖北黄冈、广东惠州、海南儋州等地东坡

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与此相应，东坡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态势日益迅猛，有学者提出应该将苏学划分为理论苏学(或苏学理论学)与应用苏学(或苏学发展学)，两者应得到同等重视。周成仕即主编有《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09年版)和《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中国大陆苏轼研究风气颇浓。苏轼作品整理与选注选评著作、苏轼传记年谱著作、苏轼各体文学研究史著作、苏轼文化成就研究著作、苏轼分文体研究、分题材研究及分时段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大量呈现。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编撰的《苏轼年谱》，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的《苏轼资料汇编》、王水照所著的《苏轼论稿》、曾枣庄所著的《苏轼评传》、王友胜所著的《苏诗研究史稿》。此仅就后者而详言之，苏轼一生南羁北宦，东飘西荡，为官与贬谪各地，所到之处，留下了大量作品与故事，当地学者则以弘扬地方文化为己任，编撰了诸多论著。如彭宗林著的《苏东坡与三苏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朱玉书著的《苏东坡在海南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韩国强著的《苏东坡在儋州》(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孔凡礼著的《苏轼在密州》(齐鲁书社1995年版)，李增坡主编的《苏轼密州作品赏析》(齐鲁书社1997年版)，丁永淮、梅大圣、张社教编注的《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饶学刚著的《苏东坡在黄州》(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苏泽民著的《苏东坡在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弼、苏慎主编的《苏东坡与常州》(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年版)，邵玉键、包立本著的《东坡常州奇缘》(珠海出版社2008年版)，孟昭全编著的《苏轼与利国》(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靳占信、杨梅山编的《苏味道三苏与栾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卢武智著的《苏轼在风翔》(中国和平出版社2001年版)，张文利著的《苏轼在关中》(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袁光主编的《苏东坡与惠州》(惠州市政协2004年编)，平顶山市政协编的《苏东坡与平顶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新时期以来，海内外学界涌现出了大量苏学专家，如孔凡礼、王水照、曾枣庄、刘乃昌、朱靖华、刘尚荣、张志烈等。孔凡礼先生为中学教师，三十

余岁即丧妻，发愤研究苏轼，编有《苏轼诗集》、《苏轼文集》、《苏轼年谱》等著作。腰系草带，脚穿破鞋，啃馒头、喝开水，在国家图书馆阅读苏轼书籍，成为一道风景。苏轼在当今也不乏虔诚的崇拜者，铁杆的“粉丝”，海南儋州市文体局韩国强跋山涉水，遍搜史料，撰写《寻访东坡足迹》等书，2007年起又在家中办“仰苏书屋”，无偿供青少年阅读；烟台旅游学校高级讲师刘艳琴撰《来生便嫁苏东坡》（载《散文选刊》2006年第5期）与《千年绝版苏东坡》，以示对苏轼的崇拜。眉山市编撰《清廉东坡》一书作为全市中小学生、机关干部、社区群众、企业职工必读课本；眉山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眉山市地方教材编写委员会组织编写了《三苏诗文选》（中学版，李松、刘清泉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和《三苏诗词选》（小学版，李松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眉山一中编写了校本教材《走近东坡》（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纳入课程计划；眉山学生代表高考前参加“拜谒东坡，励志成才”活动；徐州利国苏轼小学、实验小学编写《苏东坡的故事》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

苏轼在当代受到的热捧与政治家的提倡与喜好不无关联，毛泽东曾提倡学习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朱德1963年为三苏祠题词：“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方毅（国务院副总理）1981年为三苏祠题词：“蜀中多才子，三苏天下奇。”陈毅的《冬日杂吟》诗饱含深情地赞叹说：“吾喜长短句，最喜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

5. 海外苏轼研究来势正旺。中国台湾、香港及日本、韩国、东南亚、美国、德国等地苏轼研究者不乏其人，可见苏轼及其文学在海外亦深受喜爱、热捧，苏轼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美国华盛顿州西华盛顿大学唐凯林博士原研究英国文学，阅读过苏轼的作品后，深为感动，遂专力研究苏轼，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学习与研究，与曾枣庄先生过从甚密。日本国从五山禅僧、江户文人到明治、大正时代的长尾雨山、富冈铁斋多次举行寿苏会、赤壁会。如明治初中期的向山黄村（1826~1897）号“景苏”，即景仰苏轼的意思，所盖房屋名“景苏轩”，1888年冬，为祝贺房屋的落成，举办寿苏会，孙点（寿苏会参与者）编辑参与人所做的诗文为《景苏集》；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主办的《橄榄》

杂志第7、8号开设“苏轼的文学”专辑，译介钱锺书《宋诗选注》中苏轼诗及注，连续发表苏轼研究论文。与此同时，研究著作亦不断出现，如韩国岭南大学洪瑀钦先生的《苏东坡文学之背景》（岭南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及东国大学朴永煥的《苏轼禅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台湾大学王保珍的《东坡词研究》（台北长安出版社1979年版），中央研究院衣若芬的《苏轼题画文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及《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苏轼研究论集》（线装书局2001年版），海军少将罗海贤的《东坡军事思想》；日本大学保莉佳昭的《苏词研究》（线装书局2001年版）及日本中央大学池泽滋子的《日本的赤壁会和寿苏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2000年7月法国《世界报》连载十二位生活在公元1000~2000年的东西方人物，将苏轼誉为“一千年影响世界进程的千年英雄”。

6. 苏轼题材的文艺作品纷呈。新时期以来，人们用不同的文艺形式宣传、歌颂苏轼，相关影视剧、小说、戏剧作品大量出现。如东方龙吟所著十二卷本大型历史文侠小说《万古风流苏东坡》，分人望、人伦、人杰、人民、人籁、人文等六部分，吉林文史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起连续出版；易照峰所著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凡135万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王中亚所著长篇小说《大宋文豪》，第一部为《但愿一识苏徐州》，第二部为《乌台诗案说从头》，第三部为《春江水暖鸭先知》；此外还有李时英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成宗田所著的长篇小说《风流学士》等。电视剧及电影则有廖全京编剧的十集电视系列专题片《大江东去》，徐芬夫妇编剧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四川影视艺术制作中心录制），冷成金编剧的四十四集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及香港亚洲电视台拍摄的电影《骚东坡》等。

苏轼来到这个世界快一千年了，离开这个世界超过九百年了。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折射出了中国文化人的情感世界与事功世界，其光芒辉映着千年的文化天空。他既植根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

景苏诗选萃

诗二首

张志烈

参加三苏祠寿苏会呈座中

泉源万斛溢芳馨，亘古眉山诞巨星。
糠秕百家求大道，纵横三教本真灵。
尧风舜雨仁天地，韩笔杜诗并古今。
盛会寿苏同仰止，开来继往属群英。

《苏轼全集校注》出版祭告坡公

苏海汪洋学泛舟，探骊琢璞继前修。
成裘集腋倚才骥，拾叶添薪愧老牛。
入眼琼瑰天地美，罗胸丘壑古今幽。
更将新奏期来哲，铁板铜琶共九州。

2011年1月22日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会长)

三苏祠，一阙灵魂的闪电

许 岚

巴山蜀水是你的血脉
青色苔痕是你的故园
三苏祠，一阙灵魂的闪电
火辣的阳光，怎么也

撕哑不了你铿锵的抒情
文字的最低处
是水天一色的中国湖

三苏祠，三父子的油纸伞
诗意图般的撑起一蓑蓑烟雨
每一片碑文的沟壑
都是时光的隧道
久违的庙堂，江湖
没有刀光剑影，流浪迁徙

一场雪，从三苏祠的一面墙碾过
宋朝的一面镜子
锈迹被雪的眼睛烫亮
雪的生动，从三只蝴蝶的痛饮开始
浊泪如血，活络一群飞翔的句子
兰舟催发，莺飞草书
时事和家常重逢

三苏祠啊，土地再深沉
也荒芜不了你青松的容颜
历史再苦涩
也压折不了你花朵的力量
点燃黑暗的光泽
风是你的影子
营养着现代人，缺乏钙质的生活

(恒泰集团《中国恒泰报》总编、四川省
作家协会会员)
(下转第76页、第77页)

民间儋州

方永江

不是一般的倥偬。

18日凌晨6时，睡眼惺忪中甩手出门。只带一个脑袋去，不带一丝云彩归。天上地下，云雾中高速。饥肠辘辘，下午1时许，方等到接机的人。3时许，匆匆吃过午饭，往儋州急驰。稍事休息，便于露天坝参加东坡文化浓郁的儋州东坡节开幕式。风之歌、雅之歌、海之歌、酒之歌、教之歌、盐之歌、情之歌、民之歌、和之歌等东坡九歌，目不暇接。

翌日上午，“苏东坡在儋州国际论坛”拉开大幕。聆听曾枣庄、刘小川诸先生精彩演讲。对话“东坡文化产业的发展及促进”，就其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基本路径抛砖引玉。下午，赴热带植物园受教并参加座谈，结识罗微等四川老乡，一见如故，其乐融融。晚上，又于露天广场领略紧凑、热烈、奔放的闭幕式盛况，首次感受儋州调声的魅力，更那堪万人同贺，壮歌直上九重天！

到海南，是第一次。椰风海韵的诱惑，早存于心。未来之前，女儿一再纠缠，要记得带些土特产回来哦。两天里，被文化的浪潮挟裹着，竟抽不出片刻功夫逛逛商场。

我是海口的过客，三亚的气息是一丝也不曾嗅着……

不是一般的超脱。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肯定不只一个人中了圈套。那是没心没肝的诗人忽悠你的。在千年古盐场的遗址上，面朝大海，我竟不只一次生出如许的念头：让烦恼飞，让我在旅程中安睡让我沉醉不归。

岁末年终，各种纠结寻上门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给你二两肉，却要你办九大碗，你不杨伯劳都不行。今年的热词，怎一个涨字了得；今年的热语非感激涕零莫属。某领导到某文化单位，表了

一些份内的态，做了一些份内的事，就让该单位领导感激涕零得很，舆论为之哗然。文化的窘境可见一斑。别人在谋福利，我们却在艰难求生存，怪只怪“我爸不是李刚”。两个月来，难得睡上一个安稳觉。

在海南的土地上，于我直接的好处，绞尽脑汁也弄不出个一二三，然而，我却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踏踏实实地睡了两晚上。该是儋州东坡节的纯粹吧。整个节庆，没有搭台唱戏的喧嚣，主题只有文化。开闭幕式、调声大赛、书画展、美食节，哪一个是文化的盛宴？把文化的还给文化，让经济为文化扎起。儋州的给力，亮出了“非诚勿扰”的剑。

去植物园的车上，一路酣睡。温煦的阳光，和畅的惠风，在植物园里看到何种稀奇，品尝了什么时鲜，不留痕迹，总觉得迷迷糊糊，神游故国。

是夜，罗微先生远道来访。相谈甚欢，竟至深夜，留下了儋州的茶香和浓郁的乡情。一直记得罗微先生恳切的言辞：“苏轼遗址地的文化活动开展得如此好，就是想多参加、多交些朋友。”而他，不到四十，已早为博导。

儋州啊，在你最好的时候遇上你。

仔细思量，我对眷恋的风景和心仪的人物，竟从未着一个美字。显然，这个美字，不是美学意义的美，而是可以和漂亮之类肤浅的表白划等号的东西，譬如容貌。美与不美，那是一眼可以看透的浅薄；好与不好，却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哪个红颜不凋零？哪个美人不迟暮？好，那是一种让人受用一生的温柔，是沁入骨髓的巴心巴肝。儋州的好，深根于民间，才让我如此的恬然自安。

不是一般的感慨。

1097年，年迈的东坡万里投荒。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时宰

景苏札记

欲杀之”，命悬一线。东坡自述：“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死则葬于海外。”凄凄惨惨，以至于此。几间破官舍，观日观月观星星，漏雨漏风漏树叶，而这亦不长久。一帮衙役将东坡父子逐出官舍，吃住于污池旁。官府的冷酷，昂扬了民间的力量。儋州百姓像亲人一样接纳和照顾东坡。他们为他提供食物，筑成桄榔庵，东坡得以存活，得以融入这方水土。在东坡书院那尊著名的笠屐像前，我默然良久。为故乡先贤的苦难遭际唏嘘不已，为儋州百姓对东坡的爱戴呵护感铭深长。东坡戴竹笠，穿木屐，跌跌撞撞，摇摇晃晃，自言自语“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的形象，宛若眼前。

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民间的大智慧，激活了苏轼体内的文化基因，柳暗花明的人生更璀璨，更伟岸。融入儋州的东坡一变而为儋耳人，“海南万里真吾乡”，“兹游奇绝冠平生”。在儋州的日子，东坡劝导民睦、敷扬文化、倡改习俗，发展生产、变化人心，离岛僻壤的儋州，滋养出海南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有着丰腴的民间元素。书声琅琅，弦歌四起。歌声激越一千年，今朝更动听。

我们在东坡书院内摇舌鼓唇，当地百姓在院外静静伫立。转弯抹角的人墙蜿蜒二三里，目送我们离去之后，竟携起手来，欢歌劲舞三小时。晚上的闭幕式，万余群众调声大联欢，薄衫薄裙不觉萧瑟，辣舞飚歌分外执著、分外投入，通宵达旦不知今夕何夕。第二天，儋州之外的古盐场，我清清楚楚地听得，为我们解说的小姑娘窃窃地抱怨她的头儿：这么好的日子，竟不知会一声，我们也好去感受感受、学习学习。

儋州的百姓就是以这样的姿态文化着。这是对东坡的敬仰，对文化的敬畏。民间儋州承载着儋州的文化之重。居儋四年，东坡幸甚，儋州幸甚！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

（上接第 74 页）

登中岩望鹤楼

张世明

寻着东坡初恋的幽香
一路冒雨驱车直奔源头
抬起潮湿的脚步
缓缓登上宋词中的望鹤楼

江水滔滔
依旧由北向南滚滚流
烟雨迷蒙 天空低矮
不见对岸小轩窗木阁楼
一对才子佳人风流
却早已乘坐波涛一去不复
何处觅求？

幸好鹤还在
江中戏水浅滩徘徊雨空展翅遨游
唤鱼池犹存
联姻佳话海内外千古长流

不知不觉
两滴中岩的秋雨卡住眼球
凭栏也无法远眺
平添一方山水的忧愁……

（眉山市东坡区崇仁小学教师、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受邀为顾问，
赴定州苏轼研究会成立大会

李 新

论道因苏子，群贤会定州。
丹心成雪浪，双树立春秋。
赵北雄关壮，中山胜迹留。
切磋无少长，研讨化鸿沟。

2010 年 12 月 17 日
(河北保定学院讲师)

访苏轼遗址遗迹系列之一

——苏轼系舟宿牛口

欧忠剑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
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
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
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
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儿女自咿哑，亦足乐且久。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
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
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十月四日，苏洵父子“家托舟航千里速”，再次赴京师（现河南开封），途经牛口（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思坡乡小龙村牛口坝）时，苏轼所作《夜泊牛口》，是他早期优秀诗作之一。当时苏轼年仅22岁。

在舟泊牛口古镇时，山民的淳朴安闲让苏轼羡慕不已。他们虽然身处蛮荒之地，茅屋破陋，蔬食果腹，生活贫苦，但并不悲苦，而是家人相亲，悠然自得。正如诗云：“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儿女自咿哑，亦足乐且久”。看到这样淳朴的民风，苏轼不禁嘲笑自己何苦奔走于仕途。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开始反省：“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面对“富贵耀吾前”的诱惑，很少有人真正做到安贫乐道，“贫贱独难守”。对此，他不得不哀叹自己“汲汲强奔走”的无奈。苏轼进京以后，依旧“强奔走”不已。更不会料到自己的人生仕途会如此一波三折。

当年，苏洵公父子三人南行乘舟沿长江出川，沿途吟咏诗歌一百又二首，后由苏轼编为诗歌合集《南行集》。今年，我“沿苏轼南行”路线，亲自

去宜宾长江边的“牛口”，感受苏轼所描绘的牛口情景。

2008年11月1日，我坐上了由成都开往宜宾的火车，于第二天早上6点过到达宜宾火车站。此时天还没有亮，浓雾弥漫着整座城市，亦增添了些许朦胧之美。

我在火车站旁边一家餐馆，边嚼着喷香的油条边询问当地人如何去牛口。人说，往思坡乡去即可。思坡乡？是不是因思念苏轼当年来过牛口而命名的呢？我便坐车径直前往。车上意外地听到售票员谈起苏轼的那首《夜泊牛口》诗，感觉甚是投缘。

汽车行驶了约90分钟后到达牛口坝车站。由于近日来雨水不断，又加上是乡村土路，道路泥泞可想而知。我向当地人借了一双雨靴。这时，售票员也自告奋勇当上了我的导游。行走了约5分钟就到达了一千多年前苏轼“夜泊牛口”的地方，放眼看去，彷彿看见了当年苏轼由这里上岸的情景。可如今，物是人非，这里早已没有往日“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的热闹场景。这里没有船只，只有一汪平静的江面，几个稚嫩小孩在这里钓鱼、嬉戏。岸边的房屋破旧不堪，显得格外冷清。与当年苏轼笔下的“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一样。

早些年，道路不通，每逢赶场天，牛口坝码头停满了过往的船只，码头也就成了蔬菜、竹木交易的热闹场所。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和生产生活资料都要通过这个牛口坝摆渡往返于宜宾与牛口坝之间。现在乡村公路修通了，所以水路运输业萧条，牛口坝码头也就冷清下来了。如今，这里只留下与渡口有关的石碑和渡口边的一段石梯而已！

细雨不断，水雾蒙蒙，但此雾决非苏轼《夜泊

景苏札记

牛口”诗“日落红雾生”的情景，也非《牛口见月》诗“掩窗寂已睡，月脚垂孤光……今来牛口渚，见月重凄凉”的情景。

回到车站，听当地一个上了年龄的大爷说：在他屋后不远处有块地，据传，当年苏轼来到这里上岸，走到这块地，因满地都是瓦渣子，故叫“瓦渣地”。出于好奇，我便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瓦渣地”，通过肉眼确实能看见泥土里掺杂有“瓦渣子”。如今这个“瓦渣地”已全部种上柑桔了。

看完牛口坝，我坐上还是来时的那个车，问售票员思坡乡的由来。他说不上来，让我去思坡乡去问一位姓谢的人（谢街长），说他可能知道。思坡乡的由来也是我这次考察了解的内容之一。于是，我在思坡乡下了车。思坡乡是一个小镇，这里也有“东坡街”、“东坡书社”等名称！我在一棋牌室找到那个姓谢的人，此人看上去约 50 多岁。我说明来意后，他便告诉我思坡乡的由来。

思坡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思坡乡原名渡口场，明清以前又叫大顺场。相传北宋年间流寓宜宾的诗人黄庭坚。常来到江边，遥望着从上游顺流而来的江中帆影，希望看到好友苏轼的到来。思友心切时，他一边目迎江中帆影，一边信步沿江而上，直到离城已远，为流水潺潺的一条小溪所阻隔，方才止步。那份切盼迎晤好友的殷殷深情，感人至深。黄庭坚后来在今思坡乡筑楼，并手书“思坡”一匾于楼前，以待苏轼前来。后人便将黄庭坚“止步”的那条小溪叫“苏坡溪”，又叫“思坡溪”。临溪的小镇也便由此而得名。解放后，将思坡溪就直接改为思坡乡。后人还想像苏黄两人会面的情景，并将小溪这条沟命名为“会诗沟”，所在的村也命名为会诗村。

我又顺着谢街长手指的方向，去看看“会诗沟”。

顺着思坡乡往宜宾市方向的公路走，约 10 分钟就到达“会诗沟”。“会诗沟”实际上是一条小溪，沿着这条小溪前行 200 米，远远就看见一块大石头，在大石头上面有由何昌龄写的《会诗沟序》。透过大石头，在其背后的山崖上书写着“会诗沟”三个大字。再往前行 100 米就能看见苏黄俩人会面的雕像和几间房屋，这是后人想像两人“会诗”情景。

苏轼的深远影响，永远与山川同在。大自然开阔了他的视野，滋润了他的心田，激发了他的灵感，而他又以生花妙笔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千古绝唱，为

山川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让这些山川美景蜚声海内外。

看完了牛口坝码头，了解了思坡乡、“会诗沟”，我决定回宜宾市参观“流杯池公园”。

思坡乡之行，使我犹如享受了一餐三苏文化的美味佳肴。一杯文化小酌，胜却酒肉大餐无数。

（华夏苏东坡文化传播中心）



（上接第 74 页）

咏苏小辑选

李景新

谒眉山三苏祠

问君何事访三苏，才聚一门千古无。
岷水含烟多秀色，眉山敛黛蕴瑜珠。
仰观祠宇分神智，久立虚堂开下愚。
莫怪凡夫附风雅，端能乐坏蜀先儒。

观眉山三苏纪念馆

遥向祠堂馆宇新，煌煌文物实堪珍。
唤鱼池畔存真像，绝版书中贮大钧。
鸿爪萍踪来眼底，丹青翰墨洗征尘。
依依别去情无尽，常使游人醉入神。

（海南琼州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眉山苏学研究的经验得到推广

本报讯（付艳霞 张茂 唐雅兰）近日，在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四川社科界》2010年第5、6期合刊上以《苏研重镇是这样炼成的》为题用7000余字全面、深度报道了眉山市委、市政府在推动眉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高瞻远瞩，求真务实，把社科建设打造成为全省的新亮点的事迹，向全省重头宣介和推广眉山经验。

为推动全市社科建设特别是苏学研究，市委常委会相继议定中国苏轼研究会会址由四川大学迁来眉山，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

成立直属市委、全额拨款的市三苏文化研究院；设立眉山市文学艺术体育突出贡献奖（社科单列），全市社科建设亮点纷呈。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着力开拓苏学研究新领域、深化苏学研究新渠道、开创苏学研究新局面，眉山实力铸就苏学研究新地标，眉山的社科建设特别是苏学研究不仅成为全省的新亮点，而且成为全国苏轼遗址遗迹地的新亮点。上封面、栏目唯一，不仅是眉山建区设市以来社科领域的第一次，而且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余年的第一次。

儋州东坡国际论坛举行

本报讯（流水）2010年12月19日，在儋州市中和镇东坡书院钦帅堂前，来自全国的苏学研究专家、社会文化学者共200人参加了苏东坡在儋州东坡国际论坛。

本届论坛由儋州市人民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是儋州东坡节七大主题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一节一赛”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为国内外一流学者、专家、政府领导传播东坡文化理念，交流东坡文化产业经验，创新东坡文化模式，指导实践东坡文化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

此次论坛共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的苏学专家、学者30余位。其中主题演讲有：中国苏轼研究会名誉会长、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曾枣庄的《“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兼论东坡文化研究及发展现状》，中国苏轼学会常务理事、著名作家、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主任刘小川的《苏东坡的现代性》，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木斋的《苏东坡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衣若芬的《东坡海南笠屐故事的形成、传播与影响》；参加主题对话的专家、学者有李景新、邱俊鹏、王琳祥、王启鹏、王哲、计亚男、方永江、尧军、韩国强、林冠群、阮忠，他们分别就《东坡文化对儋州、惠州、黄冈的推动作用》、《东坡文化

产业的发展及促进》和《东坡文化与海南儋州人文历史的脉络梳理与内在联系》发表了百秒演讲。

论坛由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铎主持，儋州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政法委书记罗时祥致欢迎辞，他说，儋州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波澜壮阔人生中的最后一个驿站，也是东坡人文思想、文化魅力和伟大人格全面升华和走向成熟的福地。苏东坡居儋三年，传播中原文化，倡导黎汉团结，改变落后习俗，解除民间疾难，真正做到亲民爱民，造福一方。儋州举办东坡节，就是利用和借助东坡国际论坛，深入研究东坡文化对儋州和海南社会产生的历史影响，探讨东坡文化与构建和谐儋州、和谐海南的关系，挖掘东坡文化对当代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文化内涵。罗时祥表示，本届东坡节是今年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节庆活动，也是儋州、惠州、黄冈联合轮流举办的重大文化节庆活动。通过办好东坡节，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挖掘东坡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提高儋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促进儋州招商引资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儋州的核心竞争力，加快把儋州建设成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2011 年全国首届“东坡学校”交流活动 征文启事

什么是东坡精神？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教授精辟指出：“东坡精神就是苏轼爱国爱民、奋力当世的崇高理想；求真求实、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为了更好地弘扬东坡精神、传播东坡文化，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眉山市东坡区委、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政府和华夏苏东坡文化传播中心即将主办 2011 年全国首届“东坡学校”联谊交流展示活动。其中的“‘我爱苏东坡’主题对话活动”面向全国征稿。

一、征文范围

全国“东坡学校”及苏东坡足迹地大中小学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以及全国从事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苏学研究爱好者。

二、征文内容

校长、教师对话的论题是“‘东坡文化’学校教育”，以下选题仅供参考：

1. 浅谈“东坡文化”学校教育的理念
2. “东坡文化”学校教育实践经验点滴
3. 谈“东坡文化”校本课程建设
4. “东坡文化”校本课程的实施心得
5. 语文综合性学习与“东坡文化”资源
6. “东坡文化”学校教育的现状调查
7. “东坡文化”学校教育的历史状况
8. “东坡文化”学校教育的规律、原则与过程
9. “东坡文化”学校教育的策略
10. “东坡文化”学校教育的习惯培养
11. “东坡文化”学校教育的测评研究
12. “东坡文化”学校教育与写作兴趣培养
13. “东坡文化”学校教育与理想培养

学生对话的主题是“走近苏东坡”以下选题仅供参考：

1. _____（遗址、遗迹）游记（参观记）
2. 追寻苏东坡的足迹
3. 苏东坡印象
4. _____（诗、词、文）读后感

三、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截稿。论文请发华夏苏东坡文化传播中心欧忠剑电子邮箱：ouzhongjian@163.com 和《苏轼研究》电子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四、征文说明

论文要求有内容提要 50-100 字、关键词 3-5 个，注释采用尾注。在文稿末注明真实姓名、邮政编码、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或 QQ。优秀论文将收入“‘东坡文化’学校教育论坛资料汇编”或者选发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并且将作为评选“‘东坡文化’走进校园示范学校”的条件之一，部分作者将被邀请参加 2011 年全国首届“东坡学校”联谊交流展示活动。未能参会作者将会收到活动会刊、资料汇编、《苏轼研究》和《三苏祠》各一本。

联系电话：028-85972699、13980953650、
13880580027

2011 年全国首届“东坡学校”
联谊交流展示活动筹备委员会

2011 年 2 月 28 日